



震撼清王朝的第一枪



“9.18 事变”的预谋与经过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封面人物——许戈辉写真
百颗脏官头——桩奇贪案



第2期

11
91

江泽民的风采

乔天富/摄影 喻晓/配诗

举头瞻峨眉山色，
革命情怀激荡；
回眸中国改革潮，
不屈意志铿锵。



③ 俯仰长天外，
三军作统帅。
向战士举手致意，
双眉落下多少期待！

④ 心中洒满阳光，
会场荡起春风。
万千的握握，
化作总书记的笑容。

⑤ 胸装国事，
忧国思亲，
一个睿智的思想，
已经酝酿成熟——
一杯清茶在手，
句句笑语入心，
编就天下大事，
编就党风民情。



辉煌的历史 光明的未来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政道

(李政道先生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1926年生于上海，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是令海内外炎黄子孙十分高兴的事。我谨通过《炎黄春秋》向研究会同仁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智慧著称，她有辉煌的历史，也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中华文化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不间断地延续至今的文化。在科学技术上，大家都知道有四大发明。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是最早把纵横木杆用于数学中十进制的国家。纵杆示十的偶次方，横杆示十的奇次方，方格为零。故壹为|，拾为—□，贰拾为=□，拾贰为一||，壹佰拾壹为|—|等。阿拉伯数字视其在十的偶次方位，还是在十的奇次方位，都有相应的纵杆或横杆表示。可见我们的祖先是了了不起的，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华民族受到外国列强的欺凌和压迫，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一些人把中国目前还比较不发达的状况归咎于中华文化，这是没有道理的。继承我们祖先文化遗产中的优秀部分，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是今天全世界炎黄子孙面临的挑战。

发展科技是振兴祖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去困难的条件下，中国靠自己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最近，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高能加速器技术达到了世界第一流水平。这些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有志气，敢于迎接挑战。

把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建设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靠中国人团结奋斗。我多次去过以色列，那里比较贫穷；我也多次到过日本，那里很富有。但是，不论以色列的犹太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是很团结的。可以说，能够团结奋斗，敢于迎接挑战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愿祖国的青年人自尊、自信、自立，无愧于创造过灿烂文明的祖先！



肖克同志宴请李政道夫妇

震撼清王朝的第一枪

炎黄春秋

“9.18事变”的预谋与经过
胡适明并“胡”开明
“九一八”——中国历史上
百颗脑袋 一枪奇案



顾问: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屈武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绳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骏
张国琦 李学勤 刘颀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印刷

社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5号

邮码:100037

美术编辑:小雁

【本刊特稿】

辉煌的历史 光明的未来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李政道 1
- 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李瑞环 6
- 炎帝生辰在随州/刘永国 4

【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

震撼清王朝的第一枪

- /郑一奇 8
-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垮台。当年的第一枪到底是谁怎么打响的呢?其中既有很大偶然性,又有深刻必然性;既有着曲折情节和惊险故事,更充满喜剧情节和悲剧故事。

最后一顶皇冠落地

- 辛亥革命史话/王梦斯 12
- 武昌首义故事/刘作忠 18

【纪念 9.18 事变 60 周年】

- 少帅美国行/宁先绪 21
- “九一八”事变的预谋和经过/李隆庚 27

【英杰谱】

-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水静 30
- 朱德元帅对兰花独具柔情,爱赏善种,深知兰性。“高干”夫人水静此文,通过朱老总的兰花经,写出了这位开国元勋的生活情趣,为人品德以至人生哲学。读来如兰香悠悠,兰风拂拂,回味无穷。
- 张爱萍和他的“招贤榜”/胡士弘 34
- 黄镇和西柏坡的领袖们/尹家民 37
- 我国著名外交家黄镇,又是红军中活跃的政治工作者和业余画家。本文首次披露了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相处的生活轶事,写出了一代英杰们的情怀和趣闻。

【殒星篇】

恽代英、沈葆英狱中诀别记

/张羽 42

嗜书爱字的田家英/何方生 45

【论谈录】

中华文坛不老松——巴金、冰心、艾青、夏衍、常书鸿侧影

/唐文一 秦时月 47

在钱钟书寓所作客

/丹晨 50

京华初夏访沈醉/刘峰 53

【春秋笔】

胡开明并非“胡”开明

/晓凌 柳铮 56

五十年代末，张家口市委书记胡开明，被毛泽东主席点名批判为“胡”开明。可是历史为他正名洗冤。这件往事却令人怵目惊心 and 不堪回首，无论是过来人还是后来人，都将从中品尝出那个时代特有的辛酸苦涩！

一篇被耽误了的“七一特稿”——锤头镰刀换新天

/林玉华 66

【古镜台】

百颗脏官头

一桩奇贪案

/郭成康 70

古往今来，贪官污吏无不为人切齿，连清帝乾隆也一举处决了一大批脏官。真是一边珠宝源源进门，一边人头滚滚落地。这桩令人咋舌又发人深思的贪脏巨案，将给人们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

【古今谈】

汉族与支那、华夏、中华民族/常征 7

说“圆”/李虹 29

【同根结】

台湾诗人越海谈诗/徐天铎 74

【赤子心】

异邦日子怎么过

/(加拿大)梁漱华 76

【神州光】

民俗先驱——元胎先生

/陈建功 78

【时代风】

封面人物：许戈辉写真/卢弘 ... 80

博物馆里的忧思和警报

/邢军纪 曹岩 82

幽静的博物馆里发出了阵阵尖利的警铃声和沉重的叹息声，中华国宝被塞进盗窃犯和走私犯的麻袋里，又出现在海外的拍卖行。我国的文物、公安、检察、安全和外交部门，都被卷进了这场古今中外大混战中……

少林高手 少校教官

——记北京少林掌门刘盛英/何东 92

缚龙(诗)/莫文骅

贺诗/乔晓光

世界各地炎黄子孙赈济大陆

灾胞活动概览/夏海涛 90

封二：江泽民的风采(摄影作品)

/乔天富摄影 喻晓诗

封三：中华文坛不老松(肖像摄影)

【九州景】

封四：黄河明珠(郑州黄河游览区风光)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黑伯理等领导人入场。

(刘毅 张勇摄影)

炎帝生辰在随州

刘永国

初夏六月，正是祖国的南方收获与播种的季节。厉山镇神农大道鼓号齐鸣。四面大锣开道，四条彩龙起舞，拥出了巨幅炎帝神农画像和放着耒耜、五谷、百草的功德平台。这是对始祖的缅怀。

5000多年前有那么一天（相传为农历4月26日），汉水东畔的“烈山石室”（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厉山镇九龙山上）里，一个活泼而顽强的生命呱呱坠地……子民们忘不了这一天——

炎帝神农的生日，从漫漫洪荒走向农耕文明。

千人组成的一个个文艺方阵，由红、黄、蓝、绿四色构成。看，那四条彩龙，那无数面龙牙旗，都是这四色，都是这给人以凝重、纯净的四色。有人注释说，那红的是太阳，黄的是土地，蓝的是青天与碧水，绿的则是奋斗不息、开拓进取的生命！

“祖宗功德，历久弥彰”。炎黄二帝被后人视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

象征，亿万华夏后裔以炎黄子孙自谓。这天参加祭祀的，有的来自炎帝神农植五谷的水河畔、尝百草的九龙山前，有的来自祖国心脏北京，有的来自宝岛台湾。大家同为炎帝神农的汉白玉雕像揭幕，同在九龙山上植下长青的纪念树。

自称为炎帝神农154代孙的台北“姜氏宗亲会”常务理事姜竹先生说：“我这是第二次到厉山，去年是来寻根，今年是来朝祖。要来寻根和朝祖



的海外炎黄子孙数以千万计！”

专程自京赴随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黑伯理的致辞宣称：“炎帝神农生辰纪念活动，是一件有益于联结和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感情的好事！”

历史将会记住，在湖北省随州市房山炎帝神农故里，海峡两岸的当代人合成了齐步行进的方阵！

炎帝神农故里关于炎帝神农生辰的纪念活动，民间不知已持续多少年了。改革开放以来，单项的生辰纪念活动年年都有，但由政府出面以此为契机的综合性系列文化活动，今年还是第一次。

专程来到随州市的海内外炎黄子孙，上午赴房山朝祖，参加生辰纪念大会；下午，又参观当今世界首家“编钟陈列馆”。10多路朝祖团，既观赏了编钟陈列馆的种种珍贵展品，又登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著名的擂鼓墩。

新开馆的随州编钟陈列馆，既珍藏着擂鼓墩二号墓编钟的真品，又保存了擂鼓墩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真是个“得九州神韵，极天地大观”。无怪乎36件一套的2号墓编钟，建国35周年在香港展出时，被海外舆论惊呼为“精神世界的圣山”。

聆听编钟古乐队的演奏，“悠悠然千古雅乐，郁郁乎三楚之风”，使人如痴如醉。世界上最早的有着五个八度音的古老乐器，至今仍金声玉振、旋宫转调。从抑扬的《春江花月夜》到激越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从悲怆的《苏武牧羊》到豪放的《神农风》，古今中外，大调、小调，莫不令人拍案击节。

当晚，又看随州花鼓戏《古墓花魂》，这个题材就来自擂鼓墩曾侯乙

墓。写的是21名女子不甘心为旧制度殉葬的故事。人们感叹说：时光可以流逝，几千年积淀的荆楚文化，却愈来愈深厚。

黑伯理同志对记者谈来随的感想时说：“炎帝神农文化的精髓，一是创造，二是奉献。看编钟陈列馆，听随州戏曲，我们感受到的是神农故里今日的创造与奉献！”

是的，“创造与奉献”恰恰是今年炎帝神农故里活动的主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薄一波亲笔题词致贺，执行会长、老将军萧克也题辞云：“弘扬神农精神，建设古乐之乡。”

随州市举办这次炎帝神农生辰活动，除旨在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之外，发展贸易，促进经济建设，也是题中之义。

节庆期间，各地来宾奔赴随州市一些出口厂家参观。参加“随州市外贸大楼”落成剪彩，各路经贸代表也乘机频繁接触进行洽谈，并已获若干成果，签字合同金额超出了有关方面预想。有一些经

勇尝百草教民稼耕
大智先祖伟哉神农

薄一波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薄一波同志（左上图），及他为炎帝生辰纪念活动的题词。

贸团体也前来“借神农之光”，想以随州为步入大市场的“跳板”。可望炎黄神农故里随州将不断出现无愧于先贤、无愧于时代的创造与奉献。



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91年5月10日)

李瑞环

本来和萧老约定的不讲话，看见这么多老同志出席会议，很感动，讲一点表态的话。

首先，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对革命前辈、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表示崇高的敬意。中华炎黄文化也可以说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遗产。在当今世界上，凡是炎黄子孙，不管他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他良知未泯，都不能不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而感到自豪。

毛主席很重视民族文化。早在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历史。这里当然包括历史文化。他自己就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我曾说过，谁要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历史进步的大事情，离开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研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是难以成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而是在长时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一个特点是，继承性和延续性。有的可以影响几百年、几千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是由新民主主义经济、新

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文化组成。同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也一定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所组成。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什么样子，我一下子说不清楚，但也可以断言，它一定有着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离开了最广大的群众的积极参加，这个事业是完不成的。如何把更多的人的精神振奋起来，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基本路线的教育，基本国情的教育等等。我想，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通过各种活动，把民族精神振奋起来，把炎黄子孙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振兴我们的国家，一定是大得人心的。我们的民族第一不懒，第二不笨，第三人不少，第四地方也不小。现在我们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建国几十年的经验，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完全可以把事情办得更好。

参加研究会的同志许多年事已高，各级党政部门特别是各有关研究机构，要主动地支持，提供方便。我愿尽力为研究会服务，和大家一起做好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

• 李瑞环同志这篇讲话，已发过摘要，现应读者要求再发全文。

汉族与支那·华夏·中华民族

· 常征 ·

释中华民族名号演化的历史,需从汉族说起。

汉族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据《汉书地理志》,早在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统计,即达59,594,978人之多。少数民族如匈奴、西羌、鲜卑、乌桓、高丽、沃沮、夫余以及西域诸国、西南夷、南越,还有众多的小邦族部落,其人口不列于郡县编户,未计入内,这近6千万的数字基本上是汉族。这就是说,当时的汉族就比同时代的两个世界大国—阿萨(西息)帝国、罗马帝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明古国,不论是埃及、亚述、印度,还是希腊、罗马,都一个个地瓦解了,创建各该古国文明的民族,也都消失或沦落了,只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仍在不断发展。其主体居民很早就形成了文化发达而凝聚力极强的稳固的汉族,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汉族”一名,源自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汉王而以汉水沿岸的汉中郡城为王都,因称“先有汉水,后有汉族”。汉族之名未通行以前,便已有了“秦人”的通称。颜师古在《汉书西域传》“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丐若马”一句时便说:

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称“中国人为秦人”不独匈奴,所有中亚、西亚及大部分欧洲民族也大都如此,据清代外交官薛福成《出使日记》说:

欧洲各国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纳,法曰细纳,义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字之音译也。余谓秦始皇时国威虽盛,其势力固未达今之欧洲,何以欧人乃呼中国为秦?撰厥由来,当由秦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欧洲此土,今俄、奥、土耳其、日尔曼诸国、未必无匈奴之遗迹存留。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相沿之而不改耳。

薛氏以采依纳、细纳、西奈、期纳为“秦”字译音,是正确的,而谓“赫依纳”也音译自秦及俄国人也称中国为“秦”,则误。因为日尔曼民族的祖先自北欧沿海进入罗马帝国境内时,最先遇到并且臣服的是西迁欧洲的匈奴王阿提拉,即欧洲人所惊惧的那位“上帝之鞭”,故称匈奴人的故乡中国也曰“匈奴”(赫依纳)。俄罗斯人最先接触的是中国契丹族(今达斡尔族祖先)建立在中亚的西辽帝国,故称中国曰“契丹”,译音即作“卡丹尔”。至于说英法西等国之呼中国为秦,源自西迁的匈奴人,而匈奴人之西迁欧洲事因秦始皇之逼逐,则尤疏于史实。因为统一六国前数十年,西亚人和欧洲人便已称中国曰“秦”,其原因乃“由于印度”。

印度人之与中国接触,至晚也在春秋时代。

夏王朝以前,失部落联盟“天子”之位的帝颛顼氏,便已率其宗人亲族自河南转溯长江进入川西盆地,联合当地部落建立了以“蚕丛”“鱼凫”等为名的部落联盟。周王朝时,巴蜀人以周王朝臣民的名义赴印度贸易,印度人最初称中国曰“真丹”或“震旦”。可能便是“周”译音。公元前327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帝东征印度时,便沿途收买中国丝绸、铁器(当时印度、西亚、欧洲人还不会冶铁,更不会炼钢)。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5年),秦惠文王使司马错、张仪灭巴蜀两王国,疆界南越元江,西过高黎贡山,川滇商人再赴印度即以秦人自称,改称中国曰“秦尼”或“支(岐)那”。《马哥李罗游记》说:南洋诸国称麻六甲海峡以北的中国海曰“cin”海。法国人沙海昂为该《游记》作注,也说葡萄牙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之“称中国曰cine, china, chine, 皆为支那之种种写法”。就是中南半岛也因位于印度、中国之间,而被西方人名曰“印度支那半岛”。

秦之一名出现前,还有两个通行的名号曰“夏”,曰“华”,或联称曰“华夏”,即华夏人居住的地域也已被称作“中国”。如周王朝便自称其邦族曰:“我有夏”;齐率诸侯之师御赤狄救邢卫,管仲便说:“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夹谷之会,齐人使莱夷劫盟,孔子便斥责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谷梁传》论春秋初期形势说:“南夷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缕”;《史记》说: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越王无疆“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凡此之类皆华夏、中国之名早已出现的证明。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部落联盟时代是人类“文明的入口”。部落联盟早在炎黄以前便已出现,只不过都是地域性的,多部落联盟并立的,至炎黄才进入全国性部落联盟时代。

古称部落联盟大酋长曰“天子”或曰“帝”,加盟的诸部落酋长曰“诸侯”。黄帝部落联盟在其存世的大约三百年中,不论“天子”出自其部落的轩辕氏、有熊氏、公孙氏、大(帝)鸿氏、缙云氏等等哪一个氏族,也无论其行政中心在哪,都保持了统治全国的地位。而且以后的历届部落联盟的“天子”,也都是其部落的后裔。部落联盟虽然还不是国家,但已有了国家的某些职能,而且越到后来这种职能越发展。可以说成是“准国家”。部落联盟时代的居民共同体,尽管还取部落联合的形式,而由于部落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休戚与共的关系,语言渐趋一致,在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的共同心理状态渐次接近,终于还是出现了民族的若干特征,从而便可说是“准民族”。当最后一届部落联盟的“天子”之位落入“夏伯”禹氏之手后,传至启,便废除氏族贵族民主制,改行“帝”位世袭,国家这种社会组织便正式出现,民族这种新型的居民共同体便也正式形成。这民族的名号便是“夏”,故自此以后由部落发展成的诸侯邦国皆自承夏族一部分而被称为“诸夏”。

作为夏族的别名“华族”,近代史家皆谓源自华山,不确。而是源自华水。即今颍河。殷周以后,颍水名盛,华水一名虽近湮没,而《国语》尚载之。

据郦道元《水经注》,颍(华)水出少室山,山在阳城北。阳城既是夏伯禹和夏启之都邑,而其东南侧之康城又是夏帝太康、中康旧封,流经两城之下的华水,由之便可作夏族的别名,犹之乎周人因太王居周原而称周族,吕尚因封营丘临天齐渊而称齐国,周公旦因初封河南鲁山下而称鲁国。华族之名与夏族并行,故世人联而称之曰“华夏”。华族分布之区曰“中国”,故又联名曰“中华”。

中华民族一名后世已经衍化为中国诸民族的共名,这与“支那”义同“中国”是一样的,只是前者主要为我国自称,后者是外国人对我国的称谓。

从上述“中华”、“支那”两名的历史看,中国人自称“中华”丝毫不含自大之意,外国人以“支那”(秦尼、采依纳、细纳、期纳)称我,也并无轻侮之心。而据《申报》1926年5月17日载,日本参议员三上参次在议会演说称:

(日本)皇室之尊严,非但在国内当绝对保持,即在国外,亦无二致。今中国妄自尊大,皆称中华,而我亦以中华呼之。读吾尊严,莫此为甚,亟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

这不但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野心狂妄,也说明他们出奇地无知。



震撼清王



工程兵营文领导熊秉坤

一次难得的会面

1961年10月，金秋的北京，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正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里隆重举行。

会议休息时，有三位老人在休息厅里欢笑聚谈，引起了不少与会者和记者的注意。

三位老人并排坐在一起，当中的那位看上去五十五、六岁，梳着分头，前额较宽，下巴稍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左边的那位，身材高大，留着两撇“将军胡”，看上去有七十多了。右边的那位，身材魁梧，长得豹头环眼，虽已七十五、六岁，但当年的雄风犹在。

只见中间那位“老弟”很动情地用双手拢住两位“兄长”的肩头。他对右边的长者说：“谢谢您，您不起来推翻清王朝，我还得不到改造呢！”又对左边的老人说：“如果您不把我赶出故宫，我哪里会有今天的新生啊！”

这位获得“新生”的老人就是当

年辛亥革命期间被迫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

左边的那位是原国民军京津卫戍司令鹿钟麟。1920年11月5日，他奉冯玉祥将军之命，率军警进入故宫，用枪杆子逼着这位末代皇帝搬出了紫禁城。

右边的那位则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传奇人物，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首先打响第一枪的勇敢的发难者——熊秉坤。

人们叹服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功，使这三位原来立场各不相同的历史人物，今天能殊途同归，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事。

这时，辛亥老人熊秉坤却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

从新军士兵到革命党人

1911年，熊秉坤在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任正目（班长）。那时，他是个性格倔强、善饮酒、好与人争论的热血青年。

熊秉坤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武昌，他的祖父是湖北的木材商人，如果不是家庭发生变故，成年后他或许会继承祖业，成为一个精于盘算的商人。可是他幼年不幸，父亲早逝，家道一落千丈，少年时便早早失了学，只好到别人开的店堂里去当小学徒。

张之洞在湖北招募新军，给这个生活在最底层的青年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用打算盘的手抓起了一枝汉阳造的步枪。军营生活艰苦乏味，每天要背着这枝枪出操、上岗、站岗。谁会想到日后这枝枪竟会发出震撼天地的一响呢？

时势把这个热血青年推到了革命

大潮之中。随着清末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革命党人加强了在湖北新军中的秘密活动。“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在新军中开展了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

“日知会”在武昌每周召开一次演讲会，会上许多革命者慷慨激昂地痛斥腐朽的清王朝丧权辱国、剥削百姓的罪行。一些新军士兵也控诉军队中长官腐化、等级森严，汉族士兵处处受旗人官兵的欺压……。熊秉坤在操课之余，参加了“日知会”的活动，他身同感受。

那时一些革命志士编写的宣传反清的革命小册子，如《警世钟》、《猛回头》、《孔孟心肝》、《扬州十日记》……开始在新军中流传。熊秉坤阅读后深受震动。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汉阳造”不应用于保护皇上的宝座了。

当革命党人组织“共进会”时，他立即申请加入，并在工程八营中联络发展会员。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工程八营内很快就有200多个弟兄入了会。

革命组织的各种活动，迅速地锻炼了熊秉坤的革命才干。一次，革命党人杨玉如问他：“你看，发动会党和发动军队，到底何者最紧要？”

熊秉坤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军队势力最大，军队一发动，势不可挡，事情就容易一举成功。”

这年八月初，熊秉坤又给共进会的首领孙武写了一封建议信，信中说：“……我们应当先调查各省的情形，再制定起事的计划。起事时应命令第四十二标中的同志发兵截断黄河铁桥，据守武胜关。起事的时间最好选择在夜间，以出其不意的手段袭击

朝的第一枪

郑一奇

各重要机关。然后用炮兵攻占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处。如果是白天起事，民众必多观望。广州、安庆起事失败就是前车之鉴。财政机关应当派重兵看守，以防匪徒乘机抢劫。起义后要立即出榜安民，号召各省、各府、各州县响应、反正。要与地方绅商订约，保商保民。与驻武昌各国领事订约，要求他们严守中立……。”

革命的大潮，已经把那个勇敢的弄潮儿推向浪尖。熊秉坤不再是那个只知道“三点一线”，“稍息、立正、向后转”的小班长了。他的信表明，他已是一个胸有全局、富有谋略的革命者了。

日后的起义行动正是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的。但是熊秉坤没有料到，斗争是如此严酷，革命会如此迅速爆发，他会成为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发难者，看来事情的发展的确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两起突发事件

湖北革命党人文学社和共进会原来准备在这一年中的中秋节（公历 10 月 6 日）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和黄兴等人取得了联系，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起义总指挥部，由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不料在起义之前，接连发生了两起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革命党人的部署。

9 月 24 日，新军炮队三营的士兵梅青福、汪锡玖要请假离营，同营的弟兄设酒饯行。士兵们借着酒劲，吆五喝六地发泄起来。军官刘步云前来阻止，梅、汪等人不服。刘步云一脚踢翻满桌酒菜，并向营长告发。营长不问青红皂白，把汪锡玖等各打 80 军

棍。士兵们见官长如此蛮横专制，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拖出几门炮就向军官宿舍轰开了。不料忙中出错，射出的全是教练弹，没有爆炸。等到再去弹药库取弹时，统制（相当旅长）张彪已率兵前来镇压。

湖广总督瑞澂立即召开文武官员会议，商讨如何镇压革命党人。会议决定：把士兵手中的子弹、炮弹一律集中保管，无上司命令不准动用。调水师巡防营驻守总督衙门和督署附近的各重要通道。命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部日夜巡城。派工程第八营驻守楚望台军械库。派军舰多艘日夜游弋。命军警、捕快、密探，严密稽查户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即逮捕，若是革命党人格杀勿论。

革命党人因准备不足，没有乘机起事，决定起义延期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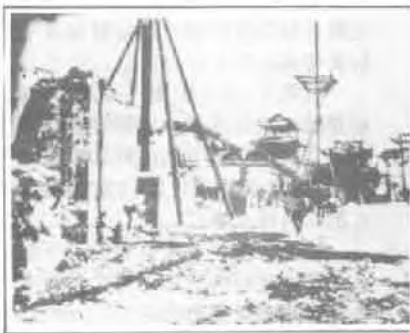
10 月 9 日，几个革命党人在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的后楼的小房内，设立了一个秘密炸弹作坊，正在赶制炸弹。参谋长孙武用一个脸盆在检验炸药。革命党人刘公的弟弟刘同来机关找孙武谈话。他一边上楼，一边点着了香烟。没料到火星落到了桌上易燃的炸药原料上，只听轰的一声响，顿时黑烟四起，孙武的手和脸被烧伤了。

共进会员李作栋正在楼下守望。听到爆炸声，急忙上楼，见孙武鲜血满面，昏倒在地，他急中生智，脱下长衫，将孙武的头脸裹住，找人抬下楼去，送往附近的同仁医院急救。

其余同志急忙把制成的炸弹等转移走。他们前脚刚离开，俄国巡捕后脚就赶到了。搜出了革命党人锁在柜里的准备起义时用的文告、旗帜、印信、名册、钞票、宣传品。并抓走了



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



革命军的攻击目标——清朝湖广总督署

刘同等人。

俄国领事如获至宝，立即将情况通知瑞澂，并把这些“战利品”和刘同引渡给清朝地方官。刘同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把他所知道的秘密机关地点和重要革命党人的名字全都供了出来。反动当局立即下令紧闭城门，派出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按名册进行搜捕，要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辛亥革命时期的部分革命报刊

敌人以为革命已被扑灭。10月10日瑞澂连发电请廷，吹嘘自己“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声称武昌地方一片平静，忙于邀功请赏了！

勇敢的发难者

熊秉坤和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接到起义命令后，暗中加紧了准备。他们收到了联络人员送来的少数子弹、炸药，自己又设法弄来36盒子弹。只要一听到炮响，就可以起事

了。在清朝官员审讯刘同的同时，革命党人刘复基等正在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向刚从岳州赶来的总指挥蒋翊武汇报情况。下午负责通信联络的邢伯谦风风火火地赶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了宝善里出事的情况。严重的意外变故，迫使革命党人立即作出抉择。刘复基说：“与其坐而待捕，不如立即发动起义，用铁与血和清朝死拚！”蒋翊武毅然决定：“别无办法，只有拚死，或可以死中求生！”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大意如下：决定当晚12点举行起义，先由城外南湖炮队的革命党人发炮为号，然后由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党人按计划响应……。命令复写20份，分头传送。

夜深了。在小朝街机关的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焦急地等候着南湖的炮声。突然从楼下大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蒋翊武忙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

楼下答道：“是来会你们老爷的。”蒋翊武一听话头不对，“是敌人！”他示意别人赶快撤走。

刘复基手拿两枚炸弹，沉着地说：“你们快走，我去对付他们！”话音未落，就往楼下跑。刚跑到楼梯中间，见军警已撞破大门，他用力扔出一颗炸弹，炸弹爆炸了，但炸力不大。他又连扔数弹，都没有爆炸。敌人一拥而进，将刘复基等抓住。

蒋翊武等人见势不妙，急忙翻窗逃走。这时楼前楼后都布满了军警。蒋翊武因身着长衫、马褂，留着长辮子，又声称自己是来看热闹的，军警以为他是个老学究，没加注意，他乘机溜

走了。其他人被捕了。

两个革命机关先后被破获，一批革命党人被捕。瑞澂以为危机已经过去。急命参议官铁忠、督署文案陈树屏连夜会审。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革命党人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承认自己就是革命党，大骂清朝统治者“末日就要到了！”经过草率地审讯，敌人残酷地处决了这三位革命党人。

烈士的鲜血激励更多的革命党人作拼死的斗争，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存亡在此一举了。尽管起义领导人孙武受伤，蒋翊武被迫转移，但是下面的革命党人仍在按已下达的命令准备战斗！只要南湖炮队的炮声一响，四面八方就可以发起攻击。

但是炮队的炮声却迟迟未响……。

原来受命到南湖传达起义决定的邓玉麟，因为全城已戒严，只好绕道而行。等他赶到南湖炮队，已是晚上12点了。炮队营门紧闭，他翻墙进去，找到革命党人徐万年，传达了12点起义的决定。徐说：“马上就要到12点了，这里人都睡熟，事先又没有准备，怎么发动起义呢？”

因午夜12点已过，南湖炮队又寂然无声，其他各部队的革命党人，也就不敢贸然行动。

凶残的

了。

时钟滴哒滴哒地走着，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南湖方向始终没有响起炮声，这下可急坏了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

第二天（10月10日）一清早，熊秉坤悄悄地叫革命党人李泽乾外出打探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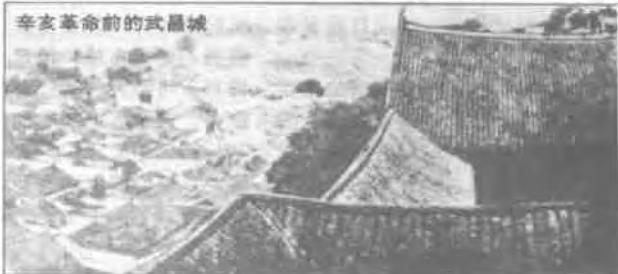
一会儿李泽乾急匆匆地跑回来，说：“城里戒严了，人们传说官府昨晚破获了谋反的机关，已抓走了好多人，还要按名单到处抓人！”又说有人还看到了官府杀害彭、刘、杨三人的告示。

熊秉坤见情势紧急，就利用吃早饭的机会低声对各队代表徐少斌、金兆龙等人说：

“我们防守军械库，应当首先起义。因为各营起义后，都必须到这里领取弹药，我们不动手，别营是不敢动手的！”

他们约定下午三点钟上完操以后起义，并通知了在楚望台执勤的革命党人接应。可是这时营里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停止出操。熊秉坤只好改为晚上七点以后起义，具体时间不定，约定以他的三声枪响为号。

10月10日这天，武昌的夜色是



辛亥革命前的武昌城

阴沉沉的，天空上布满厚厚的云层，见不到一点星光。浓云在天空翻滚，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熄灯号吹响了，只见工程八营各队的灯光很快熄灭了。可是部队的革命士兵谁也睡不着，有的在悄悄说话；有的偷偷地擦拭自己的步枪；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起义的信号……

这几天，营排军官多次接到上司的严令，要加强戒备，严格管束下属，严防革命党人活动。作为特殊措施之一：每天熄灯入睡后，由队官带兵把守宿舍入口，熄灯后不得出入。大小便者要先报告排长，照准后只准徒手出入，不得擅动枪架上的兵器……

熄灯号刚吹过，值日排长陶启胜就带了兩名护兵，到前后左右各队宿舍去巡查。陶启胜是个反动军官，平时待士兵就非常苛严，他听到后队士兵住的宿舍楼上还隐隐有嘈杂声，便急忙赶过去了，又想找茬呵责谁。

后队士兵们听到脚步声，知道是陶排长夜查来了，便迅速返回各铺，扯过军毯，盖住身子，装着睡熟了，有的还打出鼾声。

陶启胜进入士兵卧室，一个个检查铺位。他发现宿舍突然这般安静，宿舍一头的枪架上隐隐约约地有些空档，心中有些狐疑。当他走到正目金兆龙、程正瀛的铺位前，突然发现他俩毛毯下，隐隐露出两杆枪托。他心中一惊，便弯下身子，将军毯一掀，顿时现出两杆擦得明光闪亮、上了实弹的汉阳造步枪！

他厉声喝问：“你、你们准备干什么？”士兵在熄灯后持枪而卧，是违反条令，也是很反常的。

金兆龙本是革命党人，他胆大心粗口拙，叫陶启胜一问，顿时紧张起来，随口回答说：“我，我以防不测！”

陶启胜平时对金兆龙这些人就看不顺眼，现在抓住把柄，更不会放过。他一把抓住金兆龙的衣领，大声喝问：

“我问你！你小子是不是想造反？！”

金兆龙是少数几个戴有子弹的革命骨干，本来分工起事时就是要他枪杀反动军官的，这时他被逼急了眼，一时怒从心头起，回手抓住陶排长的衣领，大声说：

“你说造反老子就造反，你能把老子怎么的！”顺手操起了枪。

陶启胜平日受威风要惯了，哪里受得了这个气，顿时与金兆龙争夺枪支，扭打起来，还回头喝令两名护兵：“快把他捆起来，带走！”

两个护兵都是年青人，平日就同情革命党，又知道后队革命党人多势大，惹不起，就不敢上前抓人。

陶启胜见护兵畏缩着不敢动手，气更不打一处来，他就手拧金兆龙的胳膊，要自己动手抓人。

金兆龙急忙用手死死顶住陶启胜的下巴一边急呼：“伙计们，还不动手，等什么？”两人正相持不下，一旁的革命党人程正瀛见情势紧急，又气又恨。想开枪，怕打中了金兆龙，于是他举起枪托，对准陶启胜的后脑勺狠打一下，打得陶眼冒金星，顿时扑倒在地。陶启胜挣扎着爬起来就往外溜，程正瀛朝着他开了一枪，陶负伤而逃。

熊秉坤闻声赶来，看到陶启胜跌跌爬爬地跑下楼来，他照着陶启胜又开一枪，正中小腹。陶启胜带伤逃回家中，不久就毙命了。这枪是在营房外打响的，枪声清脆，无形中成了发动起义的信号！

熊秉坤、金兆龙、程正瀛等革命士兵，看到事已至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便举起步枪振臂高呼：“弟兄们，反就反吧！起义的时候到了！”

这时工程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等，听到枪声，立即带兵前来弹压。他们堵住楼门，一面放枪，一面向楼上的士兵们喊话：“喂，楼上的小子听清楚了，你们的父母妻子都住在本地，这样叛逆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要灭门九族的，还不快快放下枪，不要胡闹了！”

起义的士兵根本不听这一套，顺手抄起痰盂、花盆、瓦罐、板凳往下砸，要他们让路。他们不退。起义士兵用仅有的几颗子弹，击毙了阮荣发、黄坤荣。其他反动军官见势不妙，有的越墙逃走，有的吓得钻入厕所。

熊秉坤连吹警笛，把起义士兵召

集起来，当时人声嘈杂，应者仅 40 多人，他们撬开营区内的枪械室，找到开口军刀 24 把分发后，即跑步奔向楚望台。出营门时，熊秉坤按照预先约定，又对空鸣放三枪，作为通知其他部队发动起义的正式信号。

这是公元 1911 年 10 月 10 日（阴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夜晚 8 点钟。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革命党人盼望已久的起义信号终于打响了，埋葬清王朝的革命烈火，终于点燃了。

这时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熊秉坤带领 40 多名士兵跑步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到达军械库时，方知那里革命士兵已按约起事，赶走了反动军官，他们会合后占领了军械库，库内大量枪枝弹药，为革命党人掌握。

熊秉坤以本营总代表的身份，向大家宣布说：“从现在起，我们的军队叫湖北革命军。今天晚上的作战目标是攻占总督衙门，以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口令是‘同心协力’”。

宣布命令后起义士兵越来越多，秩序也比较乱。熊秉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稍有差错，就会功亏一篑。他想不少士兵们在旧军队中生活久了，只知道以服从长官为天职，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缺乏领导起义的威望和指挥经验。便去找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商量。

吴兆麟平日同情革命党人，参加过日知会，这时因事起突然，吓得躲了起来。

在熊秉坤的革命士兵的拥护下，吴兆麟只好答应出任起义临时总指挥，熊退居副职。吴兆麟要求士兵们

武昌中和门，起义军炮兵由此入城



绝对服从命令，并对起义部队攻打总督衙门作了部署。

这时南湖炮队也把火炮抬了出来，架在中和门城楼、楚望台和蛇山等制高点，向总督衙门炮轰。隆隆的炮声震动了武汉三镇，震撼了全中国！约有 2000 人的革命军在吴兆麟、熊秉坤率领下，开始了对总督衙门的浴血奋战！经过一夜激战，牺牲了不少革命同志，但终于攻占了总督衙门。武昌起义取得了最初的胜利。这个胜利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终于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震撼清王朝的第一排枪声终于打响了。这是革命党人中的普通士兵创造的一个奇迹！这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宣告了统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宣告了共和国的新曙光的到来！

尾声

1919 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与熊秉坤见了面，畅谈武昌首义之事。

孙中山先生向在座的其他客人介绍说：“这就是打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

从此“熊一枪”的名声远播海内外。

有人认为根据具体史实，先打第一枪的应是程正瀛。因为是他先向陶排长打枪的。但是在整个发难过程中熊秉坤自始至终都是领导者，熊秉坤向天发三枪，才是起义的正式信号。

应当说：“熊一枪”，是对首批发难的革命士兵代表的赞誉。这些革命士兵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勋。

熊秉坤因首义之功，起义后第五天，被推任为革命军第五协统领。后又授予陆军少将之衔。

建国以后，熊秉坤受到人民政府的多方关照，出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事室参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61 年他同其他辛亥老人一起到北京出席辛亥革命 50 周年纪念大会。于是有了开头的那段非同寻常的会面。

1969 年 5 月 31 日熊秉坤逝世，享年 83 岁。

（责任编辑：仲文）



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孙中山，真名孙文，因为在檀香山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所以被尊称为孙中山。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海内外革命志士，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并高举武装斗争的大旗，率领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无数次英勇的起义。

1906 年，湘赣边区萍乡、醴陵一带爆发了工人、会党、农民的联合大起义，同盟会闻讯后立即派出黄兴、宋教仁等兼程前往领导。1907 年，光复

最后一顶

——辛亥革命史话 / 王梦斯

山雨欲来风满楼

满清王朝自 1644 年入关以来，统治中国达 260 年之久，但到了后期，由于统治者昏聩无能、闭关锁国，八旗子弟游手好闲、腐化堕落，领先于世界几百年的中华民族却反而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各资本主义列强，先后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积贫积弱的中国，蚕食鲸吞，掀起了瓜分的狂潮。中国一步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深渊，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国人民怎甘沦落？！新生的资产阶级先后两次登上历史舞台，进行了悲壮的挽救民族危亡的尝试。一次是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变法维新运动。不幸的是，这场改良运动只进行了 103 天就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再一次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轰轰烈

烈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组织武装暴动，杀死了安徽巡抚恩铭，女会员秋瑾在绍兴密谋响应，但结果都以流血牺牲而告结束。同盟会鉴于内地起义屡次失败，革命党人牺牲惨重的状况，自 1907 年起改变策略，先后在西南边区组织武装起义。他们认为，西南边区是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起义所需军火容易从国外运进来，即使起义失败，革命党人也容易逃出去。但是，1907 年发动的惠州、钦廉、镇南关的几次起义和 1908 年的河口之役，又都接连失败。1911 年，同盟会集中党内骨干，倾全力发动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广州起义，但因内部行动不一致，所联系的军队未能及时响应，经过一夜激战后终于再次失败，损失了 72 名骨干会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 72 烈士。

1911 年 1 月，清政府准备把沪杭甬、粤汉和川汉铁路筑造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者，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回

过头来镇压国内革命运动。此事激起了全国的保路风潮。湖北、湖南、四川和广东四省为铁路兴建或所经之地，人心更为激昂，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甚至拿起了武器。保路风潮与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终于汇合到一起，眼见革命大风暴就要来临。

黄鹤楼前革命潮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革命首先在中原重镇武昌爆发了。

早在这年6月，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谭仁凤、居正等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作为在长江流域策动起义的指导机关。这批同盟会会员大多为两

督瑞 下令紧闭武昌各城门，封锁新军所有的营房，不许士兵外出，并调旧军在重要街口施行紧急警戒。被困在营中的新军士兵以为革命党人名册已被搜去，清兵正按名册捕人，与其紧张地坐而待毙，不如拼死一战，他们个个象顶上盛的炮弹，紧张地等待着那生死攸关的一刻。晚上7时，驻扎在武昌的新军工程第8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前来查夜，发现了准备起义的副班长金兆龙等人的异常行动，厉声问道：“你在干什么？想造反吗？”金兆龙咆哮说：“老子就要造反，你要怎样？”说着就与陶启胜扭作一团，一面提高嗓门大叫：“兄弟们，此时不动手，

国际边境特区外，共十八个行省，十八星代表全国十八个行省），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了胜利。

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建立起了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当时，幼稚的革命党人认为，军政府应该由有名望的人出来主持。但由于众望所归的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则在香港，起义前推举的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鄂军都督刘公也都不知去向，一时竟若群龙无首。于是，革命党人便邀请地方绅商举行会议，决定推举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旅长）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皇冠落地



三岁登基时的宣统皇帝溥仪

湖人士，因而很快就与湖北的两个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取得了联系。

保路风潮发生后，湖北全省人民群情激昂，革命时机已经成熟。9月16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为参谋长，定于10月6日（中秋节）举行起义。后因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起义推迟至10月11日。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刘公家中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巡捕在屋内搜出炸弹及革命党人名册等。据此蒋翊武临时决定，提前于当晚12时起义。当天下午，情况再次发生变化，清军到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当场捕去彭楚藩等5人，只蒋翊武一人逃脱。由于全城戒严，担任传达起义命令的邓玉麟，未能及时完成任务，因此当晚的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第二天，即10月10日，湖广总

更待何时！”别的起义者随着冲上去，用枪托向陶的头部猛敲一下，陶顿时头破血流，狼狈而逃。有人举起枪向陶开了一枪。

枪声一响，军营里就炸了锅，士兵们纷纷冲出营房，高喊“起义了！起义了！”共进会会员，班长熊秉坤立即集合了也有了几十名士兵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守卫军械库的士兵积极响应起义，公推左队军官吴兆麟担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他们占领了军械库，并拖出大炮，向总督衙门发炮射击。在隆隆的炮声中，武昌起义拉开了序幕。

工程第8营首义后，步、马、炮、工、辎重各营的新军纷纷响应，经过一夜的浴血奋战，革命党人占领了武昌城。湖广总督瑞 从总督衙门后墙打洞逃往停泊在武昌江面的楚豫兵舰上，新军统制张彪逃到刘家庙火车站。接着，革命军光复了汉阳、汉口。11日，武汉全城已无敌踪，革命军在蛇山和黄鹤楼升起了十八星旗（当时全

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北洋水师广甲舰上任职，甲午战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遂回到湖北，投靠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并由管带（营长）升任新军协统。由于黎元洪面目方正，讲话慢条斯理，因而在汉族官僚中获得了“忠厚”、“开明”的赞誉，号称湖北新军“名将”。革命党人以为推举他做都督可以威慑朝廷、号召民众，壮大革命声威。但是，当革命军找到他时，他却以为革命军要把他抓去枪毙，吓得面如土色，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最后革命军象押解犯人一样，把他“请”到了军政府，强迫他签发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第一张告示。一个与清王朝对抗的革命政权就这样诞生了。

黎元洪当上都督后，接连几天不进食，不说话，还曾两次企图从都督府逃跑。当时，革命党人张振武等主张把他杀掉，另立新都督，但吴兆麟等一再加阻止。他们认为，既然



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北洋军阀冯国璋

庙有了，菩萨也有了，菩萨本来就是不言语的，庙里的事情，自当和尚来管。于是，革命党人推举了吴兆麟、王尧章等组成“十人谋略团”，负责主持军事，对外使用都督名义。因而都督府中人人背地都称黎元洪为“黎菩萨”，不久“泥菩萨”之名很快就传遍了武汉三镇。不管“黎菩萨”也好，“泥菩萨”也好，黎元洪却因此得到了“开国元勋”的美名，后来竟爬上民国总统的宝座。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各府州县也纷纷赶走清朝官吏宣布独立。武汉三镇的市民更是人心沸腾。人们都把革命的胜利当作自己的大喜事，大街小巷随处都能听到他们高谈阔论地说：“这下子压在我们头上的清朝皇帝和狗官们倒下了，从此我们四万万同胞都成了一品老百姓，四万万人就是四万万个皇帝。”

革命大潮涤荡着各种陈规旧俗，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首先革除了“大人”、“老爷”这类不平等的称呼，磕头、作揖、打千等旧礼节也被废止，代之以握手、脱帽或鞠躬。

剪辫子更是雷厉风行。脑后垂辫，是满族人关后强加于各族人民的一种怪现象。武昌起义炮声一响，辫子就成了“亡国奴”的一种标记，剪迟了，要受到“千夫所指”、“万人笑骂”，而且，你不剪，有人替你剪。走在大街上，往往碰上一向不相识的人，拦路揪住，拿出利剪，硬是把辫子连根剪掉，路人拍手欢笑。也有一些顽梗不化之徒，害怕脑后空空，生前见不得皇帝，死后对不起祖宗。他们把辫子

盘在头顶，用一顶大帽子盖起来，有的索性改成道士装，这种人被称为“遗老遗少”。

女子最流行的是放足。女子缠足是千百年来封建社会摧残女性的一种陋俗，习惯势力认为女子不缠足不美，嫁不出去。革命前以三寸金莲为美，革命后却都以小脚为丑了，不但闺门少女不约而同地决心不再缠足了，不少成年妇女也把缠脚布扔在茅厕坑里，放成一种不大不小的“黄瓜脚”。有人打趣地说：“辛亥革命，男子解放头部，女子解放了足部。”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武昌起义有如一声春雷，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

就在武昌起义后 12 天，湖南新军首先响应，宣布独立，推共进会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为正副都督。清朝巡抚余诚恪化装逃走。按照两湖革命党人事前约定，无论哪一省率先发动，另一省就立即响应。湖南宣布独立，解除了湖北的后顾之忧，起到稳定革命局势的作用。但是湖南的革命政权很快就被君主立宪派分子篡夺了。革命刚开始，立宪派就制造舆论，诬蔑焦达峰是“土匪头子”，不配领导革命，随后又成立了与都督府分庭抗礼的“湖南参议院”，公推谭延闿任民政部长。立宪派反对暴力革命，指革命党人为“暴徒”，他们还鼓动反动军人梅馨：“你是正规军师长，应该代替土匪头子当都督。”10月30日，梅馨制造兵变，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由于湘军五个师长不相上下，梅馨的

都督梦也未做成。最后，谭延闿在立宪派的千呼万唤下继任了湖南都督。这一反革命兵变，距离湖南起义竟不到 10 天。

江西独立是从九江开始的。10月23日，九江新军中的一些下级军官响应武昌起义，共推 53 标标统（团长）马毓宝为都督。马毓宝本来同革命毫无干系，但有黎元洪的先例，他也就同意了。九江独立消息传到南昌，10月31日，南昌新军士兵和陆军小学、测绘学堂的学生们也宣布起义，推举新军第 27 标协统吴介璋为大都督，成立江西军政府，并把原巡抚冯汝霖恭恭敬敬地送出了南昌。江西独立后，革命军上演了“三夺帅印”。先是测绘学堂教员彭程万打着黄兴的名义赶走了吴介璋，自己坐上都督，后来九江都督马毓宝率兵进南昌再赶走彭程万，当上了全省都督，但马都督也没站住脚，最后由江西咨议局推举同盟会会员李烈钧为都督，这种走马灯式的变局，时人称为“百日三都督”。

10月31日，云南新军协统蔡锷宣布起义，被推为云南都督。蔡锷是立宪派梁启超的学生，师生关系良好，起义后，梁授意蔡“运用滇军，兼并川鄂，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因而独立后，蔡锷速派兵入川、入黔，赶走了两地的革命派。唐继尧自封为贵州都督。此后，滇、川、黔都成了立宪派的天下，贵州长期沦为云南军阀的附庸。

江苏独立最早的地区是上海，策动者是光复会会员李燮和与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光复会本已在同盟会成立



清朝湖广总督瑞澂

北洋军阀段祺瑞

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

时加入了同盟会，后来由于光复会首领陶成章与孙中山闹不和退出了同盟会。上海光复后，著名绅士伍廷芳等在城内海防公所开会，选举沪军都督。敢死队队长刘福彪手持炸弹，威胁与会诸人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大家面面相觑，不敢作声，遂成定局。陈其美就职后，李燮和忿而出走，在吴淞组织了军政府，声称直接听命于湖北军政府，不受沪军都督节制。后来，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了光复会的陶成章，李燮和遂结束军政府，率军加入江浙联军去进攻南京。

江苏的第二省会苏州，在上海独立后，也由大绅士张謇等人酝酿独立。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张謇的劝说下，于 11 月 5 日在巡抚衙门前挂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改巡抚为都督，又命人用竹竿在房顶上掀翻几片盖瓦，表示革命，大功就算告成。

总之，武昌起义后，民主革命浪潮席卷了南方各省。短短一个月间，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江苏、浙江、安徽、广西、广东、上海各地相继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同时革命潮流也波及到北方，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乃至东三省也都纷纷独立，真是：大风起于萍末，星火可以燎原。

奸雄欲取渔翁利

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吓坏清王朝统治者。载沅在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急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平乱”。10 月 14 日，清廷下令从北

洋军第二、四、六三镇中抽调军队，组成平乱第一、二两军，开赴湖北前线。但是，荫昌率军到达湖北孝感后，军队却不听他的指挥，荫昌一筹莫展，只好急电载沅，称前线之事，非袁世凯不可。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经过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和戊戌维新时告密有功，官运亨通，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所训练的北洋新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等于是他的私人武装，他也成了北洋军阀的总头子。

光绪皇帝驾崩，载沅摄政王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患有足疾”为名，把袁世凯放逐回老家。原来，戊戌维新时，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斗争十分激烈，慈禧太后反对维新变法，打算废黜光绪，重新亲政。当时，维新志士谭嗣同深夜走访袁世凯，拿着光绪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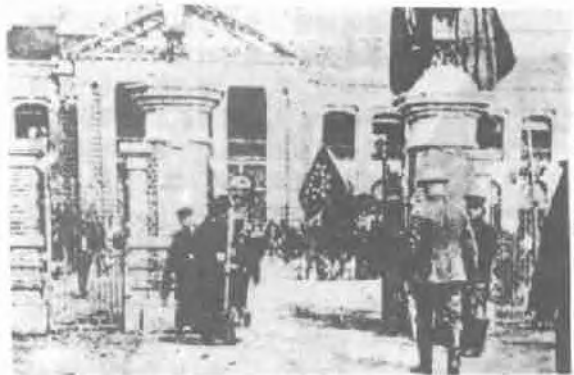
帝的御旨，要袁世凯利用其北洋新军在天津会操时发动政变，拥护光绪皇帝。但是，袁世凯玩弄两面派手法，当面答应谭嗣同的请求，随后就向慈禧太后告了密。结果，慈禧太后抢先一步囚禁了光绪皇帝，杀害戊戌六君子。据说，光绪皇帝被囚在瀛台，把袁世凯恨得要死，他终日无事，就在纸上写着“袁世凯”三个字。横写是一个袁世凯，竖写也是一个袁世凯，然后把这些纸撕成碎片，表示横竖要将袁世凯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光绪皇帝临死前，招他的弟弟载沅到瀛台，交给载沅一纸遗诏，上写着“诛袁死凯”四个大字。并泪流满面地对载沅说：“我这一生，误我者有两个人，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是袁世凯，此人不除，对我大清江山遗害无穷！”载沅记住了光绪皇帝的遗命，所以上任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除掉袁世凯。

但是，要杀掉袁世凯谈何容易，不仅十几万北洋军死命效忠他，就连各国列强也都替他说话。杀袁世凯事小，倘若引起北洋军哗变，招来列强的干涉那可就不得了啦。权衡再三，只好发一纸“宫门抄”，“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病”，把他逐出京城了事。

袁世凯被载沅赶下台后，并没有回原籍河南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彰德府外洹上村住了下来。表面上，他不问世事，经常跟一些亲朋幕僚饮酒赋诗，还化装成渔翁，披一件蓑衣，垂钓于洹水之上，以显示他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暗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随时准备东山再起。果然，武昌起义一声炮



这是在河南信阳脚前不前北洋军营地



起义后的湖北军政府大楼

面的车子开不走，后面的车子过不去，一片混乱。荫昌又气又怕，气的是北洋军将领故意捣乱，怕的是如果这些将领造起反来，搞不好自己脑袋都保不住，所以只好打电报给袁世凯，要求迅速启用袁世凯。

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驻华公

使朱尔典、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等也在北京外交使团会议上放出空气，说袁世凯是当代军事奇才，北洋军由其亲手练成，只有重新启用他，才能指挥自如，扭转局面。不得已，清廷只好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叫他会同荫昌指挥前方各军。

袁世凯接圣旨后一阵冷笑，当即奏报清廷，称：“足疾未痊，一时尚难起程。”袁世凯这一招，实际上是“你患你的急惊风，我做我的慢郎中”，借此向清廷要挟，争取更大的权力，好继续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但他的幕僚们却不明白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公推杨度向袁询问。袁听了哈哈大笑，说道：“哲子（杨度的号），你是聪明人，怎么不懂我的意图？你知道拔大树的方法吗？专用蛮力去拔，根本无法把大树连根拔出，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折断。要想连根拔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气即可一拔而起。清朝是一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起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得如何拔树，先让他们把泥土松动了，用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把它连根拔起。”一席话说得杨度频频点头称是。

响，这位闲云野鹤就立刻活跃起来了。

这次调往湖北镇压革命党的军队都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命令一发，袁手下的“三杰”之一冯国璋，便悄悄地赶到彰德滙上村面见他的慰帅，请示方略。袁当下指点迷津道：“现在的形势是革命党不一定成功，清廷也不一定失败。咱们北洋军既不能为清廷火中取栗，也不可替民军呐喊助阵。”冯会意地点头道：“按慰帅的意思，咱们应坐山观虎斗喽？”袁紧盯着冯说：“今天你去前线，我送你六个字，你当照计而行。”说罢，袁用食指往茶杯里一蘸，在桌子上写道：“慢慢走，等等看。”

冯国璋得了袁世凯的六字诀，马上就向北洋军军官作了传达。结果，荫昌奉命出发，北洋军却磨磨蹭蹭，部队走一站停一站，从武胜关以南各站挤满了兵车，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前

面的车子开不走，后面的车子过不去，一片混乱。荫昌又气又怕，气的是北洋军将领故意捣乱，怕的是如果这些将领造起反来，搞不好自己脑袋都保不住，所以只好打电报给袁世凯，要求迅速启用袁世凯。

袁世凯接圣旨后一阵冷笑，当即奏报清廷，称：“足疾未痊，一时尚难起程。”袁世凯这一招，实际上是“你患你的急惊风，我做我的慢郎中”，借此向清廷要挟，争取更大的权力，好继续他自己的如意算盘。但他的幕僚们却不明白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公推杨度向袁询问。袁听了哈哈大笑，说道：“哲子（杨度的号），你是聪明人，怎么不懂我的意图？你知道拔大树的方法吗？专用蛮力去拔，根本无法把大树连根拔出，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折断。要想连根拔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气即可一拔而起。清朝是一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起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得如何拔树，先让他们把泥土松动了，用不了多久咱们就可以把它连根拔起。”一席话说得杨度频频点头称是。

10月27日，清廷被迫再向袁世凯让步，下诏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到前线接替荫昌。袁接诏后，当即密电冯国璋猛攻汉口。冯得令后，召集军官进行动员，告知袁官保已重新出马统帅北洋军，鼓励部下要拼死进攻，为这个衣食父母争光，同时许诺，攻下汉口后，可以三天不封刀（意思是可

以随便烧杀抢掠）。29日，北洋军开始进攻汉口。汉

革命军在战壕内作战



革命军的炮兵在开火

两面要挟坐取渔利的计划，一面利用革命军对付清廷，让清廷把大权交给他，一面利用清廷要挟革命军，以便夺取革命果实。攻下汉口后，袁便派出密使，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武昌与革命军联络，商议停战，但遭到了革命军的拒绝。当时，革命军的斗志仍然十分旺盛，尤其是黄兴来到武昌，亲自督战，更使革命军为之一振。袁意识到还必须给革命军打击，才能使其就范，遂命令冯国璋进攻汉阳，务必毁革命军斗志。11月21日，北洋军强渡襄水，直扑龟山，26日攻下汉阳，革命军再次退守武昌。占领汉阳后，袁下令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轰击武昌，威吓革命军，同时，再次进行停战试探。12月1日，在英国驻汉口公使的调停下，北洋军和革命军达成了停战协议，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武



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部（小朝街 85 号）

汉战火一停，袁世凯两面要挟，坐取渔利的计划已进行了一半，接着，他开始腾出手来对付清王朝了。

皇帝退位民国兴

11月9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3日，袁率大批卫队回到北京，正式组成责任内阁，大权在手，便开始加紧实施他的两面要挟计划。

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回到了上海。29日，革命军17个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商议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更加紧了夺权活动。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袁指使其手下48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宣称“誓死拥护君宪，坚持反对共和”，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而此时，南京临时政府内部妥协派的主张已逐渐占据优势。他们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认为袁世凯既有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又有帝国主义作为后盾，势力非常强大，革命军不可能战而胜之，只要袁表示拥护共和，能够迫使清帝退位，不如说服袁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廷，达成革命目标。幼稚的革命党人也以为，只要推翻清王朝，由汉人来统治中国，革命就算成功了。因而越来越多的同盟会员主张和袁妥协，作为条件，孙中山可以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结果，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达成默契，只要袁正式宣誓赞成共和并推翻清王朝，就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因此，孙中山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打电报给袁，表示“暂时承之，以待贤者”，就职后又致电向袁保证到一定时候要“推贤让能”。这样，局势发展的焦点就集中在清帝退位的问题上了。

任何统治者都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清统治者不到最后关头，是不肯轻易把皇位拱手让出来的。尤其当时在清贵族中还有以良弼为首的死硬派，他们极力主张推翻袁世凯的“奸细内阁”，重组皇族内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说不定还可获得一线生机。这些死硬派无疑成了袁的绊脚石。凭袁手中的武力，压迫清帝退位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不想背上“活曹

操”的骂名，让世人说他欺侮“孤儿寡母”，所以不肯轻易上演“逼宫”戏。

无巧不成书，1月26日，革命志士彭家珍刺死了良弼，顿时死硬派失去了主心骨。同一天，以段祺瑞为首的47位北洋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巩固皇位而奠大局”。没隔几天，段祺瑞等又发表通电，对阻挠退位的王公贵族提出最后通牒，杀气腾腾地宣称，“若王公大臣胆敢继续破坏共和大计，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死硬派王公们经过连续几次的惊吓之后，再也不敢死硬了。这几天，满族亲贵纷纷携眷出京，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到者寥寥无几，真



革命军在街头为人剪辫子

有些树倒猢猻散的景象。隆裕太后哭啼啼对民政大臣赵秉钧说，“赵秉钧啊，你快去对袁世凯说，我们退位，只要能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就行。”

1912年2月12日，清末代皇帝宣统退位，至此，满清帝国26多年的统治和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体终于宣告结束了。

退位诏书发布的同时，袁世凯就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赞成共和，并请教“共和建设的重要问题”。孙中山接电后，即复电称，“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同时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南京参议院一致通过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窃取了。

革命党人历尽千辛万苦，经过裕



清朝官吏纷纷逃离汉口

血奋战，终于赶跑了满清皇帝，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虽然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未因此改变，中华民族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痛苦的呻吟，但是，这场革命，毕竟开启了伟大的社会变革的肇端，确立了民主共和思想，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都遭到人民的反对而最后归于失败。

（责任编辑：李文）



武昌起义后的人城证



清军士兵纷纷向革命军投降

两面战旗的来历

武昌起义军经过一夜的激战，控制了武昌城。汉阳门城楼和钟鼓楼顶上，各竖起了一面标志中国数千年封建帝制垮台的九角十八星红旗。缝制

武器，红色表示同志热血，黄色表示黄帝子孙——汉族；立意是：“抱定铁血主义，恢复汉族”。赵师梅等三人当时都就读于武昌中等工业学校，赵氏兄弟是电机系学生，陈是机械系学生。三人都能绘图，并有绘图仪器。

三人接受任务后，立即买来红布，刘公又派人买来墨汁、毛笔、大砚盘

的内幕，将予搜捕。革命党人只得连夜将九角十八星旗及其它资料，迁至俄租界宝善里 14 号。

10 月 9 日下午，孙武在宝善里 14 号试验炸弹失事，各革命机关先后暴露，革命党人的有关文件、名单及 18 面军旗全被搜出。革命党人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于当夜提前发难。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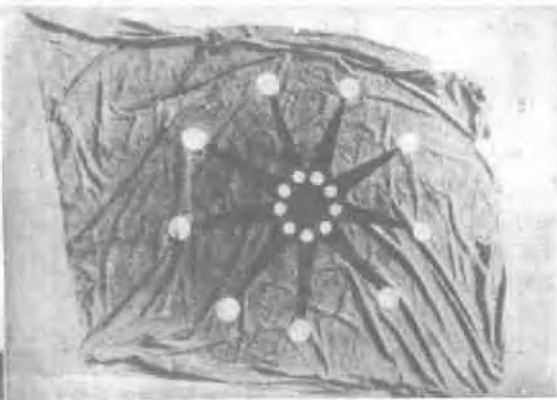
赶制战旗已来不及，紧急中，赵师梅想起还有两面军旗藏在裁缝店。于是和邓玉麟、蔡济民一起找到裁缝店老板，取出劫后余存的两面军旗。第二天，两面宣告旧世界彻底灭亡的九角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古城武昌的上空。

武昌首义故事

刘作忠



起义前准备的革命军旗之一



赵师梅等设计的革命军军旗

刻印、制炸弹的李白贞

李白贞少年时因家贫离开湖北黄陂老家，前往汉口中西药房学徒，靠自学掌握了药物性能、化学知识及绘画技术，后在汉口歆生路开设“荣昌照相馆”。1908 年冬，李

这两面红旗的是共进会成员赵师梅、赵学诗、陈磊。

1911 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毕业回鄂的刘公任共进会第三任总理。5 月的一天，刘公将赵师梅、赵学诗（师梅的堂弟）、陈磊（共产党人陈潭秋胞兄）叫到武昌县华林正卫街的高所中，令其为起义军缝制战旗——九角十八星旗。刘取出共进会在东京预拟的国旗图样，并对图案作了一番解释：红圆心代表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红圆心外缘九道黑角，代表冀、秦、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只角尖及角间的 18 颗小黄圆星，代表长城以南的直、鲁、豫、江、浙、皖、晋、陕、甘、川、鄂、赣、湘、黔、闽、粤、桂、滇等 18 行省；其中的颜色，黑色表示铁质

和藤黄，在武昌雄楚楼 10 号杨玉如、刘公的寓所开始秘密摹绘。照刘公说明的尺寸，三人先画好底稿，应着黑色之处涂上墨水；当时无黄颜料，需着黄色之处就以藤黄代替。经过半个多月的忙碌，制出了 20 面三尺宽、五尺长的旗帜。共进会成员邓玉麟又在武昌草湖门附近找了一家可靠的裁缝店。因事关重大，怕被人发觉，每天打烊之后，由邓送两面画好了式样的旗子去秘密缝制旗裤（插旗杆的布套）。当时无缝纫机，全系裁缝师傅以手工缝制的。缝制完，仍由邓取回，翌日再送两面去。到起义前半月，已做好 18 面，秘密存放在汉口长兴里 98 号熊晋槐处。

10 月 7 日，三十标副代表方殿甲报告该标三营的旗人发现汉兴里机关

白贞经孙武介绍加入了共进会，其后，他的照相馆成了共进会在湖北的七个联络处之一。1911 年 7 月，湖北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联合，李在总部庶务处供职。9 月 24 日，南湖炮队发生意外事件后，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发难。会上，将刻制“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之印”的任务交给擅长美术的李白贞。

怎样使印章既美观又耐用呢？李白贞一番琢磨，决定采用酸性液烂铜方法刻制。他在长堤街买回五寸见方的紫铜一块，打磨光洁，再反写上“中华民国鄂军政府大都督之印”，投入 42 度浓硝酸中侵蚀。待文字显印出来之后，又经刊刻修整，并装上了木柄。由于没有现成的工具，他就借用

洋刀在铜片上刨光，因用力过猛，竟将左手大拇指划破，鲜血染在洁白的木柄上。他借此索性将木柄全涂上红漆，既掩盖了血迹，又使印铃更美观。刘公、孙武等革命党人见后，称赞不绝。起义后，黎元洪使用的就是这枚印铃。

起义日期迫近，而居正、杨玉如等到上海购手枪迟迟未归，大家心急如火燎。最后大家商定：赶制炸弹，以应急需，并再次推定志实、细心可靠、又懂化学的李白贞负责。他提出需要一人帮他采购原料，以防敌人察觉；同时找一人帮他制作。经大家推荐，李白贞的内弟陈叔琴协助购买原料，孙武协助制作。李、陈二人分头在各商店购回大量锯水、酒精、黑铅、铁片及罐头香烟空罐。储存在文艺俱乐部的密室。他先试制了一个，由革命党调查部部长邓玉麟秘密带到武昌洪山背后试验，结果将地面炸了一个很大的深坑，效果不错。于是，照着原样又赶制了一批，交由邓玉麟、杨宏胜（革命党交通部副部长）转运到武昌各个秘密点分藏，以备发难时用。

10月9日，孙武在俄租界宝善里14号寓所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引起清吏大搜捕，革命党人迫不得已于当晚仓促决定起义。

何成浚暗助义军

1909年，何成浚自日本留学归国，先在武昌湖北督练公所任职，年后到陆军部军制司任科员。陆军部是清廷最高军事机关，何借机潜伏，广交北方豪杰，积极为革命党人出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首先起义。第二天，军机处派陆军大臣荫昌为总司令，陆军部军制司司长易乃谦为参谋长，何成浚为一等参谋，率部南下镇压武昌起义军。荫昌命令何率第一镇第一标及第六镇第二十四标先乘车南下，负责扼守黄河铁桥和武胜关。他接到命令后，心中暗暗高兴，因为自己如能守住这两个要塞，就可屏障起义军了。12日下午他率两标人马过黄河铁桥，又过武胜关，抵达离汉口90里的黄陂县祁家湾宿营。

湖北提督兼第八镇统制张彪闻

讯，专门派中军官李泽湘前来迎接，何在李陪同下，登上“海圻”战舰。与自武昌城逃至舰上的张彪，湖广总督瑞澂和自水上增援的海军副大臣萨镇冰见了面。见面后，瑞澂问他带了多少救兵，他说有两标，瑞澂先是感到失望，接着又强装镇静说：“有这么多兵力已经足够了。武昌城里都是一些茫无头绪的乌合之众，他们现在拥戴黎元洪为都督，黎又迟迟不敢就职。哗变的军队不过是工程营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步兵第三十二标，炮兵第八标，以及骑兵营、辎重营均未叛变。你率两标劲旅，由兵舰掩护，从阳逻渡江反攻，易如反掌”。他回答说：“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我出发时，荫总司令已反复叮嘱，不要随便渡江进攻。”瑞澂说：“一切由本都督负责任！”何仍不肯答应。萨镇冰在旁边默默无语，张彪却在一旁反复说明武昌的清兵多数未叛变，极力劝何渡江。何正色驳斥道：“既然武昌的兵多数未叛变，你为什么不在武昌指挥，而要离开阵地，避居到兵舰上呢？”张听后面红耳赤，一时答不上话来。瑞澂却怒容满面地说：“你不肯渡江，我马上电告荫总司令，恐怕你难逃畏缩不前、贻误战机的罪过吧！”何说：“我当然会静候荫总司令的电令，他要我如何我就如何！”何说完，即返回祁家湾车站，致电荫昌说：“革命军声势浩大，我的兵力单薄，不敢轻进，而瑞澂总督对我横加责难，我该怎么办？”荫昌复电要何按令在原地掩护大军集中。何有了荫昌的这一“尚方宝剑”，就名正言顺的按兵不动，实现其屏障革命军之大计了。

过了十几天，当荫昌率主力南下时，革命军已渡江布防了。荫昌令王占元率第二镇第三协全部及炮兵一标，向汉口进攻。王占元率部乘火车前进，既不搜索，又无警戒，车过三道桥，遭到了早已潜伏在铁路两边的学生军的袭击。王的部属听到枪声，慌作一团，有的跳车逃走，有的逼迫司机将火车向后倒退。结果，后面的铁轨已被铁路工人拆毁十余丈，火车退到这里，轰的一声，翻倒了一半。革命军乘机从两旁稻田跳出，王部死伤枕藉，可惜民军兵力有限，未能乘胜追击，否则王占元会全军覆没。恼羞成怒的王占元溃退时，以抓“侦探”为



黎元洪所在的武昌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告示



起义前精刻的印章

名，沿途抓了十几个农民，押解至总司令部参谋处。军法处接到王的报告，向参谋处要人，参谋长易乃谦要何成浚办理。何对“侦探”一一审讯，确认都是善良百姓，于是全部释放。易乃谦闻讯，怒气冲冲地对何说：“你不经军法处审讯，就把这些人放走，要

是总司令追究责任，怎么办？”何回答说：“我负责任！”荫昌获悉，果然指责何成浚，他理直气壮地说：“王某临阵失败，不引自罪，却要迁怒于百姓，这对不对？”荫昌无话可说，但脸上怒气难消。他怀疑何另有野心，自此专门派宪兵营长张望监视何的行动，但他对此泰然处之。

由于何成浚的左右运动，荫昌的援军囤兵于黄陂、孝感一带，迟迟不能前进，为武昌革命军整顿、设防，赢得了缓冲时间，何成浚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暗助革命军，直到吴禄贞遇害后，才正式脱离清军，投奔黄兴。

张知本整肃纲纪

辛亥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于10月12日（农历八月十九日）在武昌抱冰堂集会，订立军政府条例，推举各部首长，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曾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的张知本被推为司法部长。

张就职之日，亲书“维持秩序，整肃纲纪”于辕门左右，以示警诫。并明示民国政府涤旧布新、崇法爱民之旨意。接着，重建司法机构，专理各属人民上诉案件。议和期间，各属上诉案件增多，因限于人才及经费，张又仿效法国三审三级制，于汉口、沙市、宜昌、武汉等处，筹设高级审判所，专理第二审民事、刑事案；并命各府、县于府、县署内设司法一课，暂行兼理民间诉讼第一审案件。

组织机构就绪后，原有司法人员不够，张知本又草创公共考试制度，招考优秀司法人员。从1911年底至1912年3月，经过四次口试、笔试，录取了270多人。

某日，宜昌某轮水手王某携水货，荆宜施鹤总司令唐牺支部属敲诈不遂，竟将王枪毙了。王母向武昌各机关申诉，无人过问，恰被张知本遇见，张即派人赴宜昌调查属实后，申请军政府组织特别法庭，传讯唐牺支。唐开始还想拖延了事，张以其违抗命令、藐视法律之罪，敦请军政府派师长蔡汉卿乘兵舰赴宜将唐拘捕归案。

某夜，军政府来信邀他面谈，他来到军政府客厅，但见黎元洪与唐牺支都坐在那里。黎对唐说：“你有什么

话，可对司法部长说。”唐对张申辩说，案发时，他人在沙市，不在现场，并举出一些人证、事证。张说：“你是革命军人，所说应该是可信的，只是都督掌管军事，我管司法，均不能干涉审判，你有话请到法庭上讲。”唐无奈，只得第二天出庭受审，结果受到行政处分，其参谋长胡某，则判刑五年。当时在湖北的章太炎，曾阅览此案的全部材料，他回沪后，给黎元洪写信说：“（张）怀九（知本）性刚而气和，民国司法庆得人矣。”

武昌起义，正值仲秋，气温已带寒意，一些进出城的农民、小贩，多戴瓜皮小帽。守城的士兵每遇到这些人，就用刺刀挑落其小帽，强行剪其辫子。张知本见状，急奔都督府，询问黎元洪是否下令这样做，黎否认，张说：“乡下人惜钱，一顶帽子戴一生，你用刺刀挑人家的帽子，成何体统？如果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不进城，吃的、烧的哪里来？请你尽快下令禁止。”黎表示赞同，当即令秘书起革命令禁止。

邵元冲和张默君的 罗曼史

邵元冲和张默君都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张默君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独立，一时声名大振。苏州光复后，张默君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任会长；出版《神州日报》；成立神州女校，自任校长。其得志成名的时间比邵要早。她不但长于诗文书法，而且风姿绰约，在当时的女子中，的确是一位风云人物。

1912年，同盟会在上海设交通处，张默君任文书部部长，邵元冲仅是文书部里一名普通干事。邵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四岁，而且才貌超群的顶头上司倾慕不已，屡次输诚结交，同事们也多方撮合，而张默君却报以冷淡，并暗示：“非将军不嫁”。于是，邵又醉心于如何取得一将军头衔以见重于张默君。1915年，居正在山东胶东组织讨袁军东北军总司令部，任命邵元冲为警备司令。讨袁军事结束，邵自认为已备“将军”之衔，定可赢得张小姐的青睐。可此时张默君择夫的基准又有了变化：“非留学生不嫁”。

此后邵元冲为创建民国而奔走，

两人自此音书隔绝，邵元冲把对张默君的爱慕，藏在心底。张默君于1918年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归国后献身于教育事业，成绩卓著。此间曾有不少王公贵族追逐她，她一概谢绝，坚持独身。邵元冲于1917年元月出任广州大元帅府机要秘书。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邵奉命视察海外党务，周游英、法、德、意、俄诸国。同时先后求学于威斯康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邵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这年夏天，邵元冲自欧洲归国至广州，挚友黄季陆对一直独身的邵甚为关心：“你所倾慕的张默君小姐，现在任南京第二女中校长，有人说她抱独身主义，又有人说她是情有钟，非其人不嫁，是不是期待于老兄？”

邵元冲沉郁地回答：“她与音书断绝多年，不必多提。”

黄季陆说：“如果你还爱她、倾慕她的话，即使音书断绝多年，也可重修旧好！”

邵元冲忧心忡忡地说：“事隔多年，又不知她的近况，修书问候，是否唐突？！”

黄季陆想了想，给邵元冲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将新近由民智书局出版的《美国劳工状况》用挂号寄她一本，并写上你在广州的地址。不过不要冒失写信，以免碰钉子。她接到书后，如果毫无反应，就作罢论；如有回音，就有希望重温旧好。”

邵元冲按照黄季陆的策划，当即给张默君挂号邮寄其新作《美国劳工状况》。张默君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注视着邮包上熟悉而又陌生的字迹，当拆阅的时候“浑身发抖”。她后来对黄季陆说：“多年遗忘的情愫，一旦重温，百感交集，有似触电一般。”很快，邵元冲收到了张默君的复函，信首称呼是：“翼如先生”，“翼如”系邵元冲之号。信中除“睽违驰念”之类的客套话外，对邵的《美国劳工状况》一书大肆颂扬一番，言辞十分诚恳。自此两人音书不断，情意绵绵。九月，于上海沧州饭店举行婚礼，有情人终成眷属。

（责任编辑：刘家驹）

少帅美国行

——张学良今夏访美记实

○宁先绪

一、机场新闻

公元 1991 年 3 月 10 日。台湾桃园中正机场，一改往日宁静安详的气氛，早就出现了许多人，熙熙攘攘。人群里不少人或肩挎相机，或手拿话筒，他们焦躁、盼望，还带有几分激动。正期待着即将赴美访问的张学良的到来。

下午 3 时，一辆黑色轿车稳稳地开到候机室门口。人们蜂拥而上，车门打开，首先下来的是一位女士，年龄已经不小，但透过她那闪光的双眸，充满笑容的面庞，可以看出，这位女士年轻时肯定是风姿绰约，俏丽动人。她就是赵一荻女士——昔日的赵四小姐。随之下车的是一位老翁，由于年迈，双腿显得有些不便，但精神矍铄，脸上洋溢着兴奋之光。这便是当年的少帅张学良。

记者们迫不及待地围过来争先恐后提问，张学良向众人抱了抱拳，挥着手说：“感谢诸位，容我稍息。”一边说一边坐上机场特意为他准备的轮椅，缓缓地到了机场贵宾室。

1936 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兵谏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不料想“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从此开始了几十年的沧桑多舛的人生旅途。

几十年来，张学良的自由一直为世人所关注。蒋介石逝世后，曾有传言说少帅的自由有望；然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对 1936 年所发生的事仍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生怕“放虎归山”。

经过多年的幽居生活，张学良对人间的事看得很恬淡，无论有多少感想，从不就时局发表任何评论，对自己的事情，也绝不轻易启齿。

1990 年，张学良 90 大寿，台湾方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无疑正式“平反”，至此，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一次与李登辉见面时，他轻描淡写地表示，在美国的子女希望他能出国看看，散散心，他本人也有此意，总归是五十余年未出国了。李登辉闻听当即表示同意，少帅终于如愿以偿。这不仅意味着少帅恢复了自由之身，更是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又一重大转折。

稍作休息后，张学良在机场贵宾室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与李登辉“总统”谈到希望出国的？何时得知当局准许您出访的？

张学良偕同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旅游三个半月后，于 26 日搭机返台。下机后，受到数千旅客瞩目。



答：这件事你应该去问“总统发言人”邱进益，有些话我不便说，也不应该说。我与政治没关系，也不想谈政治。

问：您准备在美国住多久？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旧属见面或做公开演讲？

答：我不一定住多久，好玩就多住点，不好玩就少住点。我是个土包子，从来就没去过美国，不过以前倒去过欧洲，是来台湾前去的。我去美国主要看儿孙，我在美国的亲属加起来比在台湾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做公开演讲，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会做公开演讲。

问：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回东北老家看看吗？

答：我不知道中共注意我的事，也未与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回去。

问：您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答：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莽撞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问：您说您是莽撞的军人，您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

答：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

问：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都很推崇您，认为您在 35 岁以前的所做所为，其实是出自对国家统一的忠诚仁义，您自己觉得呢？

答：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

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我这个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过我的历史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不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是这样，过去也一样。

问：“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

答：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经里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 90 岁了，脑子已装满了，没有什么好再回想的。

虽已逾 90 高龄，但仍极具幽默和童心，思路活跃，谈锋甚健。与他相伴一生的赵一荻女士则流露出宗教濡染的赎世情怀，虽不复当年传言中“赵四风流朱五狂”的娇态，却更显出岁月洗练过的面貌。她自追随少帅那天起，就以保证他生活愉快，身体健康为己任，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行动上受她的照顾更是不少。在候机时，赵一荻女士更显出对少帅的爱护，连他喝茶都要亲自倒。对此，张学良甚为得意，还特地竖起拇指夸

他们的行踪并进行采访的事情。

原来，张赵二人决定赴美探亲后，都不愿为此张扬，以免麻烦。在登记机位时，张学良甚至未用本名，而赵一荻女士用的名字则是“张赵一荻”。这才被台湾的记者发现并作了报道，因而无密可保。正如少帅所云，记者是“无所不能”。

赵一荻不语，闭目养神。张学良突然又冒出一句：“我刚才与记者们交谈时没有什么差错吧？”说完像一名学生等待老师下定语一样看着赵一荻。



张学良抵达旧金山，由其儿孙护送离开机场



张学良在纽约的暖房宴席中



袁家骅、吴健雄夫妇为张学良暖房

问：几十年来您的行动受到限制，海内外对此事都很关心，您平常都做些什么？

答：你们为什么老要说我行动受限制，就是你们记者给我限制住的。我与政治无关联，平常也是和老朋友聚一聚，吃点小馆子，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

问：请您谈谈养生之道好吗？

答：我没有什么养生之道，就是吃好喝好，我内人的菜烧得很好。平常我白开水、茶、咖啡都喝，走路运动，如此而已。

问：您曾说“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聪明”是怎样误了您一生？

答：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话也很聪明。

采访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张学良

笑她。

下午 5 时 20 分，华航董事长乌毓曾请张学良夫妇登机，两位老人相扶起身，准备出发。等候在外的记者又一次围了上来，希望少帅能再说点什么。张学良哈哈大笑，说：“许多人称我是电视明星，你们采访我，我要向你们收费。”赵一荻女士在他身后不时嘘寒问暖。他们确实确实是一对历经坎坷的患难伴侣。

5 时 30 分，一架银色客机慢慢滑离跑道，逐渐升空，飞向蔚蓝色天空，机身上的“〇〇四”几个字明晰可见。

二、往事如烟

〇〇四号班机平稳地飞行。

头等舱内，张学良与赵一荻女士相伴而坐。片刻，张学良开口道：“这帮记者呀，真是无所不做，无所不能。”赵一荻女士明白他指的是记者探寻到

赵一荻女士微微睁开双眼，嗔怪地说：“汉卿，你怎么了？你向来是敢做敢为，对兵谏蒋公至今不悔，怎么计较起与记者的谈话了？快歇着吧，当心累着。你可有五十多年没长途旅行了。”

张学良深情地望着这位与自己一起度过五十多年幽禁生活的伴侣，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算是回答。

张学良一向喜欢旅游。1933 年，他从上海搭轮船先到意大利访问，接着又去了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以及苏联等地。那次欧洲之旅对张学良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验。在意大利，他见到了当时担任首相的墨索里尼，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但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在德国时，希特勒和戈林一点也没给他留下好印象，他觉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骄横自大。此外，他还在苏联会晤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

1933 年 11 月，他从哥本哈根回国，结束了欧洲之行。

再往前追溯，张学良还有一次日本之行。那是在 1921 年。他在日本会见了裕仁天皇、皇太后以及昭和太子。他还清楚地记得日本皇太后说昭和太子与他长得十分相似。对于日本的军力，军队的战斗精神，他非常佩服，但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却深恶痛绝。

近些年来，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渐变化，在结束了长久的“保护”生涯后，张学良也陆续走访了在台湾的老

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儿子张闾琳夫妇，接着便是孙子张居信夫妇。张居信第一个抢上前来迎接祖父祖母，张闾琳随后过来问候。几个人见少帅气色很好，精神十足，都放了心，寒暄一阵，大家簇拥着老人走了出来。

“父亲，遵照您的意思，我们没有让更多的人来欢迎您。”张闾琳对父亲说。

确实，与在台湾登机前那热闹场面相比，这里的情景显得冷清了些，少帅的千金张闾英和女婿陶鹏飞教授也



张学良在唐德刚教授陪同下于哈德曼河畔眺望纽约



张学良与赵一荻女士在去年九十寿庆上

未到场。友，偶尔也到郊外散心，数年前还与夫人赵一荻女士一起游览了台北的“小人国”。特别难忘的是，去年，他的老友张群出面在圆山饭店为他庆祝 90 大寿，盛况空前，这也是他数十年来在台湾的首次公开活动。

往事不堪回首，此生无愧无求。

三、畅游旧金山

8 月 10 日中午 12 时 10 分（美国当地时间），○○四号班机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降落。

办完手续，张学良夫妇由机组人员陪同出关。虽经长途旅行，但二位老人看上去并不十分疲倦，特别是九十有余的少帅童心未泯，不时地向旁边的人问这问那。出关时还要求撤掉轮椅，试图自己走着出关，赵一荻女士再三劝阻才作罢。人未出关，他就高高昂起头，用目光搜寻迎接他的人。



张学良夫妇由美返台

是环顾左右而言它。当有记者问他初到美国有什么感觉时，他脱口答道：“没什么感觉。”

晚上，陶鹏飞教授在旧金山湾区的一家法国餐馆设宴为少帅夫妇洗尘。他知道少帅喜欢法国的饭菜，特别对法国葡萄酒有偏爱。出席陪同的除了陶教授夫妇，还有张闾琳夫妇等。

席间，张学良谈笑风生，时常与赵一荻女士开玩笑，对女婿要的法国菜和葡萄酒大加赞赏，夸不绝口。当得知付账时只花了一百五十美元时，他感到吃惊，说：“比台北便宜多了。”一边说，还一边对赵一荻挤了挤眼，仿佛在说：“这次来美国是对的。”

这位马上就 91 岁的老人兴致如此之高，胃口如此之好，使他的乘龙快婿自叹弗如。陶教授后来说：“他老人家不但把汤、菜、甜品都吃光，还吃了水果和面包，比我的食量都好。真是了不起。”

“这样好，这样好。”张学良连声说，“这样麻烦少。我喜欢这样。”

原来，陶教授夫妇在旧金山侨界位尊望隆，但并不全因他们是张学良女儿女婿的关系。陶教授在旧金山几十年间自任教加州大学直至退休，他所组织的全球性“中华联谊会”，活跃异常。侨界无论新旧老少，几乎无人不识陶氏夫妇。所以，这次少帅决定启行来美之前，对他们的首要叮嘱，就是不可去机场迎接，免致因他们“亮相”泄露了少帅之行踪。

然而，张学良终究没有躲过记者们的采访。面对记者们的提问，张学良首先阐明此次来美纯粹是为了探望子女，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并不准备参加任何公开活动。

他想早一点离开机场，常以“年龄已大，精神不好；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清”为由，或是避而不答，或

更令陶鹏飞、张闻琳等惊讶的是张学良对时差的适应能力，绝不亚于青年人。晚上送他回宾馆时，张学良一再问第二天的安排是什么。当众人劝他休息几天时，他嚷叫着不同意，并坚持第二天一定要外游，大家只好同意。

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夫妇在陶鹏飞、张闻瑛、张闻琳等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金门公园，参观了金门大桥等名胜。

在金门大桥参观时，张学良情绪高昂，指着桥面上往来如梭的汽车，对身旁的人回忆起他当年访英时开汽车的情景。对于自己开车和驾驶飞机的往事，流露出一股长歌怀旧游之情。

张学良夫妇在旧金山住了四天，每到一处，常见景生情，谈古论今。他对人生哲理的悟识，书画名家之鉴赏，民初掌故之闲话，政坛人物之臧语，信手拈来，妙趣横生，被家人称为“说故事能手”。其中谈到在桃园机场见到了许水德（台“内政部长”），记者们立即臆断是去给少帅送行的。张学良一本正经地让家人猜许去机场到底干什么，倒难住了大家，他说：“许水德其实是送他自己的儿子。”说罢忍不住哈哈大笑。

四、纽约露面

居住在纽约的华侨及其他华人得知张学良已经到了美国，并准备游览纽约，纷纷表示要举行欢迎会招待仰慕已久的少帅。张学良为了不过于声张，一到纽约就闭门不出，只是私下与亲朋好友会见，一起吃吃饭，谈谈话。赵一荻女士由于身体不适，因而留在旧金山，未陪少帅赴纽约。

张学良在纽约首次公开露面是4月7日，他出席了当地华人教会播恩堂的主日崇拜。

播恩堂的牧师在报告会务时，曾向二百余名会众介绍首次来参加聚会的张学良，大家鼓掌欢迎他的时候，张学良面带微笑拍手向众人致意。

7日是复活节后的首次主日崇拜，也是播恩堂教会月首圣餐主日。张学良在聚会时，虔诚地从司事手中接过圣饼和饮杯，一直用双手捧持，并且两次与会众起立领用。

在一个半小时的聚会中，穿着灰色三件头西装的张学良，始终端正坐

着聚精会神听道，当牧师在传讲“我是谁的仆人”信息时，张学良还几次帮同行友人翻找圣经里马太福音等有关章节。

张学良是在十五、六岁时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他当时常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并结识了当时出任该青年会总干事的一名“贵格会”教徒普赖德。这是他认识基督教文化的开始，也是培养另一种人生的关键。

张学良在出席教会的聚会后，曾接受许多教内兄弟姐妹和东北乡亲趋前致意，大家看到他精神饱满，举动自如，都非常高兴。有着亲切随和的长者之风，对往日岁月或有缅怀或能追忆，但无怨尤，看尽世事却不臧否评论，是人们对少帅的印象与评论。

五、青年人的面子

张学良到美国后，许多学术研究机构邀约不断，有人希望安排他公开演讲，也有人想争取他口授历史。一向公平待人的张学良，婉拒了各界的隆情盛意。然而，在4月中旬，他由贝祖貽夫人（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的母亲）陪同，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举行了座谈，因为“青年人的面子不能不给。”

他对青年人说：“我年轻时最不喜欢听年纪大的人说话，一说话就是教训，我设身处地替年轻人想，大概也不愿听我说话。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如果同学中有人对清末民初的历史有兴趣，只要是以北方地区为主的，我知道的可能比任何人都多。”

他说，蒋介石先生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大纲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要着实写，我不能只说好的，而且我认为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有学生问他可否录音时，他说：“无事不可对人言，你们录吧。无论什么事，私事、公事，假如有不可对人言的事，我不说，也不做。”

主持人张之丙女士说：“青年人很想向您请教，以您的经历跟他们说几句话，对他们做人与求学，都会有很大启示。”

张学良回答说：“我对日本青年已

由NHK的访问说了很多了，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他目光转向日裔青年冈本公一：“我对NHK不客气地说：‘我恨日本’。”旋又加注解：“但不是日本人民。”

“我接受我父亲的栽培，我父亲有势力，一般青年走两步，我一步就够。”张学良沉思着说，“我本来想学医，可‘救人’没学成，却学会了‘杀人’。”说罢哈哈大笑。

关于明史研究，张学良说：“我以前专门研究明史，后来我就把明史放弃了，接受宗教的熏陶。我是南方浸信会函授学校毕业，拿到了文凭。”

他又说：“我见过孙逸仙先生，他跟我说：‘中国将来全在你们身上，尤其是你，是你们东北的青年’。”

“我自22岁领兵打仗，一直在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老百姓痛苦的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去当兵，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没活劲儿了。自己打自己，只剩下老弱妇孺。我从那时起下了决心，一旦我掌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内战。”

对西安兵谏这一举动，张学良只说了一句话：“我做事，我负责。”

座谈结束后，张之丙女士给少帅几张前年为东北残障青年来美事，曾一访东北留宿在昔日少帅府的照片，张学良看得很仔细。老来思乡与雏儿恋母，同是一种难断深情。

六、乡情何时了？

张学良在台湾启程赴美前曾说过：“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并说：“大陆是我的家，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回去。”等等。自此，世人对少帅何时回大陆一事颇为关注，常有关于此事的报道见诸报端，其中尤以张捷迁4月中旬赴沈阳洽谈有关事宜为甚。

张捷迁系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的校友，由于张学良曾于1928年以东北保安司令身份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因而二人近年来曾有多次联系。张捷迁自1988年起即多次以“东北大学校友会”会长的身份，邀请张学良赴美访问，并结合全美各地的东北大学校友及东北军旧属为少帅祝寿，但张学良始终未成行。

有报道说，张学良夫妇自3月10

日离开台湾后，主要行程及活动安排均由张捷迁及张学良的女婿陶鹏飞负责。

张捷迁此次赴东北虽与张学良回大陆事宜有关，但并非主要内容，只是新闻界的捕风捉影而已。但少帅获自由，自有回生他养他的故乡之愿，东北乡亲何尝不在翘首以待呢？！

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回归大陆一向持欢迎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去年亚运会期间曾接见了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表示欢迎张学良回大陆看看。今年 3 月 24 日，在七届人大会议期间，新闻发言人姚广代表政府有更直接明白的表态，他说：“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说过，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古功臣。数十年来，我们对他始终是十分关切的。”他特别强调，“如果张学良先生本人愿意回大陆看看，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我们尊重他本人的意愿。”

一句话，大陆的大门对张学良是敞开的，他何时回大陆都行。

五月中旬，张学良在与记者交谈时，也谈到了回大陆的时机问题。

问：少帅，自从发生“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漂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望家人，您觉得现在您的家究竟在哪里啊？

答：当然是家在东北。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我还是想我自个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自从“九·一八”后我就没回过东北老家。

问：您既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就便回东北去看看您的故土，看看老乡亲？

答：我很愿意回到大陆，大陆方面也表示，我回去绝对给我一切自由等等，但因政治时机尚未成熟，到时候我是很愿去的。对政治上仍有影响的事我不愿意做，我是闲云野鹤，不愿再影响政治。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什么政治变化下您会回去？目前时机成熟了吗？

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现在还不行。

七、“西安事变”追述

事成气顺。自到美国后，张学良

的一切活动都无需他亲自过问，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使他游兴大增，心情畅快，谈兴极浓。五月底，他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其中包括“西安事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1934 年，张学良自欧洲回来后，南京政府发表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代理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军事，撤进关内的东北军也跟随少帅由华北西调。但张学良不太愿意担任这个新职。他说：“我不愿意受累”，“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如果它是国家的兵，我就没有这个包袱……。”他接着又说：“简单说一句话，我受累，甚至后来的‘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

他说：“我们东北同乡当时就攻击我，他们说：‘你对蒋某人恭敬，这我们没话说，但我们是跟你来的，你把我们带进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回家，我们不愿意剿共。怎样才能回家？只有打倒日本才能回去。’”

“我有两个最好最精锐的师（即东北军一〇九师及一一〇师，师长分别是何立中与牛元峰），统统在剿共时打光了。”张学良痛心地说，“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抚恤外，再报请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重编两师部队，但中央未发抚恤，两师番号也予撤消。”

他说：“中央不发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张学良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之沉重，令他昼夜难安。

这是 1935 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张学良就做了一个外为国家民族，内可平慰东北军民的重大决定，发动了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的“西安事变”。

就有关“西安事变”等情况，张学良与记者做了如下交谈。

问：看见您就不能不谈“西安事变”，事情过了几十年啦，请您亲自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答：此事我不愿说太多，外边发表的也很多，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这些事情，我不说是不愿用言语伤害他人。这件事留给历史去评论吧。它爱怎么评它怎么评，事情清清楚楚地摆在那。

问：“西安事变”后您失去自由被软禁，那也是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如果这半世纪您没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对整个中国会有什么贡献呢？

答：此事难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几次，蒋公都不同意，我想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让我参战，我这人早就没有了，非我自夸，我不把死放在心里。

问：您曾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 50 年。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

答：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 50 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问：事变时周恩来赶到西安，周蒋及您三人还单独见面，你们见面所谈的问题，对事变的结束是否产生了关键性作用？

答：周恩来见蒋公是我领他去见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公，蒋公也见到他。可以说三个人没谈什么。

问：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此人怎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您认为这几位中共领导人怎么样？

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时，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反应也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毛泽东我没见过。

问：台湾称他们为自由中国；中国大陆推行社会主义，您对海峡两岸的看法怎样？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您对此有何希望？

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问：您觉得您对和平统一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现在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以年龄辈份来说都是您的后生晚

辈，您想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吗？

答：假如我能有所贡献，虽然我衰老，但仍未昏庸，我能有贡献很愿意，但我不知能贡献什么？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尽点力，但尽得上尽不上力很有问题。

问：现在台湾经济繁荣，大陆在国际上地位很高，双方这种成就，您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高兴吗？

答：这自然。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我都有期望。所以我不愿意双方分裂，我希望看到双方统一。

张学良还谈到了对外界毁誉的态度，说自己一点不在乎，也不计较。他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在“西安事变”后所说的一句话：“明白人不用辩，糊涂人辩什么？”基于此，他觉得什么也不必说。因为王芸生曾经这样评价他所发动的“西安事变”：“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八、九一寿辰大庆

张学良访美的高潮是他大寿之时。

寿庆订于 5 月 31 日晚举行。27 日，华裔美籍教授唐德刚先邀少帅与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二教授夫妇聚餐，为其暖寿。那天，张学良兴致高昂，谈了许多轶事。唐教授说这是袁世凯的孙子与张作霖的儿子见面，大有哈德逊河畔谈历史的味道。

寿庆当天中午，来自中国大陆的吕正操将军拜会了张学良。

吕正操将军曾在少帅的东北军内当过团长，“西安事变”时就在少帅的身边。他曾在新中国和解放军担任要职，是原东北军在大陆人员的代表，故他早就表示，只要少帅出岛，无论什么地方，他都要来一趟，拜见昔日少帅，以示对老长官的敬意。现在少帅滞留于美，吕将军果不食言。

二人相见，少不了一阵寒暄。吕正操以东北乡亲的名义盛邀少帅回乡一看，此乃情理之中的事情。鉴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状况，张学良没有明确表态，但对老部下的感情再三表示感谢，并说一俟时机成熟，当然要回故乡看看。

接近少帅的人士事后透露，张学

良这次在纽约与吕正操的见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31 日晚 6 时左右，各界宾客陆续抵达纽约市曼哈顿“万寿宫”餐厅，寒暄招呼，笑语欢言，不少人欣然在会场特设的签名簿上签名祝寿。

7 时 30 分，张学良在贝祖貽夫人陪同下乘车抵达会场。身着淡色西服，洁白衬衣的张学良谢绝搀扶，步履稳健地推开旋转门，进入宴会厅。场内四百余人争睹少帅风采。瞬间响起雷鸣般掌声，镁光灯闪个不停，有人泪水盈眶，有人引颈高喊副司令、校长，场面热烈感人。张学良闻声一一颌首答意，面带微笑，步入座位。

万寿宫座无虚席，甚有立者。张学良右手边为贝祖貽夫人，左边是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同桌还有孔大小姐、宋二小姐等人。左右两桌分别是孔家、宋家、蒋家在美后辈。席间还有张学良旧部闫宝航之女闫明光、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等中外嘉宾。

宴会开始后，包柏漪夫人以特别贵宾的身份首先致词。她以充满感情的英语说，1936 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大事，而这一事件的主角张学良将军是最伟大的历史英雄之一。张学良的所做所为，是为了实现他生平的三个梦想：祖国的富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

上过长寿面之后，张学良起立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以乡音未改的浓重口音说：“我今年 91 岁了。我对国家、对社会贡献不多。大家对我如此爱护，我感到惭愧。我自问是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但我自我评语是，‘鲁莽草芥，胆大妄为。’给国家带来了是是非非。”他最后引用《圣经》上的话，以“罪人”自责。

张学良的原机要秘书田雨时代表贺寿亲友撰写了《大寿颂》。其中有赞誉少帅功绩的诗句：“惊涛骇浪，力挽狂澜，民心所向，国家至上。”在诗的结尾部分，田雨时饱蘸感情写道：“白山苍苍，黑水泱泱，唯公康强，山高水长。预祝期颐，千山巅上，亿民欢腾，万寿无疆。”吕正操也题“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等句致贺。

伴随着香槟酒揭盖时的“啪啪”声音，仰慕少帅的人们，不论老少，无分中外，一批接一批地来到少帅跟前，同他握手，向他祝福，以能与少帅合影为幸。少帅从容应客，谈笑风生，历时 90 分钟而无倦意。以他 91 之高龄，又有他如此充沛之精力，实属罕见，宾客惊叹不已。而声名显赫的少帅与如此众多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欢聚一堂，则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

寿宴在《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中结束。

九、尽在不言中

6 月 25 日傍晚 7 时 55 分，张学良携夫人赵一荻女士搭乘华航 003 号班机返回台湾，结束了他们在美三个半月的访问旅游。

在离开美国之前，张学良表示对国共两党仍处敌对状态感到痛心，希望双方能坐下来谈。他明确地表示：“我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坐下来谈，否则各自坚持国旗国号不是办法。”但对于怎么谈，谈多久，他没办法预先知道。

他同时还表示，如果在和平统一大业上，国家民族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愿出来做些事，但绝不是替任何个人组织或党派做的。

张学良也提到了台独的问题，他说民进党“真是糊涂”，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条件，如果真要独立，“我可以说共产党一定动武”。当然，共产党并非愿意动武。

由于张学良身份特殊，台湾当局未有官员前去迎接。

新闻记者当然不愿放过采访少帅的机会。当张学良被问到美国之行最大的感想时，他故作吃惊状，回答说：“你把我问住了。”接着淡淡地表示：“随便玩玩，没什么感想。”对于未来有无可能回大陆的问题，他说：“还不知道，还不能说。”

在众人的簇拥下，张学良夫妇登上专车，缓缓驶离机场。

至此，少帅的美国行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一如陶渊明诗句里所表达的：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李隆庚

九·一八事变的预谋和经过



一九三一年日本骑兵进入沈阳



9月18日向沈阳军民进攻的日军





9.18 时期的少帅英姿

“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 1927 年 7 月 25 日写给日皇的一个秘密奏折(田中奏折)中称:“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也”,“较我日本帝国领土大逾三倍,其人口仅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无其匹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个奏折还详细提出了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田中义一是日本最有侵略性的内阁之一,满洲的关东军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制造的,是日本侵略者要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来的第一步。

1929 年 5 月,坂垣征四郎大佐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同参谋石原蒙尔,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一起组成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阴谋集团,并着手制订爆破计划和物色成员。

1931 年 4 月,花谷正让张学良的顾问荣臻兼四郎的辅佐官今田新太郎,负责此项任务。今田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精通爆破技术的河本末中尉,并把河本末从独立守备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以实施爆破任务。接着,

成立了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秘密组织。在花谷正的策划下,组成了小野大尉、川岛大尉等五人的领导班子,坂垣等人策划在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同时,在满铁沿线制造事端,然后以社会治安不好,保护侨民等借口,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东北。他们还在军部机关,组织了参谋部。由桥本欣五郎中佐、中国班长根博中佐、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等五人组成秘密班子。此外,在军事上还就驻朝鲜日军的越境支援、配备攻沈阳的重炮,以及在关内牵制张学良军队等问题作了准备。

进攻沈阳的两门 24 厘米榴弹炮,从日本神户运到大连。上岸时,为了保密,关东军从旅顺调来重炮兵大队支援。他们身穿中国便服,装扮成码头工人,将炮身藏在木箱内进行搬运。在沈阳安装大炮时,须挖直径 5 米,深 1 米的土坑,他们对外说是挖游泳池,经过连夜施工,很快安装就绪。

坂垣等人做了上述各种准备后,计划在 1931 年 9 月 28 日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的路轨,要求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但是,9 月中旬,关东军的炸路计划在日本国内泄露,引起大哗。军部参谋部桥本欣五郎接连给坂垣发了三个密电:第一个密电:“消息已泄露,立即坚决行动”。电报发出后没有听到行动的消息,桥本又发第二个密电:“在建川美①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桥本急于得到坂垣的行动消息,又接着发了第三个密电:“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行动”。坂垣、花谷正等人研究了桥本的三个密电后,决定提前在 9 月 18 日发动事变。

①消息暴露后,军部深虑川少将到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最近期发动事变的意见。

柳条湖炸轨真相

柳条湖路轨是谁炸的?“九·一八事变”的主要预谋者之一,花谷正招供了当时的经过:

9 月 18 日夜,宵月挂起,高深地黑沉沉一片,星光点点,长空皎皎。关东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部下数名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营约 800 米的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十点多钟,爆炸时轰的一声,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在炸断路轨的同时,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这时,关东军

路爆破点以北约 4 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今田大尉不但在现场附近监督爆破作业,……发起冲锋时,他亲自挥舞着日本军刀,杀进了北大营。片岗、奥户、中野等联络会的法人也从中协助。

柳条湖炸轨以后,坂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接连给关东军各部发了四道攻占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一、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扫荡北大营之敌;二、命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攻奉天城;三、命令独立守备队五大队从北面进攻北大营,受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长指挥;四、要求第二师团以主力增援。

“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关东军坂垣征四郎等一伙法西斯分子一手策划后,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搞起来的。然而,他们在炸毁柳条湖南满铁路的路轨后,却贼喊捉贼,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柳条湖事件发生后约一小时左右,关东军参谋花谷少佐以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当时不在沈阳)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第一个电报,“18 日午夜 10 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两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陆军部接到关东军花谷的电报后,马上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关东军行动是完全正确的,同意给关东军增派兵力。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侵入沈阳。图为 9 月 19 日占领沈阳时的日军。



日军侵占沈阳

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采取屈辱退让的不抵抗政策。8月间中村事件^①发生后，蒋介石给张学良发去电报：“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给东北军各军长官发电，要各军“官兵一体遵照执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北平，一夜之内给蒋介石发去十几封电报请示处置办法。而南京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的600来人如入无人之境，于19日晨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的最大营地北大营。同时，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也于19日天亮前占领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在这次事变中，遭到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军火方面损失步枪95000支，机枪25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战车26辆。东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都被洗劫一空，仅官方财产就损失在17亿元以上。

日军占领沈阳后，不到五个月就吞并了其领土大三倍的我国东北三省。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3000万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殖民地生活。

^①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4人，乔装农业技师到中国东北边防要地进行军事侦察，被当地军民逮捕处死。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口实，扩大事态，积极准备侵略东北。

1931年9月18日，被日本侵略军破坏的沈阳铁路车辆



说“圆”

● 李虹

对于“圆”，国人似有特殊兴趣，而且源远流长。

“天圆地方”，把天看成是圆的，是我国人最早的宇宙观，“周而复始”，将事物运动的轨迹看成是个圆圈，可谓国内影响较大的哲学思想，“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循环说流传了几千年，堪称较普遍的历史观。

以圆为美，是我国人审美观的一大特征。古建筑用的多是圆柱，古铜镜铸的多是圆形，戏曲的结局往往都是大团圆；即使太极拳也要打得圆熟才算得上上乘。绝大多数同胞心目中的美人，多为圆脸或椭圆脸；不信？有唐代壁画为证！至于以瓜子脸为美，那是满族统治中国以后时才兴起来的。中国人听唱以“圆润”为上，即所谓“字正腔圆”“嘶嘶莺歌的溜圆”；而当今刮起的一阵“西北风”，扯嗓子喊，分明受了舶来品的影响，是对中国传统的反叛。

圆，似乎成为人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做人，最要紧的就是“圆通”，哪怕身无一技之长，只要圆通就成，八面玲珑，巧言令色，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深得圆通之奥妙，为贾老太君推崇为大家闺秀之典范，因而在三角恋爱中取得最后胜利。然而，林黛玉尽管才华横溢，却因为锋芒毕露，遇事总有独立见解，不圆，到头来以惨死而告终。至于做官，更需要圆通，能圆则通。只要圆，就能官运亨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遇事慢开口，逢雨紧捂头，不紧不慢中间走，这样做官，往往能够“代代红”。

圆！象紧箍咒一样紧紧箍住了人们的观念；我国探险家少就是例证。故

纸堆找出个郑和，坐的还是官船，浩浩荡荡，只走到南洋就打道回京邀功请赏去了；同麦哲伦、哥伦布对人类的贡献实难同日而语。特别是，象布鲁诺那样，为捍卫一个永恒的真理——而不是为了一个皇上——甘冒风险，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人，就越发显得少了！或许本来有很多，却因为他们有棱有角，不合乎“圆”的规范，都被历史家从史册中删去而没留下姓名？玄奘和尚，算得上一位敢为一种学说而献身的探险家；可惜经过“艺术加工”之后，却变成个浑浑噩噩、毫无个性的半人半神，直至去了极乐世界当上个神官，善始而善终，仍然是个圆！

五、六十年代搞“大跃进”，尽管饿死不少人，却仍然被说成“主流是好的”，此后的“洋跃进”、“经济过热”等等失误依然“主流也是好的”，循环往复，始终在个圆圈里打转转。“五·四”运动，中国从外国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至于生活在偏僻地区的“小二黑”和“小芹”得以自由恋爱结婚。谁知当年的暗娼、纳妾和拐卖妇女等旧风恶俗又死灰复燃，据报端披露，价码一直看涨，由几百元一个直涨到几千元一个。历史似乎在开玩笑，又画了个大大的圆！

就这样，人们脑子里想着圆，怀里抱着圆，始终在大圆套小圆中间挣扎着……

“给我以智慧和力量吧！”非凡的公主希瑞这样高喊着。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象希瑞公主一样跨上生着翅膀的追风马，冲击这个古老的“圆”，驶向那个广阔无垠的空间呢？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

●水静

静心种兰时的朱老总



“水静，这几天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得搬搬家了。”尚奎对我说，“要抓紧时间，国庆节前一定要把房子腾出来。”

“好好的搬什么家嘛。”我说，“要搬，等秋凉以后再搬也不迟呀。”

“朱老总要在南昌住一段时间，我想，住我们这幢房子比较合适。”他解释说。

听说是腾给朱老总住，我立时就高兴起来。要知道，对这位名震中外的总司令，我还不曾见过哩。

朱老总是解放后最早来南昌的中央领导人。当时，滨江招待所还没有修繕好，江西宾馆也还没有动工，的确很难找到一幢适合他住的房子。我们住的原是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公馆，房子一般，只是院子较大，花木很多，且不乏名贵的品种。那时候，就算是南昌最好的房子了。朱

老总要来，安排他住在这儿是理所当然的。

我立即动手，只带走一些日常用品和换洗衣服，其它东西都锁在不用的房间里。然后，又进行了彻底的打扫和必要的修理。待一切就绪时，离“十·一”只差两天。

过国庆节不久，朱德委员长和康克清大姐便来到南昌，住进我们腾出的房子里。我们事先作了交代，不让他们知道是特地给他们腾出的房子，否则，他们是不会住的。

当天下午，尚奎便领我一一道去看望朱老总夫妇。康大姐一把将我拉住，坐在她身边，亲热地跟我说话。尚奎表示了省委热忱欢迎之意，并希望他们注意身体，因为十月初的南昌有时是蛮热的。朱老总非常高兴，他说他早就想到这里来，只是一直脱不开身。

“八一”起义之后，这是头一次来南昌。”他说：“旧地重游，感慨很多。南昌这几年的变化很大吧？”

尚奎简要地说了一下南昌的现状，然后对他们说：“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旅途疲劳了，休息几天之后，再慢慢地看，希望总司令对我们工作多指示。”说罢我们便告辞了。

回家后，我对尚奎说，康大姐和我第一次见面，就那么热情、亲切，说话轻声细语，使我一下就感到她的关心和体贴，老革命、老大姐的特点，在她身上再明显不过了。尚奎笑道，算是你有点眼力。她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是党内最为勇敢顽强的著名女战士之一。

“你看过毛主席1928年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没有？”尚奎问我。



朱总司令雄姿



“当然看过！”我说。

“里面有一段话你不一定记得。”尚奎说：“这段话是：‘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有八十个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

“你是说，康大姐就是那八十个革命农民里的一个？”我忽然想起康大姐是万安人，便脱口而出。

“对罗！”尚奎说，“井冈山时期的女战士现在已屈指可数了。”

于是，我对康大姐便多了一份敬爱。

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朱老总。我是在革命军队里长大的，可以说，朱德的名字和毛泽东的名字同时刻在我的脑子里。对于这位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中的名将，这位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这位驰骋沙场、戎马一生的伟大统帅，在我的想象中，一直以为是个高大魁梧、威武严厉的人物；一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完全错了。他是那么和蔼可亲，那么慈祥宽厚，分明是一位最愿接触人，而又使人极易亲近的长者。仔细一想呢，又觉得这是必然的，他使敌人闻风丧胆，却受到人民的敬爱、爱戴，这正是一位人民军队总司令的独具特色。

朱老总在南昌逗留期间，我和尚奎曾多次去看他。以前也听说过，朱老总喜欢兰花，却不知道他爱兰爱得如此之深。在他下榻的我们家院子里有片宽阔的草坪，草坪上长着几株很大的桂花树，这时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绿叶金花，有如夜空缀满了团团簇簇的繁星；那浓郁的芬芳，使人闻之欲

醉。树下有一组石桌石凳，系青石凿成，清凉如水。往日这个时候，每到夜晚，常有朋友前来赏花品茗，纳凉消夏，直到深夜才带着浑身芳香缓缓散去。有时省里领导同志来访，也喜欢在这里和尚奎一道切磋政治，研讨生产，似乎这一块荫凉，几树馨香，能给人情思，予人启迪。

我发现，朱老总也挺爱这个地方。他把几十盆品种不同的兰花从专列上搬了下来，分散摆在桂花树的四周，形成十分自然的点线组合，他经常坐在石凳上，时而仰视金桂的挺拔、凝重，时而俯看幽兰的潇洒、飘逸，恬静安适，怡然自得，象一个在辛勤劳累之余，欣赏自己的成功作品的老园丁。我们真不愿打扰他的雅兴。

有一回尚奎和我去看朱老总时，正碰上他和几个卫士、秘书在桂花树下摆弄兰花。他见到我们很高兴，拍拍手上的泥便来欢迎我们。康大姐听到声音，也从房子里出来了。于是，我们便坐在石凳上谈了起来。我对朱老总说，我很喜欢兰花的绰约风姿和淡雅清香，可是不管我怎么细心侍弄，总也养不好。他平时是沉默寡言的，听说我也是一个爱兰的同道，便慢条斯理、兴致颇浓地对我谈起了兰花经。他说，兰花是一种很娇贵的花卉，既怕烈日，又怕强光，水、肥、土都要恰到好处，多了少了都不行，所以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有“春不入，夏不出，秋不干，冬不湿”的四大戒律。而且每年这个季节必须换一次土，否则它是不会开花的。

“来吧，水静！”他站了起来，说道，“我来教你怎么给兰花换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跟着他走到兰花旁边，蹲了下来。他拿起一盆兰花连土从盆中倒出，

清除盆内残存的老土，仔细垫盆，换上已准备好的腐殖质土壤；然后是分株，剪掉烂根和病根，理直肉根，再植入新土。他一会儿就做好了，自始至终从容不迫，娴熟得象个经验丰富的老花工。我都看得入迷了。

“兰花的品种很多，你喜欢哪一种呢？”他说着，一边搓搓手上的泥，缓缓走向石凳。

“我喜欢墨兰。”我说，“它叶美、花香，而且花上还有条形纹采，花上有花。”

“不错，只是比较难养。”他说，“兰花生长在深山幽谷里，它有自己的脾气、个性，一定要顺着它。否则，轻则不开花，重则枯黄而死。”

“我种兰花，就是很难摸准它的脾气。”我说，“肥呀，水呀都没少给，松土、洗叶，时间也没有少花，可总是不称它的心。”

“兰花的生性是高洁、倔强的，它讨厌浓肥大水，讨厌猥昵拨弄，讨厌喧嚣烟尘的纠缠。”他象以赞扬的口气谈论一个人的性格似地说，“所以它的香味清雅幽远，无与伦比，古人称它为‘香祖’，‘王者之香’。”

“喜欢兰花的不少，善于植兰的却不多。”我说。

“你要是喜欢它的香味，首先得尊重它的个性。”他说，“你要象朋友那样，而不是象主人那样对待它。否则，它就不会给你吐芳吐芬。”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觉得朱老总不仅是教我如何种兰，而且是教我怎样做人。

朱老总跟我说兰花的时候，康大姐和尚奎在谈着她的家乡万安的事情。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当1959年夏天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时，我又见到了朱老总夫妇，尚

朱德咏花诗及其手迹

契園先生
 社旬三十年
 比合
 卅年種菊永留香
 精研善養奇葩好
 承舊啟新世澤長
 全力栽培傳代久
 不辭辛苦為人忙
 京都老火欣來賞
 敬贈幽蘭配北堂
 朱德
 二六二年

奎把他们安排在“359”号。这是熊式辉在庐山的别墅。这幢房子虽然不象毛主席住的“180”那么有名气，在当时也是堪称一流的了。它的特点也是院子大，花木多，且品种都很名贵。尚奎认为，爱好恬静、喜欢花木的朱老总住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还有些不放心，因为朱老总这时已年过古稀，不知能否适应庐山气候；房前台阶又很陡，恐不利于老人上下。所以他们一住下来，尚奎就领我前去看望。且喜朱老总身体硬朗，腿脚灵便，毫无不适之处。看来，这次到庐山来，他的心情颇为愉快。

“我这是第二次上庐山。”他兴致勃勃地说，“第一次是八一起义之前。当时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发生，但汪精卫还没有公开与蒋介石合流。朱培德便采用‘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方式，把共产党员从军队中、从省会赶走了之。我这时只好离开南昌，准备到武汉去找党组织。可是一到南昌，就被敌人盯住了。所以一到九江，我便找了一个朋友，要他陪我上庐山住几天，借以摆脱那条‘尾巴’”。

这是1927年的事。对那段历史我知道一个概略。当时朱培德对共产党这么“客气”，是和朱总司令密切相关的，因为朱老总在滇军中威望很高，朱培德害怕过火的行动会导致军队离心。朱老总到九江时，滇军军长金汉鼎还召集部队列队欢迎，吹军号致礼，这是一种很高的礼遇。朱老总到武汉后，又根据党的指示，秘密返回南昌，和周恩来同志一道，筹划南昌八一武装起义，打响了向反动派进攻的第一

枪。
“那一次形势紧张，肯定游兴不浓。”我对朱老总说，“这回可以从从容容地到处走走。”

他微笑着，点点头。

尚奎一再请朱老总好好休息，我们会常来看看的。康大姐则说：“你们客人多，不要为我们多操心了。”

非常遗憾的是，朱老总的良好心境不久就因彭德怀同志的挨整而搅得不能宁静……

朱老总对江西、对南昌很有感情。1961年冬，他和康大姐又一次来到南昌，这次住在滨江招待所的一幢平房。他们住的时间比较长，尚奎和我还陪他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那时南昌的春节很热闹，各个剧团都要上演崭新的节目或优秀的传统戏剧。朱老总特别喜欢江西的地方剧种，我和尚奎陪他看了好几次赣剧和采茶戏，如《秧麦》、《双拜月》等。因为心情很好，所以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他还亲笔以正楷书写了两首给尚奎和我。

第一首只有四句：
南昌起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第二首长一些，写的是：
南昌过春节，镇日飞瑞雪。
预兆大丰年，人人皆喜悦。
春雨到田间，积水连阡陌。
三年大跃进，多建新工业；
满城气象新，十年大改革。
晚看采茶戏，夫妻同秧麦；

农家遗古调，姐妹双拜月。
军民互拜年，庆祝大团结。
总司令把《秧麦》、《双拜月》两出戏也嵌进诗里了。

得到朱老的赠诗，我和尚奎都十分高兴，并且立即送到北京荣宝斋装裱妥当，珍藏起来。可惜“文革”中被抄走，至今没有下落。

3月间，气候渐渐转暖，已是76岁的总司令不辞辛苦，又到临川、大茅山和井冈山视察。在井冈山期间，他还攀山越岭，亲手挖了不少野生兰花，带回北京，打算驯养后把这些井冈山兰分送给国内外友人。

朱老总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嗜好是种兰。听说他早期在滇军中就酷爱兰花；革命胜利后，他年纪也大了，这便成了他的一种高尚的志趣。他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种了3千多盆品种不同的兰花，都是他长时间搜集来的，并且经常亲自侍弄。他的客厅、办公室、卧室，常有兰香飘逸。他到外地视察，专列上也要带着兰花。“文革”前夕，中央办公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全党发了一个通知，大意是养鸟种花，玩物丧志，是一种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云云。于是朱老总把几千盆名贵兰花，一盆不留地给了北京各大公园，有的还送给了外省的有关单位。这充分地说明了朱老总的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他时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处处以身作则。不过，我们听了之后，为此深深惋惜，硬让他与朝夕相处的兰花分手，他心里一定不是滋味。

我觉得，朱老总种兰，既是一种业余爱好，也是一种健身活动，无论对自己、对社会都是有益无害、无可指摘的。

不养兰花了，对朱老总来说，只有一样活动可以松动松动筋骨，那就是参加舞会。他只跳慢四步，一、二、三、四，有如散步一般，舒缓均匀，而且准时而来准时而去。他德高望重，我们这些女同志都敬重他，只要在舞会上出现了，我和余叔、佳楣等人就一定要请他跳舞。他对我们也十分慈爱，经常主动邀请我们；有时因时间不够，他一支曲子要请好几位女同志跳，直到找遍为止。这是他对女同志的尊重。

总司令待人热情诚恳，爱护同

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

乔晓光

炎黄文化五千年，
三百岁前多领先。
联系各族牢纽带，
一家凝聚认同感。
弘扬优秀去糟粕，
温故创新赶超攀。
国际交流齐促进，
融合今古贡坤乾。

1991. 5. 10

缚龙

莫文骅

三面红旗太急进，
人民公社谈何易。
地产焉能靠大胆，
共产风刮太离奇。
天灾人祸政策偏，
欲速不达害自己。
反左忽又反右倾，
优良传统被忘记。

志，德高望重，宽厚坦诚，尚奎和我到北京，总喜欢到他们家去看望，加上康大姐又是尚奎的故乡，所以来往也就多了。朱总司令、康大姐感情真挚，对我们非常关心。有一回日本在北京办了一个展览会，康大姐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可以降血压的内衣，便立即买了两套，托人捎到南昌，送给尚奎。她知道尚奎的血压高。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说明这种内衣的作用，并且告诉尚奎说：“老总已穿过了，好象效果还可以。”另外还送了一把小梳子给我，它非常漂亮，以致我一直舍不得用它，保留至今，以示纪念。

我们去北京，是必定要去看朱老总和康大姐的。他们总是热情地接待我们。朱老总平常说话很少，但满脸堆笑，饭后又是水果招待。有一次给我们端了一盘印度尼西亚产的水果。那时我国跟印尼关系挺好，苏加诺总统和我国领导人来往频繁，经常会送来一些热带水果，以表示他的友谊。这回碰巧被我们赶上了，所以朱老总拿来招待我们，我从来没看见过这种水果，样子很怪，外壳很硬，紫红色的，比梨要小一点。我拿在手里左看看，不知怎么个吃法。朱老总看看我，笑了笑，便叫康大姐为我们示范。我如法炮制，把壳敲开了。谁知这种外貌不扬的东西，里面的果肉却雪白鲜嫩，吃起来味美可口，满嘴生香。我问朱老总，为什么这种水果的外壳又厚又硬，而里面的肉却又水嫩嫩的呢？他轻声细语地告诉我，这是一种热带水果。热带有许多植物的果实都有硬而厚的外壳，因为它们要生存，要繁衍后代，就必须使果实里的水份不被蒸发，果实里的肉质不致腐烂，果实里的种子得以成熟，这就需要有一个外

壳，一个硬度和厚度足以抵抗热带烈日曝晒的外壳。否则，它就不能生存，就要死去。我国海南岛的椰子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这是自然界的一种生存斗争，挂这种果的树显然是一个胜利者。

一个小小的果子都有许多学问，大千世界实在太繁杂了。

“文革”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朱老总的了。1976年总理逝世不久，我和尚奎便到北京治病。八月初，尚奎在北京医院动手术时，听说朱老总患感冒也在这里住院，我们打算过几天便去看他。可是八月九日清晨广播便宣布了我们所敬爱的朱总司令于头一天去世的消息。哀乐声声，催人泪下，尚奎和我悲痛不已，眼泪不住地流着。尚奎半天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心里很悲痛。

朱老总的后事被“四人帮”办得非常草率，他的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很小的礼堂里，举行一个范围极为有限的遗体告别仪式。尚奎脸都气青了，对我说：“你去告诉医生，我要去向总司令的遗体告别，和总司令见最后一面。”

“到小礼堂还有很长一段路，你怎么能去呢？”我说，“你的伤口刚刚拆线，走多了路会重新裂开的，还是让我代表你去吧。”

“不，我一定要亲自去！”他坚持说。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找医生了。医生曾反复交代过，杨老年纪大了，刀口恢复得慢，一定要小心照顾。可是我又不能拗了尚奎。他对朱老总感情如此之深，硬不让他去见这最后一面，他是决然不依的。我找到了吴慰然院长，把这层意思跟他说了；吴院长很

理解老同志的心情，略一思考，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尚奎坐在轮椅上，从电梯下到地下室，经地下室的通道推着小礼堂。就这样，他一步路没走就到了小礼堂了。

我搀着尚奎，在朱总司令遗体前深深一鞠躬，眼泪随之滚滚而落。总司令躺在鲜花翠绿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又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那缓慢而亲切的轻声细语，跟我聊天，给我教诲，耐心地对我讲热带水果，手把手地教我种兰花，我的心如绞如割，眼泪滴湿了我的衣裳。我推着尚奎走到康大姐面前，互相悲痛地流着热泪，默默无言，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互相紧紧地握着手……

将尚奎送回病房之后，我说：“我得回京西宾馆去，我要为朱老总送行。”尚奎点点头，声音哽咽地说：“去吧，去吧。”

从北京医院出口到京西宾馆的马路两侧，挤满了臂缠黑纱、胸戴白花的悲痛的人群。当我赶到宾馆的顶楼平台时，总司令的灵车已从远处徐徐开来。灵车四周，饰有用黄、黑两色绸带扎着的花球，垂着长长的丝穗。丝穗随着灵车的行进和哀乐的节拍而飘动，把人们的心都搅碎了。有人在抹泪，有人在抽泣。我的泪水在涌动，眼前一切都模糊了。我似乎觉得马路旁边摆满了兰花，总司令从兰花丛中走来。微笑着说，“兰花的生性是高洁的，倔犟的……你要喜欢它的香味，首先得尊重它的个性……”

于是，兰香拂拂，兰风卷起，护着总司令徐步而前……

（选自《大人物的隐秘世界》）

（责任编辑：刘家驹）

他不是科学家，但与科学技术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他是戎马征战的将军，但与科学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张爱萍将军成功地组织指挥了国防科技战线许多重大战役。他以赤诚的心与科学家广交朋友，甘当科技人员的“孺子牛”。他重视、信任、尊重、关怀、支持、爱护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事迹已广为人们传颂。本刊采掇的一则，是将军早年在创建我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海军时信赖与依靠科技专家的感人故事。

张爱萍和他的招贤榜

胡士弘

1949年初，党中央发出“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已抵进长江北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向南中国疾进。这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人民解放军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海军。

党中央在西柏坡向华东军区发出急电：着即组建海军，务于1949年底前能配合陆军解放台湾。

恩格斯说“现代军舰是现代工业的缩影”。而现代海军则是“当代最新技术的集大成者”，是技术最复杂的军种。各国通例：训练一个航海官需6到9年；一个舰上操作兵也需经过2到3年的正规训练。而我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求白手起家，命令苛刻得近乎无理。

张爱萍接受了这个“不可想象的任务”。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

解放战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南中国席卷而去。从饮马长江到兵临东海，仅仅用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要船，要兵舰，要海军配合作战的电报纷至沓来。性急的指挥员弄来一些木帆船，试图攻占近海小岛，结果船沉人亡，损失惨重。

形势刻不容缓。张爱萍苦心焦思，想不出良策。这夜，他手执《战国策》，掩卷沉思，一个念头突然浮现于脑际：何不用“信陵君招贤纳士”之策，广罗海军人材！

国民党海军人员中的许多人，当初投笔从戎献身海军事业，并不是为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愤于列强的侵略，是为了保国御敌，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们都有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与卫国志。那么，为什么不能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呢。张爱萍向党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经过研究和协商，党委作出了公开招收国民党海军人员的决议，并为此向华东局写了报告。

“此策甚好，速办。”陈毅用赞许的口吻很快作了批复。于是，一张招贤通告登在了当时的《大公报》上：

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凡一切曾在国民党海军中工作过而今后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登记，量才录用。

上海、青岛、福州、厦门、广州，都设立了“登记处”。前来登记的人中有海军元老曾以鼎中将，周应聪、曾国晟少将以及杨沧治、吕美华、罗柳溪等重要海军骨干。

曾国晟，早年留学东瀛，学造船业，又在英国皇家海军实习工作过，当过国民党海军总部的机械署长，是个有很深造诣的造船专家。国民党撤离大陆时，他躲到福州老家去了。张爱萍得悉此人，当即前往福州亲自请他出山。

共产党的高级军官，亲驾陋室，使曾国晟受宠若惊。心头的迷雾顿时烟消云散。他慨然前往华东海军的所在地——上海。

怎样才能尽快弄到可以用来作战的大批舰船呢？曾国晟凭着知识与经验，满有把握地提出：用商船改装军舰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可以做这项工作。

船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大批操船人员从哪里来呢？张爱萍又锁紧了双眉。

这时，原国民党海军专家徐时辅应召而来。然而党委内部在要不要吸收徐时辅的问题上，却产生了分歧。

徐时辅学识渊博，才华出众，颇受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器重。1943年到1946年，他先后在美国费城斯瓦史摩大学和安娜浦利斯海军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深造。回国后，任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为统一海军，提出了《整编方案》和一系列重要建议。蒋介石曾亲自接见过他，并授予他中正奖。

这确实是一位难得人才，但又是

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亲信。他能真心诚意地为建设人民海军服务吗？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

徐时辅原籍湖北，生长于东北，出身于东北军海军军校学习班幼年班。由于张学良与共产党的渊源，以及共产党坚持抗日，徐时辅包括东北军多数将士在思想上与共产党有一种亲近感。因而解放前夕，在国民党海军逃往台湾的关键时刻，他能听从共产党人的劝说，自动脱离国民党，躲在上海外滩的一个朋友家，甚至受到通缉也在所不辞。现在，他主动找上门来，这说明，他对我党我军有一定认识，有爱国心，有建设海军、保卫国家的愿望。对这样的人，我们不应拒之门外。张爱萍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张爱萍毅然单独接见徐时辅，并与他作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给徐时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打定主意，跟共产党走。

这以后，张爱萍对徐时辅放手使用，给予了充分信任。吸收他参加专门研究海军建设重大问题的研究委员会。并提议，让徐时辅作为舰艇调查委员会委员，参与了舰艇等装备实力的调查研究。

那时他们同住在棧行社。张爱萍经常到徐时辅的居室移樽就教。遇有重大活动，总忘不了邀他参加。当时，徐时辅还没有成家，张爱萍为此非常关心。他得悉徐时辅的未婚妻王福荫居住北京，便敦促他尽早前去完婚。

就在这年8月28日，张爱萍还带领他去见了毛主席。这是徐时辅终生难忘的殊荣。在中南海颐年堂，他与



毛主席接见张发奎、徐时辅（前排左起第五人）等

薛幼颖 供稿



张爱萍在广州舰检查战位训练情况



高一鸣摄



张爱萍在华东海军学校检查教学器材



将军的天伦之乐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张爱萍在原子弹试验现场

张桐胜 供稿



聂荣臻元帅(右)与张爱萍将军

林遵、曾国晟、金声等与毛主席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使徐时辅最难以忘怀的是临别时毛主席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外。共产党尊贤重士，连最高领袖亦复如此！

洞房花烛夜，张爱萍作为证婚人参加了徐时辅与王福荫的婚礼。时至今日，徐时辅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春风化雨，冰消雪融。共产党人向徐时辅走来，走进了他的心扉。他认识了他们，也认识了他们所为之而奋斗的事业。决心以心换心，把自己的学识才华，全部奉献给新中国的海军事业。

舰和人有了。但舰是破旧不堪的舰，人则是两个“跛子”：新海军人员文化低，不懂技术；原海军人员有文化，懂技术，但政治思想未得到改造。要使两个“跛子”都能在最短时间内站立起来，上舰参战，何其难啊！

“你以为，我们能不能在很短时间内，用突击的方法，学会操船、射击、堵漏等急需的海军技术？”张爱萍向徐时辅请教。

“我们可不可以采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办法？”说着，他随手拨动房间里的电灯开关。“像这电灯，什么样的结构，怎么制造，以至于光电原理等等，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我们只学开关电灯。你看，这一拨就亮，一关就灭，不是人人一学就会的吗？”张爱萍说罢，热切地注视着徐时辅，等待他的回答。

“能！”徐时辅用十分肯定的语调说，“在短期内学会操作使用可以办到。”

“要怎样才能办到呢？”张爱萍喜出望外。

徐时辅不慌不忙地说起自己的一段经历：1947年他任“兴安”舰舰长，舰还在美国，水兵也要临时训练。他

根据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只对新兵进行了三个月必要的技术知识和操作要领的训练，便带他们上舰，边学边开，横渡太平洋，硬是把舰从美国新奥尔良港开了回来。

徐时辅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这样肯定的回答，是要承担责任乃至风险的。因为我军战士的文化程度与美国军人甚至国民党兵都不可比拟。美国舰上的一个锅炉兵也是大学毕业生。但是，张爱萍相信他能履行诺言。把训练“早鸭子”的任务交给了他。

9月，华东海军学校正式成立。

根据徐时辅的计划，一批批“早鸭子”入校接受技术训练。这些有高度政治自觉性的“土秀才”们，克服文化水平低、领会程度差带来的种种困难，在原海军人员的帮助下认真学



习海军技术的“ABC”。这期间，徐时辅每天到海校检查督促训练计划的组织实施情况，还深入学员队作辅导，直忙到深夜。

而另一个“跛子”，在辅导“早鸭子”掌握技术的同时，也入校接受政治和解放军光荣传统的教育。在转变思想的历程中，他们得到了新海军的真诚帮助。

3个月过去了。一批批初步懂得了海军知识与操舰技术的“早鸭子”，与经过学习思想面貌焕然一新的原海军人员，联袂登上舰艇。他们边学边干，并肩携手，在辽阔的太湖上初试锋芒，便使海盗惯匪闻风逃遁。他们在长江口扫雷、护航，开始为国家的经济恢复出力效劳。

不久，一支由

多艘舰艇组成的人民海军，突然出现在浩瀚的东海洋面。他们配合10个营的陆军部队，相继解放了位于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滩浒岛和嵎列岛。

人民海军奇迹般的崛起，大大震慑了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驻有“15万精锐国军”又有舰队与机场的舟山群岛之敌，闻风丧胆，不战而去！

人民海军乘胜南下，他们配合陆、空军发起我军史上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并迫使大陈岛万余蒋军不战而退。

从此，整个浙东洋面成了华东海军（后改为东海舰队）的天下。

张爱萍创造了古今中外海军建设史上的奇迹。而徐时辅则实践了他的诺言！

“千金重一诺，功名虽勿论！”谈起往事，徐时辅感慨万千，他不会忘记在他爱人生第一个孩子时，细心的张爱萍趁出差北京之机，将徐时辅带上，好让他有时间照顾妻儿。

徐时辅的家搬到南京后，逢年过节，张爱萍、李又兰夫妇总要前来看望。虽然这时张爱萍已经在华东军区工作。甚至徐时辅等人遭到冷遇时，张爱萍也始终如一地从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鼓励他们。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爱萍不顾身家性命始终为他们说话，并多次出具证明。甚至明确指出：“工作是我要求他们做的，有问题找我好了。”多么仗义，多么光明磊落啊！

“人生难得一知己啊！”谈到张爱萍，徐时辅老人用手掌抹着泪，激动地说。“张爱萍是了解人的！”

他把一个“人”字说得特别重。

(责任编辑：张蕾)

张爱萍与作者胡士弘 李又兰摄



刘少奇的野烟叶子不见了，黄镇和李伯钊忽然腹痛如绞；周恩来把设计军旗的重任交给了黄镇，因为他早就是位红军画家；黄镇夫人请朱老总吃她做的豆花，朱德说进城后你们开个四川饭店吧！

当年谁偷吃了 刘少奇的烟叶子

西柏坡在滹沱河北岸。村里住着七、八十户人家。它离石家庄有90公里，那时属晋察冀边区。1947年5月初，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领中央机关到达后，西柏坡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正在总政治部负责组织工作的黄镇，由总政副主任傅钟陪同，跨进兼总政主任的刘少奇屋子时，已到了掌灯时分。

刘少奇盘腿坐在炕上，手里拿着一卷古书，文件和电报堆在炕桌旁。顺眼看去，书桌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他招呼来人坐下，望着黄镇问：

“我们以前见过面吧？”刘少奇忙于中央事务，总政工作实际由傅钟负责。黄镇只向傅钟汇报工作。

“见过。”黄镇点点头。在他眼里，刘少奇两鬓已有几根灰白的头发了，严肃的脸庞也更消瘦了。他想起往事，说道：“在长征的时候，我和李伯钊同志在搞宣传……”

“哦，我想起来了。”看上去比较严肃的刘少奇谈起话来也很风趣，“你们俩还偷吃了我的烟叶子，差点中毒！”

屋里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黄镇笑红了脸，用手稍微推了推帽檐。想起这件事，黄镇也觉得十分好笑。

那是长征到黑水芦花时的一个故事。宣传干事李伯钊在懋功收留了一个非要参加红军的藏族姑娘九香。九香聪明能干，行军时，黄镇、李伯钊去宣传鼓动，她就给他们背行李和找吃的。红军的口粮越来越困难，李伯钊有一天见九香手里提着黑鸟乌一包东西，从河里走上岸

黄镇与西柏坡的领袖们

尹家民

来。李伯钊接过打开一看，尽是些活蹦乱跳的小鱼儿。原来九香把她的长袜子脱下来捕小鱼，李伯钊忍不住笑了：“人家搞粮食，你捉鱼，这还顶得了饭食？”九香说：“看你说的，我拿回去焙干了，掺上些麦子，我们三个至少吃几天。”她俩回到驻地，一个添柴，一个掌锅勺，把鱼焙干，准备路上吃。可为了慰劳伤病员，他们把这些小鱼也交了公。那天，黄镇、李伯钊出去宣传了一天，只吃了一碗稀粥，晚上饿得肚子咕咕响，翻来复去睡不着。黄镇望着墙上挂的干粮袋出神，可那是为过草地准备的，动用不得。他坐了起来，想上土楼找点吃的，在楼梯口遇到下来找吃的李伯钊。“哎呀，饿得睡不着。”李伯钊突然发现民运部长刘少奇睡觉的地方，矮凳上有一把绿油油的萝卜菜，喜出望外，连忙跑过去把萝卜菜取了来。黄镇也高兴起来：“野萝卜菜，好是好，可不能生吃，这地方的萝卜菜可能有毒，还是煮熟了吃吧。”他们走到行军锅前打红火石，点着柴火，用铜勺盛了水，把萝卜菜切碎煮熟。既无盐又无油，两人高高兴兴地分吃了，连汤也喝了。身子暖和了一些，话也多了。黄镇咂巴着嘴里的余味，寻思着问：“你是不是放了辣椒粉？”“哪来的辣椒粉？”“那可能是铜勺炒过辣椒，我怎么吃起来有点辣味儿？”睡到半夜，黄镇肚子里好像火烧一样难受，爬起来想找口水喝，只觉天旋地转，哇地一声吐了一地。心想：“糟了，是不是得了霍乱？”

肚子里翻江倒海，一直折腾到天亮。这时，听见外面刘少奇在问他的警卫员：“我昨天采的野烟叶子哪里去了？”警卫员说：“不知道。你放在哪儿？”“我就放在这条矮凳子上，我还守在旁边就不见了……”黄镇这才知道他们刚才吃的是野烟叶子，结果都中了毒。李伯钊病情更重，正在急救……

少奇同志想起的旧事，使当过草地的傅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1939年黄镇与夫人朱霖在太行山区



黄镇（中）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外宾

少奇直起身子，伸手向窗台上够烟，从怀里掉出个热水袋。大热天还捂热水袋？黄镇猜想，莫非少奇同志的胃病又犯了？他拿出文件袋，准备拣重要的早些汇报完，好让刘少奇休息。

傅钟翻刘少奇搁在炕桌上的线装书：“《资治通鉴》？”

刘少奇点上一支烟，眯起一只眼睛，躲着呛人的烟雾，凑近灯光，用略带湖南口音，缓慢而清晰的语调说：“前几天毛泽东同志讲了个典故，有关刘邦得天下的，我想查查原文。”

“查到了吗？”傅钟问。

“在这里。”刘少奇指着书页上的字，边念边解释：“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宴，席间叫诸将不要隐瞒，说他得天下的原因。大臣高起、王陵便说道：‘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刘邦就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擒获）也。’群臣听了，心悦诚服。善用人者得天下，此话很有道理。如今总政治部也有这个问题，工作忙而无序，看来还要充实干部。黄镇同志，你能给我推荐几名政工干部吗？”

刘少奇讲话喜欢开门见山。黄镇喜欢干脆利索，当即就给刘少奇开列

了名单。并顺势把华东军区政工会议的情况扼要汇报了一下。刘少奇一边抽着烟，一边静静地听，眉宇间不时流露出喜悦的表情。末了，他指着地图，做了个斜劈的手势，说：“全国解放战争快要进入第三年了，人民解放军不仅转入了战略进攻，收复和解放城市的进展大大加快。我们部队的建设也应该走上正规化了。哀兵必胜，那么骄兵呢？”

“政工会议上，已经有同志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了。”黄镇说道。

“在土改中我也看到这个问题。从表面现象看，有一种‘雷厉风行’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还有一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连孔夫子都反对，我们还能不反对么？所以作为政治机关，不要看见形式上完成任务就奖励，那样要上当，你要考查他是怎么完成任务的。所以我说，奖励官僚主义的人，也是官僚主义。越是走近胜利，越要有为人民当长工的思想。”刘少奇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吸了一口烟，却打住了话头，“当然，情况是你们比我熟悉，这是我的看法，请你们去研究。总之，在你们修改政工条例时，要学习毛泽东，不学王明。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就有了解决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金钥匙。王明只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听来好听，用了不灵。”

总政治部驻地夹峪，是漳沱河边的一个大村，与西柏坡很近，中间只隔一个东柏坡。从西柏坡到夹峪，步

行要不了半小时。星夜，黄镇大步流星往家赶。

大雨之后，洼地雾气沉沉。盛开的野花散发着蜜一样的馥郁，偶而从漳沱河畔袭来一股充满艾蒿味的热风，麦穗就在田地里摇来摆去，悄声絮语。黄镇在田边走着，回想着妻子和儿女的一张张面庞。他们结婚快十年了，几度离别，几度安危，尽管战争和工作琐事冲淡了欢乐的激情。但是，爱情并没有消失。每次短暂的相见，都会给土屋带来宁静的幸福，充满了彼此的关怀……妻子又怀孕几个月了，她是瘦了，还是胖了？

他随意遐想，不知不觉回到夹峪住屋，拍拍房门，没有动静。一摸门边，碰得那把铁锁咣咣咣响。奇怪，朱霖怎么还没到来？

请朱德吃豆花，说起刘伯坚，说起毛泽东的“飞机汤”

太行军区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朱霖，正在做着调离前的最后一件事。此刻，她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用电话通知各地，将营以上职务牺牲同志的棺木挖出，一村转一村，送到邯郸，那里准备建一座烈士陵园。

山村的熏风吹拂着她的短发，也翻动着桌上的烈士花名册。随着朱霖打去的电话，广阔山区的群众，在地方党的领导下立即像磨盘一样转动起来，他们敬爱烈士，早先烈士的坟墓都暗做了记号，再穷困，也不会去割墓冢上的一棵草；再贫瘠，也不会耕占一分坟地。现在，重新起出的棺木，即使很好，也要再上一层油漆；有的已开始腐烂，就另换新的棺木，有的烈士只有些遗骨，也重新装敛进大棺木，油刷一新。每天，哪位烈士的棺木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向朱霖负责的干部科报告。这是一支多么悲壮的队伍！辘辘碾车惊动了村镇和四方乡野，每经过一村，就停顿下来，等乡亲们放炮、扶棺；追悼，祭奠一番，再移向另一村。有时爬山涉水，有时过一个大村子要停半天，还有老乡随着碾车走出去十几里……

办完这件事，朱霖感到十分欣慰，

这才收拾简单行李，夹着个包袱，搭顺路的车，来到平山县夹峪村，在总政当了一名研究员，兼做干部工作。

……一天夜里，黄镇刚吹灭油灯，准备睡觉，就听得外面吵吵嚷嚷，汽车声、喊叫声混成一片。黄镇腾地坐起来，拍醒身边的朱霖，边披上衣，边催促着：“快起来，警报！”

当时，傅作义的军队还据守北平、张家口一带，时常派飞机来轰炸，派军队来进攻。一有警报，中央机关和总政治部要马上撤进深山树林。

黄镇坐在炕沿上，侧耳细听，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因为喊叫声里分明还有说笑声。

朱霖点起灯，也仔细分辨着。她开始十分惊讶，接着就哈哈大笑，然后她扬起眉毛，说道：“是喊跳舞哩！”

黄镇绷紧的神经一下松软，斜靠墙壁坐回炕上。

“半夜三更跳什么舞？”朱霖好奇地问。

“延安来的同志喜欢……”

“我们太行山可是土八路……”

“土也有土的好处。现在还在打仗，还没到全国解放……”黄镇转过脸，抬起略带忧郁的眼睛望着朱霖。用一种既像劝告又像命令的口吻说：“你不要去。”

“看你说的，我哪会跳舞。就是会，我也不去。”朱霖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莞尔一笑。无意识地抚摸着自已稍稍隆起的腹部。

黄镇笑了。他们彼此相知，似乎会用心灵来听和看。朱霖的品行堪称忠诚的化身。他经常感受到她那温柔的目光，宛如撒向他心灵的火花。

“过几天朱老总要来。”黄镇拍拍朱霖的手，“西柏城的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你帮助刘晓圆（傅钟同志爱人）做点豆花儿，招待招待他。他们四川人爱吃这个。”

“朱老总要来？”朱霖惊喜地差点叫起来。

朱霖特别爱戴朱德总司令。她第一次见到朱德，是在1937年她参加太行抗日游击支队不久。一天，队伍到达榆次县城北的峡口村，准备稍事休整。忽然有人站起来，手打着凉帽朝远处看，有人喊：“快到大路边去！”朱霖爬起来，飞跑前去。远远看见像是一位老农从北缓缓步行而来。他虽然

穿着一身士兵的灰布军衣，腰间紧紧束着一条旧的黑皮带，但身材高大，体格宽厚。有人指指点点贴耳相告：“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朱德总司令，他进太行山来了！”朱霖马上立正敬礼，以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朱总司令。朱德停下来，给游击队员们讲了从平型关到阳明堡的胜利，鼓励大家多打胜仗。在往回跑的路上，朱霖挥舞着胳膊，又蹦又叫：“我们见到朱总司令了！”未见到朱德的同志，别提有多懊悔了，后来，1938年底，地委调朱霖去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因为所在的高级班有在友军工作的党员，所以需要改名改姓，以便保密。朱霖拿起笔想，和朱总司令姓一个姓多好！希望能普降红色及时雨，于是，把“文佩卿”的原名改成了“朱霖。”“不过你可千万别逞能。”正说着豆花儿的黄镇眯起眼睛对朱霖说，眼神中还闪过讥讽的微笑。

朱霖感到莫名其妙，用询问的目

光望着丈夫，“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黄镇抬起胳膊朝脑后推动着硬刺刺的短头发，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宽厚地一笑，说出了原委。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生活十分艰苦。有人从四川来，送给朱总司令一些榨菜和豆瓣酱，他一直舍不得吃，放在文件箱里，每次行军都带着。有一次，他把警卫员叫来说：“把那些榨菜和豆瓣酱拿出来，把榨菜泡上。明天邓政委和刘师长要来，请他们吃。”旁边有战士说，“这榨菜我来炒。”那个说：“我在上海西餐馆里干过，专炒榨菜。”左权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景保全更逗：“你们见过炒榨菜没有？菜放在炒瓢里，要把菜撩到半空中，翻个身，再用瓢接住，那才叫本事！”大伙不相信，都说他吹牛。于是他就挽起袖子，当场表演。谁知一使劲，菜抖到半空中，不见了！紧接着，炉膛里忽地一声腾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毛泽东主席接见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

起火苗，原来榨菜全掉在火里……朱德陪着客人左等菜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招唤警卫员，景保全哭丧着脸，拨弄着手指，吞吞吐吐说了原由。朱总司令急忙安慰他：“以后做事要稳重一些。”几位领导知道了这段“吹牛”的插曲，眼泪都笑了出来……

朱霖也咯咯笑了起来：“我可不会把菜掉进火里！”

过了些日子，傅钟、黄镇陪朱德来到夹峪。晓圃、朱霖忙着做豆花儿。晓圃也是四川人，做豆花儿很拿手。她将浸过的黄豆，和着水上磨磨，磨嘴上套一只面粉袋，使磨出来的豆浆流入袋内，三、四粒豆子和一匙水，很快就磨出一袋。她捏紧袋口，用力将浆水榨出来。然后把生豆浆倒进锅里煮，边煮边撇去浮面一层泡沫。煮开，加石膏水，熄火闷十分钟后，一揭锅盖，嗨！一锅又白又嫩的豆花儿裂着张张小嘴在笑。朱霖则走东家，串西家，从老乡那里买来一些香菜、辣椒、酱油、醋、香油等等佐料，摆了十几个小碟。

他们在院子里支起桌子板凳，请朱德总司令入座。

朱德招招手：“你们也来呀！”

大家坐下。朱德舀了一勺豆花儿，放进嘴里，连连点头：“晓圃，你手艺好，解放后到北平，别的事不要干，就开个四川饭馆吧！”又侧过脸，笑眯眯地对朱霖说，“你是山西人吧？你也可以开个山西饭馆。黄镇，你呢？你是哪里人？”

“我是安徽人。”黄镇回答。“不过你们四川的回锅肉我也会做。可惜没有肉。”

“你跟谁学的手艺？”朱德颇为惊奇地问。因为他也会炒红油油辣酥酥的回锅肉。有时来客人，只要有肉，他就系上一条围裙，做顿回锅肉。所以人们曾经叫他“老伙夫。”

“跟刘伯坚学的。”黄镇回应着，“长征之前。”

“哦，他是个好同志！可惜牺牲了。”朱德搅动碗里的小勺慢下来，不再吭声，仿佛陷进了深深的怀念。

刘伯坚是黄镇的革命启蒙者，也是朱德十分敬重的人。1930年秋，朱总司令第一次见到刘伯坚时就情同手足地说：“我在德国留学时和周恩来同志常在一起。恩来一听我一口四川土

话，就就想到了刘伯坚。他不止一次向我谈起你的才干和毅力。今日一见，果真不凡！”第二年，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说：“伯坚是很有才干。大革命时在冯玉祥那里搞得轰轰烈烈，真不简单。不仅有口才，有气魄，而且很有思想见解。连冯玉祥将军、于右任将军都非常钦佩他嘛。”朱德插话说：“我的家乡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西麓李家湾，与伯坚的家乡边界毗邻。我们还是真正的同乡哩！”毛泽东说：“朱总啊，你投军从戎，救国求索，伯坚留学欧洲，也是求索救国。看来你们是大巴山脚下的一文一武，殊途同归了。”……

同是四川人的傅钟与刘伯坚结识更早。当他在1921年7月初，与周恩来同船抵达法国后，就与在巴黎的刘伯坚接上了头。他敬佩刘伯坚的为人，叹息他的早逝。趁给朱德添豆花儿的功夫，换了个较轻松的话题：“我和恩来、小平在法国留学，连学费都紧张。我们几个就开起了‘中华豆腐场。’非常热闹。恩来吟一句唐人的豆腐诗：‘旋磨上流琼液’，小平就接上一句：‘煮月铛中滚雪花’。一时间，中华豆腐名震巴黎……”

刘晓圃补充着说：“现在西柏坡的生活比那时还清苦。前几天毛主席请我们去作客，说要请我们吃他发明的飞机汤。我们以为是打下敌机缴获的美国罐头做的汤呢。主席直摇头，说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原来是烧开一大锅水，把几片切得跟纸一样薄的鸡肉放进去，肉片在锅里一个劲飘，就成了飞鸡汤！”

朱德笑了一下，嘴角的皱纹更深了。他直起腰，说道：“现在最困难的是彭总那里。对他那里目前不能多增兵，因为多了也没有饭吃。我们的胜利是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所以要‘生产长一寸’嘛，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他又把目光转向傅钟、黄镇。“现在打仗，人的思想问题是一个主要问题。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去拼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就不一定都那样坚决。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尤其是解放战士占的比例很大，要加强教育，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朱霖插话说：“就是。我们太行山土生土长的干部要南下了，有的包了

一小撮黄土，有的剪下老婆的一小撮头发带上，还有个别的带了老婆的一只小脚鞋……”

“这种眷念家乡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朱德温和地笑着，“当兵打仗，总是南来北往，四海为家。”

黄镇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朱德的话。当他再次抬头望着朱德，早年学艺的底蕴像一股电流似的突然触动了他：在斜阳里，朱德坐在一条木凳上，两腿交换地叠放着，仔细倾听别人的谈话。他的面孔有些黧黑，浓黑的寿眉下闪烁着沉着而又温和的目光，宽阔的嘴，深刻的皱纹，如同具有伟大神魄的花岗石塑像一般！他忍不住在纸上刷刷地画起来。随着铅笔的移动，像照片显影一般，起初模糊，后来明晰，这位老英雄的像，渐渐出现在纸上……

这以后，黄镇忙于选调干部，建立并充实政治机构，健全制度和修改政工条例。有一天得了空，他又将画像添改了几笔，贴在宿舍墙上，那里已经有一张解放区印制的毛主席像。他忽而看看“毛泽东”，忽而看看“朱德”，沉思良久，叹了一口气，对朱霖说：“我最大的遗憾是长征中给毛主席画的两张画都丢失了。我给毛主席画像的时候穿了一件自制的棉背心，里面的羊毛都钻了出来，毛主席还走过来，给我一根根拔……”

朱霖的目光也流露出敬佩：“那天我们去西柏坡看戏，快开演时，毛主席来了，没人说话鼓掌，警卫员把马扎往地上一放，他就坐下来。等他回头张望，一看我是个女同志，急忙把马扎往旁边一挪：“噢，我挡住你了！”……”

很晚了，他们还在谈论着领袖们的话题。

这时外面又传来一阵嘈杂的人声，乡间的长鼻子狗也在远处狂吠。朱霖拉了拉被子，低声嘟哝：“又是叫跳舞的，快睡吧。”

黄镇大睁着眼睛，有些疑惑。

这时街上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同时还伴有屋外小狗的狂叫和骡子的嘶鸣。警卫员在窗外焦急地喊着：“黄主任，敌人又来进攻了！”

“好，我们带领机关马上疏散。”黄镇朝窗外喊着，迅速束上皮带。

“我跟你一起走吧！”朱霖也穿好

了衣服。

黄镇指了指朱霖的肚子，粗声粗气地喘息着：“你这个样子怎么跟我们？就跟着老弱病残上山吧！”

朱霖拉开门闩，推开了屋门。外面人影攒动，气氛十分紧迫。她和黄镇匆匆分手，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夹杂在女同志的队伍里，磕磕绊绊地艰难地向着深山转移……

原来，辽沈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同傅作义密商，策划集中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配备汽车四百辆，炸药一百吨，组织一支快速部队，准备以突然的行动，经保定偷袭石家庄，直抄中共中央所在地……

不过，敌人的偷袭没有成功，朱霖却顺利地生下一个儿子。黄镇得意地拍拍儿子的小屁股，对朱霖说：“儿子的名字就叫‘胜利’吧！”

周恩来把设计军旗的任务交给他

秋天的夜晚异常静谧。只有庭院里那棵大梨树的枝叶被凉风吹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周恩来坐在灯下，戴着眼镜，在起草一份命令。写完了，他把毛笔插回陶瓷笔筒，摘下眼镜，朝后舒展着臂膀，从桌上取了盒万金油，打开盒盖，用食指粘了一点，抹在两鬓，搓了几下，又把一摞文件搬到眼前，戴上眼镜。

黄镇跟着秘书进来。周恩来把一盘梨递给他。黄镇没吃，可心里挺甜。他听说前些日子当他们冒雨过津沱河时，周恩来正在灯下批阅文件。警卫员进来报告：附近的窑洞塌了，有5个人埋在里面。周恩来提起马灯，抄了把铁锹就往现场跑。他指挥一部分人突击挖土，一部分准备担架，并派人去叫医护人员。结果救活了4个人，只有一个理发员压死了。第二天为这个理发员开了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写了挽幛，朱德总司令去抬棺……

望着周恩来这所未糊顶棚，露出一半被烟熏过梁子的房屋，黄镇感慨万千。“周副主席，找我来有什么指示

吗？”

“是这样的，”周恩来讲到正题，“我们将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了，不久，中央军委要发布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现在还需要制定一面统一的军旗。你画过画，我想由你来完成最合适。”周恩来对黄镇的艺术眼光十分赞赏。在长征中，他见过黄镇画的画，还见过黄镇编的活报剧《一只破草鞋》，黄镇还自己上台演蒋介石，曾把他笑得前仰后合。

“好，”黄镇愉快地接受任务。“我是否以总政的名义向全军发出通知，广泛征集设计图案？”

“以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的名义。”周恩来补充道，“在年底搞出基本图案以供中央讨论。”

警卫员端进来一碗小米饭，一碗菜汤，一盘小咸菜，放在进门的小桌上。

黄镇起身要走。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你是桐城人吧？你们桐城出过复古派，虽说桐城派古板守旧，但也有严谨的一面。严谨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在设计军旗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一点。”

黄镇回到夹峪，又让总政的杨大琦等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先起草了电报，向全军各大单位发出征集军旗和军徽图案的通知。很快就收到中原、华北、东北等地寄来的500多份应征图案。

黄镇对杨大琦说：“好，等我挑出几十面有代表性的，你马上组织人照图样剪刻出来。”

“可我们连一张纸一点工具都没有！”

“你骑我的马，连夜到石家庄去买。”黄镇把通信员叫来，“你负责保护他的安全。”刚刚解放的石家庄不时有敌特出没。

东西买回来，黄镇自己也开始设计军旗。他安详地忙碌着，边画边说：“古人云：‘三光者，日、月、星’，军旗上应有五角星。”

他画好了五角星，又在五角星下加了两道蓝杠。他向部下们解释：“这两道蓝色的线表示祖国的黄河、长江，解放军从小到大，将要解放全中国。”

他在最后审定的13面军旗图样上一一写上说明。基调是红底加一颗

五星，有的加了蓝、黄道，有的画了车轮边，还有的加了黄箭头。

黄镇仔细检查了稿样以后，给周恩来副主席写了一封信，派杨大琦直接送去。周恩来看了稿样和信后，又把稿样转交毛泽东及其他领导。

不久，周恩来又把黄镇叫到西柏坡，告诉他：“军旗图案毛主席也看过了，他的意见是军旗上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的历史节日，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黄镇一一记下，又询问周副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说：“军旗要以红色为底色，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用黄色。旗杆要有红黄两色旋纹，顶部要装上一个红缨枪的矛头，饰着红穗，象征人民军队的由来。”

黄镇回到夹峪驻地，即按以上指示设计大小尺寸，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位置，开始用楷体写的“八一”，但觉得制作起来不方便，立刻改为齐壮的美术字体。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央军委迁到北平，各总部也来到香山。有一天，黄镇把大伙叫到一起，说：“军旗方案已获批准，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制作出来，让军委领导看一看？”

“对呀！”大家一呼百应，筹齐了用料，就用红绸做了第一面军旗，把它插在香山军委领导驻地的草坪上。

不一会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到了，一面看军旗，一面听取周副主席汇报军旗制作的经过。

猎猎军旗在风中招展。旗上面金黄的五角星和“八一”二字，在朝阳中闪射光辉。毛泽东仰脸看了很长时间，深情地说：“将来要在发布命令时写上，军旗表示自八一南昌起义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大地，普照全国！”

毛泽东握住军旗的一角，凝视着。其他领导人的眼里也闪着光。

黄镇他们在远处看着，有的发出啧啧声，有的小声欢呼，黄镇的眼睛也模糊起来……

（责任编辑：晓渡）

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的共产党人恽代英，由于叛徒出卖，被害于1931年4月29日。年仅36岁。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书生革命家，又是他妻子沈葆英多情的丈夫。恽代英在狱中时，沈葆英曾去冒险探监。在60年后的今天，请读者看看这对革命夫妻怎样生离死别又难诉衷情！

恽代英 沈葆英 狱中诀别记

张羽

恽代英烈士遗像



机会主义”的帽子，调出中央机关，贬到沪东区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把一岁半的儿子送进戈登路的大同幼儿园，就和妻子沈葆英在闸北贫民窟找到一间9平米大小的住房，安了家。葆英到附近的缫丝厂作女工，担任支部书记。代英每天到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区活动。5月来到，李立三的盲动错误进一步发展，强迫开展“红五月”运动，发动上万工人到南京路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遭到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革命受到严重损失和破坏。李立三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仍然认为“革命高潮来了，要继续发动罢工，准备在乱中占领上海。”

5月6日早晨，恽代英出门时，沈葆英像往常送丈夫出门时一样，从头顶到脚跟把他检查了一遍，摸摸他的口袋，看有没有带了不该带的文件或纸片，给他塞上一点坐车或买报纸的零钱，抻抻他的工装，拍掉身上的尘土，又细心地擦了擦他的近视眼镜，帮他戴上，接着问他：

“你今天要到什么地方？”

代英说：“上午有个会，下午到老怡和纱厂去了解情况。”

葆英说：“现在工厂都查得紧，你不能不去吗？”

代英说：“我是行委书记，不能离

开群众，必须到工人中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葆英不快地说：“你老是不顾自己。”

代英笑笑说：“蒋介石虽然悬赏捉拿我，只要小心，不会出事的。”

夫妻依依分手了。没有想到，这天下午就出了事。

开完碰头会。下午，恽代英带了一包传单，匆匆向老怡和纱厂赶去，在接近厂门口时，突然碰到英国巡捕拦路搜查（上海人叫做“抄靶子”）。恽代英猝不及防，他高度近视，稍远处就看不清楚，前边正在搜查行人，他竟直闯进搜查的警戒线内，后退已来不及了。他一身工人装束，正是租界当局的搜查对象。一个“包打听”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就要上来抓他。他机警地把那包传单扔在路旁。几个巡捕看见这个工人带戴着眼镜、手表，就把他包围起来，要强行搜查。恽代英知道已无法脱身，就和巡捕扭打起来，在扑打中有意把自己的脸打伤、打肿，流血，用布包扎起来，使人认不出他。敌人把他扭送到提篮桥的巡捕房去。

英国巡捕房费尽心机，却什么也没问出来。他们不肯轻易罢手，第二天就把恽代英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开庭审理，没有审出结果，就把他转移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1929年，恽代英刚从香港地下斗争的岗位上转到上海的第二年，曾经主持举办过专门培训我党特种人员的训练班，训练过一批对敌人进行直接较量的专职干部，如闻名遐迩的“红队”等。他深知我们党在敌人的党政军各级机构内部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关系。因此，被捕的第四天，他被羁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时，就抓紧时机，利用看守中可以信任的关系，以“王作林”的名义，给地下党带去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信中详细地介绍了他被捕的情况、被英国巡捕房刑讯的经过以及自己的对策，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要求，要外面的同志根据他提供的情况，积极配合，早日释放。

不久，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军事会审法庭开庭了。

敌人在法庭上问：“你叫什么名字？”

1930年5月6日，是沈葆英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年4月初，恽代英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被李立三扣上“右倾

宋庆龄女士为恽代英写的题词手迹

代英烈士纪念

在伟大的革命中光荣地献身他给青年们以流那样不断的追思

宋庆龄

周恩来总理为恽代英写的题词手迹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他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九年了

一九五零年五月 周恩来

早有准备的恽代英答：“王作林。”
“多大年纪？”
“三十岁。”
“干什么的？”
“以前在武昌电话局做事。去年10月失业了，在家里住了半年，今年5月……”

“慢！你是哪里人？”
“武昌豹子澥。”
“你来上海干什么？”
“跟一个朋友一起来，他姓林，搭太古轮船来上海找事。刚来，和老林住法大马路鸿运旅馆，因房钱太贵，搬到东新桥一个小客栈……”

“那这包传单是谁的呢？”
“外国人把我带到巡捕房，毒打我，强迫我承认是自己带的。当时也有人在旁边怂恿说：‘你就说是旁人交给你，愿意出5块钱，叫你散发的。’我想这样也好，就承认是旁人给我的。但是，一搜我身上，也没有那5块钱，所以又只好说：“给我传单的人，说要我带过街，他自己来取。……”

开庭之前，我党已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营救工作，加上国民党当局一直没有弄到任何有力的人证和物证，恽代英的回答又措词周密，无懈可击，所以法庭只能凭那包传单判处他5年徒刑，关进龙华附近的漕河泾监狱。

这年8月，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对恽代英的被捕以及被捕后李立三的营救不力，也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指出：恽代英同志是我党一位有很高威信的同乡，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总教官时，蒋介石既想拢络他又很害怕他，骂他是“黄埔四凶”之一。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端，成了蒋介石重金悬赏缉捕的重要人物，怎么能把他放在一个容易暴露身份又毫无安全保障的岗位上呢？

对恽代英在被捕时自伤毁容、隐蔽身份，周恩来很赞赏他的聪明和机智，但又十分担心：恽代英长期从事公开活动，常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和国民党右派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国民党内认识他的人很多，要是长期监禁，随时都有被认出的危险。

周恩来指示，必须使用一切手段，

不惜任何代价，打通敌人的各种关节，把代英营救出来。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营救工作，并责成特科负责人、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具体执行。

8月27日，恽代英被押解到苏州第三监狱服刑。中央立即通知互济会派可靠的人去苏州探监，以便沟通情况，进一步开展营救工作。主持互济会工作的潘梓年选择了互济会救援部长黄静汶。黄静汶在武汉军校女生队受训时，直接受过恽代英的教诲；在闸北做街道支部书记时，去过恽代英家；再则她是湖南人，去探视满口湖北腔的恽代英，也容易掩人耳目。恽代英在漕河泾监狱时，她就曾去给他送过东西。

黄静汶接受了任务，和沈葆英商量后，就到苏州去了。

为了营救我党的蒙难者及其家属，黄静汶同敌人的监狱、捕房有过多次交道。她来到苏州第三监狱门口，说要探望刚从上海转来的犯人王作林。看守问她谁是犯人的什么人，她回答说是“表妹”。看守打量了她一番，给她办了手续，就让她在“接见室”的小窗口同恽代英见面。恽代英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可是黄静汶却仔细辨认了好一阵才认出代英。长期不剃头、不修面的恽代英，这时已同过去判若两人。黄静汶轻轻叫了声“表哥”，递进一包东西。她对代英说，“家里人”很关心他，要他放心。他们还用彼此都能领会的语言拉了一会“家常”话。

回到上海，黄静汶立即去见沈葆英。并亲切地安慰葆英说：“阿四，你放心，他隐蔽得很好，没有人能认识他。他要你多保重。虽然判了5年徒

刑，他现在正在要求减刑。”临别时，黄静汶把互济会给受难者家属的救济费交给了葆英，并叮嘱道：“阿四，以后你要能去时，最好带上一张儿子的照片。”

1931年2月，恽代英从苏州监狱转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这时，我党对他的营救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正在争取减刑，很有可能提前出狱。中央决定同意沈葆英去南京探监，并由帅孟奇通知她。

帅大姐亲自来到闸北沈葆英住处，叮嘱说：中央同意你去见面，你一定要控制情绪。带的东西要注意不能引起麻烦。接见时间短，说什么话也要早想好。过几天互济会派人来陪你前去。”

数日后，面容憔悴的沈葆英登上京沪快车的三等客车。在将见久别亲人的时刻，她和代英共同经历的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一幕幕在她脑海中浮现：

……1915年，她刚满10岁，二姐葆秀出嫁，二姐夫就是恽代英。别人家的新郎迎新都要披红插花，二姐夫却穿着随身的干净衣服就来了。她很惊奇。从此她就多了个“二哥”，代英喊她“四妹”。没过三年，二姐难产夭亡，代英誓不再娶，要为妻子“守义”。不久，葆英父亲也去世了。代英不忘岳家，时常来她家，帮助弟妹们补习功课。一天，孤苦无依的葆英和妹妹葆俊在屋檐下悲切地唱着《孤儿歌》：

“没人想到我，助我和爱我，心中好苦闷，真难受！前途又恐怖，我的命好苦，

孤零零地，谁来顾……？”

恽代英来了，唱起了明快、欢畅的歌：

“我会想到你，助你和爱你，
劝你莫着急，请站起。

回到我家里，和我做兄弟，
爷娘看见你，保欢喜。……”

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一家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担任中华大学附中校长的恽代英，率领武汉学生，走上武昌街头，向军阀王占元示威。夜深了，起风了，学生们都没有吃晚饭。14岁的葆英和16岁的三姐葆林，凑钱买了一篮包子，穿过长街，送到督军府门前，慰问代英、哥哥光耀和同学们。

沈家日子愈来愈困难，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办起了利群书社后，又创办了利群毛巾厂，让葆英和母亲、嫂子到厂里做活维持生计。后来，代英又帮葆英考进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

1923、1924年恽代英在上海团中央工作时，按期给在女师上学的葆英寄来他主编的《中国青年》，并经常给她写信，教育她懂得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应如何背叛本阶级，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她在代英的教育和培养下，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后来又成为共产党员。代英成了她心目中最敬慕的人。

使她终身难忘的是：随着北伐军占领武汉，1927年春天，身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也从广州绕道上海，回到武昌。而她已是武昌第一完小的教师。恽代英在完小讲演后，约她到洪山后谷岭去凭吊二姐。墓前，代英深情地向妻子倾诉他十年“守义”的苦心，是为忠于亡妻的爱情，是以实际行动打破男尊女卑。而今革命发展了，四妹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了。我希望和她结为伴侣，为革命理想而并肩战斗，你九泉有灵，会同意我的心愿吗？代英的忠贞和真情震撼了葆英的心，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代英的爱。32岁的代英和22岁的葆英在得胜桥恽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从此，沈葆英把她的爱献给了代英，风里雨里，一直跟着代英。无论代英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还是在上海我党中央任职期间，她都伴随在丈夫身边。

列车上的葆英又想起了他们的儿

子。那年，葆英怀孕了，想到做地下工作带着孩子的困难，她很为难。邓颖超大姐亲切地安慰她：“母性和党性是统一的，我们不但要工作，还要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儿子希仲出世时，大家是多么欢乐啊，邓大姐逗着希仲，喊着：“我的乐天！”周恩来高兴地叫他：“小代！”儿子开始学步时，代英用一个铜板放在地板上打转，逗儿子跟着铜板用脚去踩……

想起儿子，她感到温暖和快乐，但她立即又沉重起来。

记得邓大姐曾一再对她说：“葆英啊！你现在住机关，保卫代英的安全也是你的一项特殊任务。他是领导同志，他的安全关系到党的安危。保卫他和保卫党、保卫革命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个女同志，他们的家属，把他们保护好，也是对党的贡献。他每天出去，到什么地方？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在哪里吃饭？你都要关心。这不是小事情。你要尽心竭力保护他的安全。”

可是现在，代英已陷入敌人的魔掌，虽然在那种情况下，她也是无能为力，但她仍感到歉疚，不只是有负于自己的丈夫，而是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有负于党啊！

车到南京，沈葆英由互济会的一位同志陪着，乘马车走过冷清、沉寂的十里荒野，来到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她走进黑漆的大门，穿过好几条阴森森的暗道，到了指定的“接见”地方。她强自镇静下来，打量着这个房间。只见低矮的墙上，开着一个方洞，从这个方洞望去，一米多远的地方，也有一所同样的房子，墙上开着同样大小的方洞，与这里遥相对望。她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盯着对面小方洞后面的动静。

一会儿，传来了哗啦哗啦的脚镣声，两个看守押着代英走来了。她凝神盯着他那长长的头发，蜡黄的面孔，满脸的胡髭。他没有戴眼镜，一件黄色的军大衣，裹着孱弱的身体。葆英鼻子一酸，泪珠在眼眶里滚动。她差点喊出“代英”两字。看见一旁凶神恶煞似的看守，她猛然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忙收住泪水，嘴唇颤动着，千言万语，凝成了一句：“你……你怎么样啦？”

代英见到朝思暮想的妻子，也很激动，为了帮妻子控制感情，他停了片刻，十分平静地说：“别难过，四妹，我没有犯法，我没有干坏事，我是被冤枉的。你放心，刑期满了，我们一家还能够团聚的。你来时，家里人都好吗？”

葆英懂得他问的“家里人”是指党和同志们，忙回答说：“好，他们都很好。”“乘看守不注意时，又补了一句：“伍豪问候你。”

伍豪就是周恩来。听到这个亲切的名字，代英的眼睛一亮，兴奋地说：“他回来了，谢谢他。回去向他问好。”又问：“我写回去的信都收到了么？”

葆英说：“收到了。大家也安心了，要你养好身体。”

葆英把带来的包裹递过去，站在两屋中间的那看守翻了一下，交给了代英。里面包着衣物与食品，几本旧小说和唐诗宋词。她在那些诗词的空页里，用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写了想说的话。她指着包袱对代英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知道你身体弱，又受了折磨，他们一再嘱咐，还让我带了点东西来，给你补补身子。里面还一张小毛弟的照片，他已经会跑了，会喊爸爸妈妈了！”

“小毛弟！”提起儿子，代英眼里射出了温柔的光彩，高兴地说：“你能把小毛弟带好就行了。他长大了，能够帮助你，帮家里做事。他肯定比我有出息。我们家里穷，底子薄，要省吃俭用。不管今后日子多么艰难，千千万万要带好孩子，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葆英听同志们说过，代英被捕时曾和敌人搏斗，在巡捕房又多次遭到严刑拷打。这时，她想从他身上搜寻他和敌人搏斗的痕迹。大半年的狱中生活，伤痕虽然已经消失或被胡须掩盖，可他仍然很虚弱。代英尽量在妻子面前作出健康硬朗的样子，但蜡黄的面孔仍是让葆英阵阵心疼。

代英觉察到妻子的隐痛，用炽热的语言，亲切地鼓励她：

“四妹，你也要保重身体。我不在家，靠你撑持家庭，抚养孩子。你做好这些事，我心里是很感激的。告诉‘家里人’，我很好，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来了。”他还要说下去，看守突然走出来站在两个方洞之间，大声吼叫：“时间到了，走吧，不许讲话了。”

代英凝神注视着妻子，抿着嘴，蹙着眉，没有说话，也没有走。一对恩爱夫妻，隔着两道墙壁，两个方洞，遥遥相望，依依难舍，千言万语无法倾诉。

一个看守走过来，推了一下代英，恶狠狠地说：“你还等什么？快走！”

代英抖动了一下身体，瞪了那个看守一眼，大声说：“不许动我，我会走！”接着又转过身来，深情地对葆英说：“回家去费心照顾好小毛弟吧，我不会忘记你的。”说完，扭转头，拖着沉重的铁镣，头也不回地走了。

沈葆英惊叫了一声，忙把双手伸出方洞，想抓住他，不让他走，可是怎么能够啊！代英一步一步走远了，不见了，最后连铁镣声也听不见了，葆英喃喃地说：“我会再来看你的，我会再来看你的。”沈葆英怎么也无法料到，正在恽代英已经有希望提前出狱的时刻，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这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偶然暴露了身份。贪生怕死的顾顺章被捕当天就叛党投降，泄露了党的大量机密。国民党特务机关连发六电向南京报捷，恰好时值礼拜天，特务头子徐恩曾未来上班，电文为我党打入特务机关的情报人员钱壮飞拆阅。钱壮飞大吃一惊，立即冒险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把顾顺章可能出卖的机关、人员立即全部撤走、迁散、隐蔽、转移。当敌人张开巨网来沪搜捕时，扑了个空。

28日，顾顺章被敌人用船押到南京。正当他得意洋洋想报功请赏时，特务头子却大发雷霆，骂他是假投降，要枪毙他。顾顺章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无耻地说：“他们在外边的机关、人员能够逃掉，但是关在你们牢里的共产党头子却逃不掉。”敌人问：“是谁？”顾顺章说：“就是恽代英。”敌人惊愕地问：“关在那个牢里？”顾顺章说：“就在南京，就是你们的中央军人监狱。”敌人说：“没有啊，花名册上没有发现可疑的名字啊！”顾顺章说：“就是那个武昌失业工人王作林。”

敌人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国民党军法处长王震南带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到监狱查证了恽代英的身份。29日中午12时，36岁的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的刑场上，昂首挺立，洒下了他的满腔热血。

(责任编辑：晓梅)

一九五九年参加庐山会议途中的田家英



嗜书爱字的田家英

●何方生

早就听说田家英贮藏了不少书画，但不知其详。前几天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田家英收藏清代学者墨迹展览”于5月24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了。6月1日我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把全部展品草草浏览了一遍。因为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天安门广场上人很多，特别是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成群结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一些活动，显得热闹非凡，与历史博物馆展览大厅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参观者默默地观赏展品，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懂得做学问和研究书法的人毕竟不多。即使在那些少数参观者之中，据我观察，对展品收藏者本人的兴趣，较之对于展品本身，恐怕要大得多。

田家英这个名字之所以为世人所知，当然是由于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的缘故。但是，在看过这个展览《前言》上的介绍以后，特别是在我回家后又翻阅过《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和《田家英文集》以后，更加强了我的一个看法：田家英确实是一位少有的杰出人物，其人品和学识都可说是出类拔萃，超越凡俗之上，足资人们的楷模。如果说他之

受到人们重视，仅仅由于他当过什么人的秘书，那是非常之不公平的。

从《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我们可以知道，田家英没有上过大学，主要靠刻苦读书，勤奋自学而成材。据他女儿曾自（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写的《爱书爱字不爱名》一文回忆，他自幼酷爱读书，对各种知识都有浓厚的兴趣。他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用在买书和字画上。曾自说：“在我的印象中，家里最显眼的就是书架特别多，父亲的藏书总共有三十几书架，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里、妈妈的房间里都是三面墙排满了书架，大房间里还放置两排书架，每个架子都装满了书。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在林立的书架之间捉迷藏。”据当过田家英警卫员的段连英回忆，田家英曾对他说过：“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抓紧工作和学习就是浪费生命。”段在1955年调走时，田家英特地买了一本纪念册相赠，并在扉页上题了一句话：“只有努力学习人才会有出息。”但正像他女儿曾自写的那样，“田家英的爱书、买书、藏书，不同于文人雅士的欣赏玩味和夸耀博学，而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据曾自说，田家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爱着那些为我讲述真理故事的书本，它对我是一种诱惑，一种魅力，它指示给我一条坚决的道路，使我看清现实，它要我皈依真理，教我在应当交出生命的时候，就把一切全交出来。”不像那些心口不一的两面派，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确实做到了宁死不屈，为捍卫真理而捐躯。”

看了展览以后才知道田家英收藏的都是字，没有画，而且仅限于清代学者的墨迹。这是非常明智和卓有见识的。首先，田家英认为清代集封建社会之大成，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朝代，值得认真研究。清朝距离今日的我们最近，现在我国的版图就是在清朝鼎盛时期的康、雍、乾三朝确立下来的。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家过去往往厚古而薄今，注重研究古代史，津津乐道夏、商、周，而对近代史反而忽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田家英曾有志于研究清史，对萧一山在二十几岁时就凭一人之功完成《清代通史》的治学精神和勇气极为敬佩，有意在他有生之年写出一部唯物史观的清史，但他这一宿愿终于未能实现，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其次，田家英靠工资过活，一介寒士而非阔佬，花钱自然不能不有所限制，一般说来字贱画贵，只收字而不收画确实是个好办法。田家英对人说过：“一般人多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有散失、泯灭的危险。”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澍青老先生在看过田家英的藏品后也十分感慨地说道：“过去国家博物馆征集文物，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年代久远的文物，对离现在较近的清代的東西重视不够，现在要想再收集到这样系统齐全的清人墨迹，恐怕是不可能了。家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的眼光和作法早了我们整个三十年。”

如果说田家英以其品学兼优一向为人所称道，我以为他的品德较之学识更值得敬佩。他为人正直善良，刚正不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做为高级领导人的秘书，这种品德尤为可贵。在所谓“三面红旗”问题上，田家英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反映真实情况，提出不同意见，这使他失去领导的宠信，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利害得失，而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刻有“苟利国家生死以，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敢因祸福避趋之”的印章，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斋名前面加个“小”字做为自己的书斋名：“小莽苍苍斋”，表明自己对这位舍身取义的爱国志士的敬重，后来他本人果然也像谭嗣同那样以身殉国，留英名于千古。他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恶人，都敢于抗争，而绝不苟合屈从，这就使他像曾彦修在悼诗中所说的：“书生不解逢迎求，遂为斯民哭健儿。”在“文化大革命”那场大风暴袭来时难逃厄运了，他一向以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宁死不屈的刚毅精神蔑视这些不可一世的权贵。他在庐山会议上因同情和支持彭德怀而被围攻时就讲过：“庐山会议可以把我压碎，但不可把我压扁。”1965年秋，在“文革”发动的前夕，在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他曾对陆石讲到《诗经》里那首《柏舟》的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他说：“几千年前的一个妇女对自己的信念如此坚定，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还不如古时候的一个普通妇女么？我们应当坚信辩证法，坚信真理在自己一方，做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哪怕泰山崩于前而志不移。”1966年初，他又对来京的老战友侯方岳说：“真理我要坚持到最后，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正是他这种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残暴的恶人迫害下于1966年5月23日含冤离开了人世。

对田家英之死，有人曾批评他“脆弱”，说他“在顺利的环境里，往往锋芒太甚，而在受挫折的情况下，又缺乏韧性。”有人则说他“书生气太重”，“就这一条，竟然在一击之下就轻生，就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未免缺乏坚韧”。但我却同意李锐引述鲁迅先生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古语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家英之死，正如邓拓、吴晗、老舍、傅雷等人一样，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然，田家英如能活下来不死而以另一种方式对恶劣环境抗争，确实更好一些，不过这只能是“事后诸葛亮”了。也许值得一提的是我6月1日参观时在田家英的藏品中看到了一个条幅，上面是蔡世远（1682~1773，清漳浦人，康熙进士。）书写的朱熹的一首七绝诗：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这使我想起苏东坡那首《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以及王阳明那首七绝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如果田家英当时能够顶住那场风暴，“今朝试卷孤蓬看，依旧青山绿树多”，那有多么好啊。当然这已是不可能的了，悲夫！

巴金： 拳拳之心情系文学

唐文一

自从巴金与文学结缘之后，在六十多年的笔墨生涯中，他踏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实有力的足印，他将自己的情与爱全部奉献给了广大读者。

进入晚年的巴金，生活是紧张繁忙的，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原计划写完五集《随想录》，就停笔告别文坛。可巴金自感还有许多想说的话没有说完，他实在不愿辜负广大读者的热情企盼，所以又情不自禁地提笔续写起《随想录》来。由于手抖给握笔写作带来很大困难，但他并未放弃写作计划，每天仍坚持一定时间的写作，哪怕是写上几百字。为了给后人多留下些有用的东西，巴金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编辑《巴金全集》上了。每次出版社送来校样，他都认真仔细地进行校阅，从没有一丝马虎，也未因自己而拖延出版社的进度。另外，他还要抽时间整理自己的书信、手稿等物，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他不愿当社会名流，也不愿别人来打扰自己，更不愿受报刊之约写什么应时或表态文章，他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给他留些时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很有必要有一个放松的机会。在家中，巴金主要靠读报听广播，看情节性强的电视、录相片来调节自己紧张的神经。最近他终于有机会走出家门，走向大自然。去年中秋和今年初夏，他先后两次来到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休养。对于一直埋头写作，深居简出的巴金来说，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惬意，西子湖畔清新和润的空气，给他以充沛的精力；灵隐寺旁幽雅静谧的环境，给他以更深的思索；创作之家热情周到的服务，给他以自然亲近的感觉。他喜欢这个地方，这里能给他带来无限的回忆，这里能给他带来无言的畅想。他在创作之家的留言簿上写到：“这真是我的家，我忘不了在这里过的愉快的两个星期，谢谢你们。”

巴金不仅以脍炙人口的作品震撼着广大读者的心扉，而且还以无私的品德为人所称道。他在国内外文坛享有很高的声望，可他却认为自己是个极普通的人，他对事业的执着精神丝毫未减，然而对物质的享受却没有什么奢望。去年巴金接受了日本福冈奖给他的500万日元和平奖金，许多人劝他把钱留给自己用或给儿女，但他还是决定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300万，其余200万捐给作协上海分会。此时正值盛夏，上海出现持续高温天气，家里人考虑到巴金的身体，主张在他书房中安装空调机，被他婉言拒绝。作家徐迟向他推荐电脑，以解脱手抖写字困难的苦恼，但他也没有为之所动，500万日元统统捐了出去。

巴金那颗炽热燃烧的心，始终牵系着自己所挚爱的事业——文学，他希望祖国的文学事业得以弘扬发展，他愿为此付出一切。

中华文坛不老松

巴金、冰心、夏衍、
艾青、常书鸿侧影





冰心：

非宁静无以致远

秦时月

“……我最喜欢诸葛亮说过的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我理解就是一个人对于物质生活不要过分奢求，安于过得清简朴素一些，宁静则是心里尽可能排除掉个人的杂念，少些私心。这样，人生在世，不为个人私利操劳所累，把自己的志向同革命事业融合在一起，他的心胸就会宽大起来，精神就会充实起来，心情自然就可以乐观，情绪自然就会昂扬。一个性格爽朗，心境总是愉快的人，是不会因伤神而伤身的，再加上适合自身情况的经常性锻炼，起居饮食养成一定的规律，他（她）终会健康长寿。”

这段话是冰心老人讲的。纵观她90年生涯，不妨说，此话是冰心亲自验证的长寿之道。

与本世纪同龄的冰心老人，至今依然坚持写作，她在上海《文汇报》陆续发表的短篇随笔《想到就写》专栏文章，显示出其惊人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难怪巴金称她“永远年轻”。

9旬高龄的冰心，每天的日常生活平静而有规律。她每天早晨6点醒来听新闻广播，7时起床后早餐，稍作活动后躺下休息至9时起床，然后开始看书、读报、写作，或接待访客。中午12时午餐，随后与家人聊聊天，便上床午休至下午3点，起床后又开始阅信、复信，有条不紊地处理一些琐事。晚7时整，她习惯于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球赛、京剧等，颇能引起她的兴趣。

在饮食方面，冰心老人喜欢吃糙米和新鲜蔬菜，水果中偏爱香蕉和蜜桔，偶尔也吃点鸡肉。冰心认为，保持健康的身体，不能依赖于补药和营养品，而是要保持心理的平衡和乐观的情绪，这样可以增强旺盛的精力。

保持心情的平静，“在微笑中勤奋写作”，是冰心老人的养生秘诀。她认为，发怒、妒忌、憎恨以及懒惰，都是事业上的大敌，会影响身心健康。

魏晋时代的养生学家嵇康十分提倡“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冰心一生，实践了这一主张。她淡泊名利，崇尚简朴，不奢求物质享受。吴文藻教授去世后，她便将节省下的钱捐献给中国民族学院作为奖学基金。

然而她却爱海、爱生、爱水、爱花草树木，爱小动物，爱大自然。在晚年，她因有过骨折，遵医嘱不能去大自然的怀抱里旅游，便寄情于鲜花和猫咪。她的书房与卧室里，一年四季，鲜花不断，她尤其喜欢玫瑰花，“因为它有性格，刚毅、坚韧不拔。”

冰心爱猫，在文艺界是有名的，这小动物给她带来许多温暖和慰藉。有趣的是，据香港《天天日报》最近报道：养猫还有益于长寿呢，美国的贝克博士在做大量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以猫为宠物者，寿命可延长10岁。贝克发现，当人抱起猫咪时，其血压即下降，心率放缓——其中道理，或许正在于此。



夏衍：

生命在于脑运动

秦时月

夏衍与本世纪同龄，也与本世纪共忧乐。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却生活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而今，老人走过90年风风雨雨的历程，依然精神体魄健。

1987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新闻发布会上，笔者曾到夏公桌前请教几个问题，夏公身材瘦弱，思路却十分清晰，记忆力极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夏公毕生从事新闻、文学和电影艺术工作，是典型的脑力劳动者。步入耄耋之年，他写的大部头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以及他在答记者问时流露的真知灼见，都使人惊叹于其生命力的强健。曾有人说“生命在于运动”，亦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生命在于静止”。笔者以为，对夏公来说，恰当的说法是“生命在于脑运动”。

夏公很注意保持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他每天早晨5：30~6：30在床上叩齿，做按摩，此后开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和“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整，他开始在院内活动。上午，他一般都在家读书、看报和写作，下午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在家接待来访，89岁之后，夏公日益深居简出，但脑力劳动并未停止。

世界上最早的医书《素问》中的“脉理精微论”指出：“人精在脑”，传统中医学也认为，脑有协调全身的作用。现代脑科学研究亦证实了这点：经常坚持脑力活动，有益于人体的健康长寿。

一些人年过花甲就常有脑力不济、反应迟钝的感觉，他们认为这是生理过程的“自然老化”，其实不然。脑科学学者指出，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心理作用形成的暗示，另一原因，在于其忽视脑运动。

美国国立老年研究所使用计算机控制的电子显微镜测定：经常用脑的老年人，其脑细胞数量多于一般中年人。英国脑生理学家柯基斯和米勒，在对大量资料进行详细分析后得出结论：脑的发展取决于脑营养与脑运动，脑的运动，直接促进了脑健康，通过大脑去协调和控制全身的功能，达到健康长寿。夏衍直到晚年仍坚持脑力劳动，堪称因脑健而体健、长寿的范例。夏公在总结自己的长寿之道时，谈了如下四点：一是思想乐观，二是兴趣广泛，三是生活规律，四是适当锻炼。其中“思想乐观”这一点相当重要，他说：“十年浩劫伤残了我的躯体，但这不仅没有改变我的性格和信念，相反还增强了我的勇气。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在阅读、写作之余，常以竹竿或薄纸逗弄心爱的猫咪，乐在其中，而且还是电视机前的“足球迷”。

“我从来没有想过该怎样才能长寿，但居然也活过了



艾青：
达观幽默生命力顽强
秦时月

80岁。”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诗人艾青对笔者说这番话时，显得平静而随和。

一生经历了流浪、监禁、流放和不公正待遇的艾青，能有如此高寿，是使许多人惊异的，这不能不归结为他有顽强的生命力。艾青喜欢沙漠中的红柳、仙人掌和骆驼，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动植物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顽强生长的缘故。

对光明怀有信念，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达观的情绪，是艾青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在年轻时代，在中年或是晚年，无论遇到什么灾难和不幸，他都能泰然处之，他说：“我是乐观的，也是达观的。一辈子不知道摔过多少跤，摔倒了自己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土就完了。我即使一边流血，一边也还笑着……”

在新疆劳动时，他每天要打扫15个厕所，虽然劳动繁重，体弱多病，但他在精神上始终没有垮下来。一天劳累之后，他常常去戈壁滩上眺望夕阳，以忘却烦恼；他爱好美好事物的态度没有变，看到小孩射杀夜莺，他便去劝

阻：“它是会唱歌的鸟啊……”

苦难的生活结束之后，艾青恢复了人的尊严，也恢复了荣誉，他却很冷静：“许多比我年轻的死在我前面了，我却还活着。要是在若干年前死了和死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1988年，美国、法国、苏联、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和香港的50余名作家致函瑞典皇家诺贝尔奖评委会，提议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艾青。艾青对此事显得十分冷静，他告诉笔者：“我不是为了这个奖才写诗的。到了我这个年纪，对许多事情都看透了，因此既无大喜，也无大悲，一切随遇而安……”

生活中的艾青，还以幽默见长，言谈中常常冒出幽默诙谐的语言。在其晚年，曾做过脑部手术和右臂肱骨假体移植手术，十分痛苦，但他都靠着乐观与幽默挺了过来。

艾青平时很注意有规律的生活，每天早晨6点起床，并定时定量吃饭。饮食方面他没有太多讲究，好吃的东西也决不过量，有时偶尔喝点啤酒，他爱吃糖和水果，较喜欢新鲜蔬菜和鱼虾。艾青多年保持了午休的习惯，夜间睡眠也比较好。

在行动方便时，艾青常到室外散步，活动筋骨；行动不方便时，他便接受按摩，保持身体的正常循环。闲暇时，他常看报纸、电视，了解国际形势的动向，思索问题。此外，他也喜欢欣赏绘画、音乐、舞蹈和体育比赛。不仅如此，他多年来还积累了不少美妙的收藏品，如虎斑贝、鸚鵡螺、鱼化石、鸵鸟蛋、小葫芦等，丰富的收藏，增添了许多生活情趣。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艾青在古稀之年成功地戒了香烟。说来，他吸烟成瘾，一天两三盒，多年来已成习惯，但当医生提醒他戒烟时，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坚决戒掉了烟，再无反复。这点，令许多朋友为之叹服。

“人皆恶雾都，师何投荒漠？”“一生苦风雨，师何乐如故？”这是画家潘洁兹写给敦煌艺术家常书鸿的《问师》中的两句话，在同一首诗中，潘洁兹的答案同样赫然醒目：“佛国固虚妄，艺术足千古”，“劫难徒区区，吾道自不孤”。

常书鸿这位卓越的艺术家，把一生心血都献给了敦煌。他面壁荒沙40年，晚年定居北京后，依然魂系敦煌，为研究敦煌艺术、保护文物不遗余力地工作，赢得世人的敬重。

笔者不久前去木樨地公寓拜访常老时，这位年已88岁高龄的艺术家仍在创作“飞天”壁画，他握毛笔的手稳健有力，描绘细致，不象一般人那样容易颤抖，显然，这是半个多世纪锻炼的结果。

常书鸿：
魂系敦煌老而弥健
秦时月



常老年轻时开始洗冷水浴，在敦煌冰天雪地的环境中，依然坚持不辍，每天清晨都融化冰雪洗澡，使他抗风寒的能力大为增强。据其夫人介绍，1953年去新疆考察时，半百之年的常书鸿不习惯投宿处的羊膻味，便在吉普车上睡觉，第2天醒来竟被大雪埋没，爬出雪窝子照常考察，没有一丝病兆。

壮年时代，常书鸿一直生活在条件恶劣的敦煌，他经常乘骆驼在沙漠中跋涉，或是徒步登山，再高再险的山他都一往无前地攀登，数十年下来，他的身体素质得以增强，筋骨也很强健。常夫人说，常老洗冷水澡的习惯一直坚持到85岁，最近两年才停止，而他不辞劳苦为艺术事业奔波的劲头，至今犹健。

常老有不吸烟、不喝酒的好习惯，但过去一直喜欢喝咖啡，日本作家井上靖知道常老这一爱好，曾专门送他一套咖啡壶及用具。不过，最近为避免刺激性，常老较少饮咖啡，只是喝些清淡的绿茶、花茶提神醒脑。

进入晚年，常老的饮食有个特点，即顺应自然，他没有太多的禁忌，喜欢吃鱼虾、瘦肉、鸡蛋甚至蹄膀，而且爱吃甜食。他说，“我能吃这些东西，说明身体需要。”这显然与他日常生活、工作中需要消耗较多热量从事脑力劳动有关的。

值得一提的是，常老比较注意早餐。每天早晨起床后，夫人都要为他用敦煌的大枣、杭州的莲子加上冰糖、银耳、桂圆，熬一碗营养丰富的粥，同时还吃鸡蛋和牛奶。这顿早餐，不仅提供了充足的热量，而且起到了补气血的作用，十分有益健康。注重早餐，显然是保证常老老而弥健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常书鸿先生性格温和，一生极少生气，宽容大度，乐于助人，这也是他长寿的因素之一。

常老对笔者说：“我并没有注意去追求长寿，只是顺其自然而已。”的确，他没有刻意去追求长寿，一如他没有去刻意追求荣誉，无论是在青年、中年、还是在老年，他都沉醉在艺术的天地里，孜孜不倦地从事艺术研究和创作，自是一番享受。

我记不得已经相隔多少时间没有到钱钟书、杨绛先生寓所去看望问候。这既因为世事俗务忙忙碌碌，弄得自己再无什么串门访友的兴趣，也还因为知道他们闭门谢客，倦于应付访者，所以不便多去打搅。

前些日子，电视剧《围城》播映，引起观众热烈反响，想进一步读到原著，一睹庐山真面目。于是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一向被认为高雅的文学作品《围城》成了抢手货，书摊小贩竟以奇货可居，高价数倍出售。上海的一个书展大

●丹晨

在钱钟书

厅中，几千本《围城》一抢而空，文汇报记者报导说，那些“排了三四个小时的队，依然未能买到《围城》的书友双眼睛露出失望的眼神……”另外，要求访见钱先生的人和电话络绎不绝，弄得一向幽静的钱府也热闹起来，不得安生。有一家报纸报导钱先生的感叹，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安静一会儿呢？”



“我又不是什么奇怪的动物，为什么非要参观一下不可呢？如果你吃了一个蛋感觉很好，就一定要见一见下这只蛋的鸡吗？”

钱先生即使不无忿忿的时候，仍然幽默有致。最近，我去看到他们时说到此事，杨先生则是另一种反应。她温柔地笑着说：“有的人说，只要来看他一眼就可以了。你说……”她只是觉得可笑。他们确实很难理解这些读者的心理。写这部妙趣横生而又耐人寻味的罕见的作品，该是怎样一个睿智敏感的人。

钱先生近来因为气管炎引发哮喘。他在“文化大革命”时也得过此病，

去看望钱先生。当时他们的寓所在东城干面胡同。我叫门许久，只听得有女声回应，但询问了又询问，才迟迟开门。杨先生一见到我，惊惶之余很感意外欣喜。她告诉我，他们从河南农村回京已一年多，这套四居室的住房已被别人强占了一半。那家人很厉害，常常借故发作，辱骂两位老人是反革命家属。因为他们的女婿在1970年被迫含冤自杀。当时自杀就被诬陷为叛党，自杀者的亲属也就被株连为准反革命分子。与这样的人同居一套房内，受欺负自不可免，所以听见叩门声，杨先生都不敢开门，自审这时没有亲友敢来访，唯恐是那家人的朋友，又要无辜

“是的，我知道。我一直没有听你的话。但没有办法，我过去还得听别的话。”二十多年前，钱先生就曾多次谆谆嘱咐我埋头学术，不要旁骛，他自己甘于淡泊，置身名利场外，对政治角逐从来反感。但他同时却热心关心社会现实变化和进步。过去，我每次到他那里，他总是很有兴趣听我讲些社会生活和文艺生活中的见闻。他完全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像中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隐士，而是热情洋溢、爱憎鲜明，对于生活怀着强烈的激情。犹如他自己在《围城》序中所说的“忧世伤生”。我一直认为他在冷漠的表面下隐藏着的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也许，他不

寓所作客



钱钟书（右一）杨绛（左一）在寓所与电视剧剧组导演合影。

病情很严重，将近一年才恢复正常。这次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杨先生前些日子也病了，高烧摄氏39°1，但白血球倒不高，不过六、七千。如今已痊愈。我看她气色很好，不像大病之后。杨先生高兴地说：“我是自己锻炼，注意休息饮食，每天早上仍然外出散步。钱先生虽然病已好了，我仍不让他多说话。”

“那么，是不是可以到外地去休养一些日子，有些地方景色好，空气好，很安静。久居城市里的人到大自然去，看到眼前一片绿色，心胸会感到很舒服的。北京污染太厉害，从早到晚，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他不愿出去，哪里也不去。如果自己悄悄到外地，旅行住宿会有很多困难。如果接受人家接待，就会不胜应付，不得安静，外地有很多朋友邀请他去游览休养，他就是不愿动。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总算很知足了。”

杨先生的话使我想起十七、八年前，我刚从农村下放劳动三年回来，就

去羞辱。过了一些日子，果然又听说，两位老人在与此人发生冲突时，钱先生竟被打倒在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弃家出走，寄居在文学研究所的一间平房内，艰辛度日。大概过了一年多，才迁居到南沙沟宿舍。我想杨先生如今发此感慨，无意识中与这段生活不无联系，当然也与《干校六记》中所记叙的那种屈辱压抑生活有关。

二

这时钱先生从卧室里走出来接听了一个电话后，对我讥讽说：

“活跃分子来了！”

“我不活跃啊……”我有点委屈，抗辩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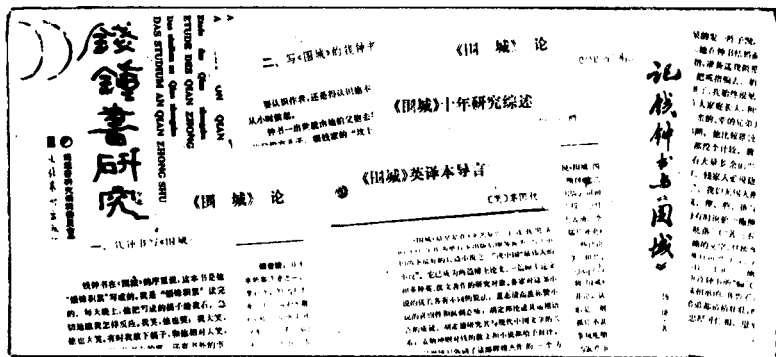
“他已经不在报馆工作了，不活跃了。”杨先生赶紧在旁帮我解释说。

“我知道。所以我要说他是活跃分子。现在这样，正是他活跃的结果。活而则跃嘛！”我因为很久没有看到钱先生，今日看他样子显得苍老了、瘦了；睿智的眼神中带着一种严厉的意味。

想介入世事。他劝导我的话恰恰正是他自己因《宋诗选注》等著作受批判后不久，仍然这样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告诫后辈，这是我一直铭记在心的事情。但是，许多年来，我在报刊编辑工作岗位上往往身不由己地在文海浮沉，虽然也多有挣扎，力求清白做人，但于学术研究方面，成效甚微。这就是钱先生每次见到我时常要加以讥讽的原因。

三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正是“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抄家、打人、批斗的恐怖气氛弥漫在日常生活里。有一天，我因事进城，到了中午就随意进入一家饭馆吃饭。那时所有大饭馆都被视作资产阶级享乐的罪恶渊藪，所以一律改为工农兵食堂，里面供应二、三种大锅菜。顾客排队买菜，自取碗筷，桌上则杯盘狼籍，无人侍应。我进入的那家原是王府大街的萃华楼饭馆，现在门口也改挂着工农食堂的招牌。到了里面，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意外地



发现钱先生和杨先生也夹杂在队伍里，真使我惊喜交集。我看见他们颤巍巍地端着饭菜到桌上，然后又装到自己带来的饭盒里。我走近去叫了一声“钱先生，杨先生”。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熟人，吃惊地抬起头来，看到我才勉强一笑。说家里帮佣的阿姨也被打发走了。因为当时这也被看作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被禁止的。于是只好每天到外面食堂买点饭菜回家去吃上两顿。尽管钱先生还是那一副机智幽默的样子，杨先生仍还保持着温柔的笑容，但我从他们的脸上感到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惶。我想，他们的日子一定过得很艰难。那时，恐怖的灾难随时会落到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头上。但是两位先生却说“还好，还好。”

还有一次，是在听说钱先生被造反派打入“专政队”罚作苦役劳动后，我非常非常想念他。我当时也被贴大字报。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处境也很恶劣。但是与造反派中个别青年朋友平时很友好，于是就和他合谋，用了一封介绍信，借口调查一个人的历史，去到钱先生所在单位。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问明来意，把钱先生叫来后，就出屋去了。

“钱先生……”我恭恭敬敬叫了一声，请他坐下。我看见他穿着一件圆领汗衫，短裤，两手还有些污泥，显然是从劳动的地方直接叫来的，心里很难过。

“钱先生，你还好吗？劳动重吗？”

“还好，劳动不算重。”这次，钱先生真的十分安详平静。他的身体好像也还健康。我想，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旦被揪出来，也许反倒“踏实”了。这比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时时有落下来的威胁反倒省心一点。

那天，所谓的调查不过随便问了

几句而已。我总算看到钱先生，心里安慰了许多。

四

时光荏苒，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80高龄的老人了。杨先生比钱先生年轻一岁。他们相濡以沫，在这间幽静的书斋里各自研究学问、写作。钱先生的书桌左侧靠窗，杨先生的书桌则面窗，两桌相距半步，成犄角之势。这样，钱先生时时可以看见杨先生，杨先生则须顾盼之间见到钱先生，自他们迁入此屋十多年，这样的“布阵”从未变动过。钱先生在此继续写作《管锥篇》，杨先生在此译完《堂·吉珂德》，又写作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回忆散文集和长篇小说《洗澡》等。《堂·吉珂德》出版后，曾被誉为一文学翻译的典范和精品，即使这样，杨先生这次却对我说：“现在有些情况还是很好的，翻译界敢对一些权威碰碰。傅雷的翻译是很受推崇的，过去从没有人怀疑有什么不妥当。最近有人认为傅译对原著的词语理解、译文的表达方面都有一些可商榷的地方。对闻家驷新译的《红与黑》也有批评，认为只能算是对罗玉君旧译本的校改，有的地方还不如旧译本。以后也许也会对我的译文提出批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学术空气，我们翻译文学作品，语文知识修养再高，也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缺点，所以需要大家互相匡正。过去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在文学作品翻译之后，有一道校核的关口。我和校核的人总是合作得很好的。我很欢迎别人提出的质疑和建议，可以引起我进一步研讨思考，用更确切的词语或句子来表达。”

至于《管锥篇》，出版以来，饮誉海内外，已为大家所熟知。我自己阅读，都会为钱先生超凡神奇的记忆和感悟能力所惊服。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这样一位学问博大精深的大学者竟然不藏书，更不藏书。他的书房里只有有限的几个书柜。许多年前，我看见书房中新添了两个书柜。钱先生却说：“都是别人送我的书，没有办法。”二十多年前，我看见他常用布书包装着许多线装书，从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借回来看。他研读的书几乎都是靠借阅的，但读得比谁都多，读完就都贮存在脑中。这与有些人书房里琳瑯满目，喜藏书而不读书，读一点过目即忘完全是两回事。

说到钱先生博学强记。我又想起去年在北大的一次聚会。席间听吴组缃先生讲的两则有关钱先生的轶事。吴先生与钱先生、曹禺都是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同班同学。有一次吴先生和曹禺想看英文“淫书”，知道钱先生读书多，就商量着请他介绍推荐三种。哪晓得钱先生竟一口气开列了四十多种书名，使吴、曹两位为之咋舌。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听著名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讲课，原拟讲三题，但讲完一题，钱先生就提出其中若干讹误，使赵先生大为折服，下次就请钱先生上台讲，赵先生坐在台下听。

吴先生有板有眼，讲得那么生动，满座为之叹服。

现在国内已有一批专门研究钱先生的学者，人数也许还不算太多，但却日见兴旺而扎实。日前还看到有一部专著《钱钟书》，是美国胡志德（原名“西奥多尔·赫特斯”）所著。这是中西文字中专门系统研究钱先生学术与创作的第一部专著。看来，钱学之博大深奥虽为人称道已久，但得到阐释和认识都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我想起钱先生在一篇讲述诗画关系的论文中曾经引述“说得出，画不就”，或“画也画得就，只不像诗”的话。那么，许多研究钱学的文章其实往往也有这个特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论固然有迹可循，但他那种罕有的精灵般的艺术悟性、艺术感觉、艺术体验却是别人只能感受意念而难以言喻的了。

京华初夏访沈醉

· 刘峰 ·



沈醉近照

还是那么爽朗，还是那么健谈，握起手来还是那么有力，使你难以相信，站在面前的是位79岁高龄的老人。

“沈老伯，你身体还是那么硬朗。”

“是呀，海外一些老朋友见到我时总问，你在共产党领导下受压抑，怎么精神还这么好？我总是回答他们，我79岁了，背不驼、腰不弯，象受压抑的样吗？”

每天准9时入寝，早5点起床，散步、洗冷水浴，不抽烟、不喝酒（用沈老的话说：“我的名字已经醉了，哪还容得滴酒！”）除了垂钓无其他嗜好。这就是日常的沈醉。

牢记周公教诲 力行对民益事

话题从沈醉与江泽民总书记一张照片引起。在1991年元旦茶话会上，江泽民见到沈醉，很客气地说：“你写的书我看过，写得很好，最近还在写什么书吗？”沈醉说了他目前的写作情况，江总书记表示希望看到他最新出版的书。在春节团拜会上，沈醉再次见到江泽民，江总书记说：“你寄给我的

书，我已看过了，谢谢你，你有什么困难吗？”后一句话江泽民连问两次。显然，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原国民党军统特务谈笑风生的图面，本身就很有价值。

“我这后半辈子没有别的宏愿，就是要写10本书。目前已出版6本。我本是一介武夫，不是文人。但我牢记当年周公对我说过的话：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沈醉拿出当年与周恩来总理的合影，陷入深情的回忆：

1960年沈醉被特赦。在特赦后第一个春节的初七，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在中南海西华厅接见了这一批特赦人员。在周总理跟沈醉谈话时，他诚恳地向周公请罪，因为当年周恩来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时，他曾亲自带领特务或指使特务跟踪、监视。周恩来听了，爽朗地笑起来：“你们当时给我当了义务随从，没有起作用嘛。”他特别讲到他住在上海新亚酒店，每天都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会面，但从没有被发现，原来周恩来经常利用看电影的机会在黑暗的电影院约见要见的人。谈到今后的时候，周恩来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希望

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对周恩来的前一段话我是深有体会的，但对后一段话我有点茫然。我对人民是有罪的，不做坏事就不错了，还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吗？我把自己的疑虑告诉总理，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能把这些内幕和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如实地写出来，对后人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沈老伯，原来你写书还和当年周公这一段教诲有着直接关系呀。”

“是呀，就是从这次谈话之后，我牢记周公之训，笔耕不止，把这当成为人民、为人类做些好事的最基本表现，也算不负周公恩来的一番苦心……”沈醉感慨地说。

沈老写的《我这三十年》、《戴笠其人》、《军统内幕》、《魔窟生涯》、《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日记》已陆续在大陆、台湾和香港出版，引起轰动，有的还改编成电视剧演出。目前沈醉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写作，以完成其有生之年写成10本书的意愿。

廣施仁愛
普濟災危
解困賑饑
惠澤人類

一九九一年元旦茶話會
沈醉書



一九九一年元旦团拜会上，江泽民总书记与沈醉亲切交谈



任国民党少将时的沈醉

在战犯改造所里的沈醉

沈醉已完成的书确实做到了真实、不怕丑，凡读过者无不获益匪浅，连素有“天下第一傲”之称的台湾作家李敖都叹服曰：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历劫知变，洗面革心，沈醉醒矣！

回忆“少帅”往事 祈盼早日统一

谈兴正浓，李大维打来电话。因笔者与大维亦是朋友，话题又转到张学良身上。

李大维的父亲曾担任过军统训练班的武术教练，是沈醉的老部属。张学良去台后，大维的父亲曾负责对他的“监管”。从“西安事变”后张将军失去自由，已有大半个世纪。前不久，张将军公开露面出游美国，引起世人关注。

“从1943年到1946年，我先后见过张将军十几面。‘少帅’确实是个很讲义气，很有人情味和爱国的人哪……”谈起往事，沈醉感慨万分。“那时他被软禁在贵州桐梓县一家兵工厂后面。附近有个水塘，我喜欢钓鱼，张将军也喜欢垂钓，每次我们见面都一起

钓上半天。有一次我钓了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鱼，还是张将军帮忙拉上来的！”

“沈老伯，有一则张学良给蒋介石送表，蒋介石还赠张学良鱼杆的轶闻，是否确有其事？”我趁机问道。

“这事你真问对地方了。”沈醉爽朗地笑了。“张将军确实送给蒋先生一块表。那是他在欧洲买的一块欧米茄名表，四周镶着钻石。听说这个表厂为庆祝厂庆只生产了100块，专赠卖世界名人做纪念的。张将军送蒋的这块表停在10点钟，意即他已被关了十年了。蒋先生对西安事变始终耿耿于怀，所以接到这块表后拉开抽屉放进去关上。意思是继续关下去……至于钓杆，据我所知蒋介石没有送过，到是我曾叫人在美国买过一套高级钓杆送给他。”

“张将军后来信奉基督教，淡泊明志，他的人品是极高的。我写的一些书在台湾出版，张将军对书中写的我们之间的交往等事给予认可，带过话来表示，是那么回事。”

“少帅”老矣！我们谈到日本电视台采访张学良的事，沈醉十分感慨。“那时张将军风华正茂，仪表堂堂，现在我们都是白发老人了……”我心底也觉潮涌：一个人因政治原因，因爱国而被强行剥夺为民族、为社会服务的权利，这太不人道了。

“不过张将军的风采仍不减当年。从电视画面看，他头脑清晰，仁爱之心与祈望和平之愿更浓重真诚。我真希望他能来大陆看看，如他回来，我一定去机场欢迎他，并希望再与他共享垂钓之乐……”

我们又谈到了祖国统一的事情。沈醉说：“从个人家庭到民族国家，都应该早日实现和平统一。我母亲在台湾活到98岁去世，临终前还嘱家人打开大门，说‘老三要回来的’……”

与“华子良”化敌为友 为“七烈士”鸣冤雪耻

沈醉和“华子良”的友谊一直传为佳话。当年“华子良”的原型——贵州省委顾问韩子栋同志看了《我这三十年》后，与《红岩》里“严醉”的原型——沈醉化敌为友，于1984年10月在民

歌手郭兰英家中共同写下了：“历尽劫波兄弟在”（沈书），“相逢一笑泯恩仇”（韩写）。

沈醉说：“我和韩子栋是很要好的朋友，一直来往密切。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硬要把韩子栋打成叛徒、特务，让我作证他的逃跑是我写条子放的，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当然不能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知道，沈醉先生在文革中“二进宫”，因为不“揭发”、“交代”一些真正革命者，身心受到很大摧残。

“共产党的政策使我重新成为一个‘人’，要做真正的人就要堂堂正正，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那套倒行逆施不仅破坏了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而且是极不人道的。韩子栋这人是个坚贞的共产党员，而且极重情感……”沈醉由此讲到了近些年轰动一时的张露萍、张蔚林七烈士的情况。

张蔚林等人打入军统无线电总台，戴笠遭到蒋介石的痛骂，差点被撤职查办。这七位烈士被军统枪决后，忠骨埋在一处。解放后，许多先烈被迫追认，但这七人始终未被追认，甚至被当成“军统特务”。沈醉在他的书中和他写的材料中，对这七烈士做了肯定，但长时间得不到理解。不仅国民党方面老朋友说他不应该揭军统这个疮疤，共产党里也有人劝他不要捅这个事。

“我认为应该尊重历史，这七烈士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死了还要蒙受不白之冤，这太无情了！所以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我进入政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时，我第一次提的议案就是要求为张蔚林等七烈士昭雪……后来叶帅亲自做证，此事才得以解决。如今，七烈士的遗骨重新得到安置并立了碑，他们的事迹被写成文章、拍成电视……”

“一个人可以不 做官，但要做人”

我向沈醉通报了我调到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情况。

“好啊，红十字是不分国籍、不分阶级，专讲人道主义的。在战争年代，人们一看到红十字就会感到安慰。抗日战争时，一场仗打下来，红十字会员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是伤

病员都抢救,这就是人道主义。那时宋氏三姐妹对红十字工作都很热心,在重庆有一所实验救济院就是宋美龄创建的。

沈醉前后几十年的经历中,人道与非人道、光明与黑暗体现极为明显,便直言不讳地与他探讨起这个问题来。

沈醉说:“人和人的关系不同于动物,人类要有一定的交往标准,要讲互助仁爱。我母亲给我的遗训就是‘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我在国民党军统28岁官至少将,今天是无党无派,可我却时时感到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他给我讲了前不久的一段事。沈醉在美国的女儿回来看他,一跨进门看他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沈醉住一套三居室高楼公寓),长跪不起,痛哭失声,说是如果他不答应和她一起回美国就不起来。沈醉扶起女儿对她说:“你在美国已是富婆,有花园洋房和不少财富,可是你老爸不愿去当富公。你记得小时候和我一起坐汽车出去的事吧?有些人见我们车来就脱帽鞠躬,车子一过就吐口水。当时你问我这是为什么?我说是他们不把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人;现在呢,老百姓和共产党把我当成一个人,一个自己人……”沈醉带着女儿在大陆转了一些地方,看到人们那样尊敬自己的父亲,她慢慢理解了父亲。有一次在杭州吃饭,所收饭费很低,招待人员说“因为你们是自己人”,她心悦诚服地,对沈醉说:“爸爸,一万元也买不来一个‘自己人’呀!”

“我儿子在台湾,他原在海军服役,退役后在菲律宾买了一个小岛经营海产品养殖,回大陆后也非要接我出去颐养天年。我对他说,你要真孝敬我,就回来投资,为国效劳。”现在沈醉的儿子已在北京四季青建起了合资厂。

“有事身方健,无求品自高”,这是沈醉书房中一幅自题座右铭。这些年来,沈老笔耕之余,也常常以书法和气功调节,加上他早年武功底子和长期的锻炼,在这两方面颇有造诣。他还是少林寺武僧团的高级顾问和气功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沈醉先生欣然为我们题下了“广施仁爱,普济灾危,解困赈饥,惠泽人类”16个苍劲有力的欧体大字。

本·刊·稿·约

本刊用稿总体要求强调: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既不自命高雅,又不迎合低俗,更不冷面说教。征稿内容及主要栏目如下:

“古今谈”及“访谈录”: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等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的探讨、议论及有关名人、专家的谈话、专访。

“英杰谱”及“殒星篇”:颂扬记述我国历代特别是现代杰出人物和英雄烈士的功勋业绩、品德风范与艰苦历程。

“春秋笔”及“古镜台”: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寻踪追述,力求真实、具体,有新的史实发现。

“赤子心”及“同根结”:反映海外华人华侨与台、港、澳同胞的生活情怀与人物、事件。

“时代风”和“人海浪”:当代新人新事和凡人轶事,知名人物和普遍群众均可,写他们的闪光一页及其喜怒哀乐。

“争鸣录”和“群言堂”:关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议论、讨论和争论,对某些事件、人物和观点、作品的评价、批评与反驳。

“神州光”和“九州景”:古今各地的文化创造、建设成果、文物古迹、革命遗址、奇景风貌等的生动描述。

“他山石”和“天下事”:国际人物及事件与文化信息的及时介绍。

“文荟园”与“多味豆”:专题性的文摘与补白性的格言、语丝、幽默及小资料、小掌故等等。

视需要加“本刊特稿”和“编读往来”专栏。但如有佳作可不受此限,热点力作可另设新栏。

作品内容文责自负,但要求言之有理、有据和有文采,有不同见解,可以争论及批评、反批评,但要求实事求是、与人为善。

作品形式主要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传记故事、回忆录、专访、散文、杂文、短论及本刊内容有关的诗歌、说唱、摄影及美术作品等。

作品篇幅力求精练短小,但重要作品不限。

一般稿件及复写、复印、打印和印刷品稿,恕不退还。作品发表后即付稿酬。如三个月内无选用通知,可自行处理。请勿一稿两投。如蒙转载,请注明转自本刊并通知本刊,并按规定付酬。



一九九一年的胡开明



一九五九年十月，胡开明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到张家口任市委第一书记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开明去万全县参观

胡开



1979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安徽省工作时，与胡开明（右一）和安徽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等合影。

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张家口市饿殍月达一千余人。原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的市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实事求是，敢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彭德怀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了反，撤销了所谓「共产主义性质」的公共食堂，提倡和人民公社相对立的包产到组等等。为此，惹恼了中央领导，毛泽东主席点名批他是「胡」开明，使他沉冤蒙难十六年。但是，当地人民的心碑上却刻下了：历史作证，你是真开明。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为他彻底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也更加发扬光大。本文所写这一历史往事，虽然读来令人心碎，却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到蔚县常宁乡看望乡亲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开明



一九六二年夏，胡开明和葛启（右三）等同志合影

明并非“胡”开明

●晓凌 ●柳铮

牛尾巴到底长在什么地方？

1959年9月下旬的一天，河北省委派往张家口指导整风反右的工作组，急匆匆地搭上北去的列车。

打从上车起，工作组的两个头头，纪委书记裴仰山和常务副省长胡开明就很少说话。特别是胡开明，一反开朗、随和的性格，阴沉着脸，好像有什么心事。

确实，胡开明脑子里想起了不久前结束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然而，却采取了与以往会议不同的开法。首先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彭德怀元帅在庐山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让大家看。至于这封信是对是错，却没有讲。这似乎是一份考卷，在考河北执政的这几十名领导干部。

紧接着在省委一届八次全会上，印发了张家口市委书记《葛启右倾言论集》，组织与会人员对葛启进行批判斗争。16日，省委全会作出《关于葛启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指责葛启从今年一月开始，“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省委直到中央，进行了连续地、越来越猖狂地进攻。这种攻击延续到七月，葛启同志在《大海陀》公开发表文章和在市人

民代表会上的讲话，达到顶点。”

胡开明又取出葛启的这两篇文章。其实，这两篇文章他都看过了。此时，他又怀着沉重的心情读了下去，葛启在为理论刊物《大海陀》所撰写的署名评论《坚持社会主义，认真改进工作作风》中这样写道：“……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在谈到集体和自由问题，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日趋集体化，自由是越来越多，决不是越来越少。”

在市人代会上，葛启针对某些新闻记者一味猎奇，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新闻的恶劣倾向，辛辣地讽刺说：“他们认为，说牛尾巴长在屁股上没稀奇，非要说牛尾巴长在牛脑袋上才有新意。”没错！这是葛启写的，一句一段都体现了他敢说真话的精神。在葛启受批判的时候，省委就酝酿从省里选一个人出任张家口市委书记。胡开明作为省常务副省长，参与了 this 酝酿，而最后出乎人意料的是他自己提出要去接葛启的班。

看来胡开明是逆时针思维的，人们似乎都不理解他的这一举动。他和

林铁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居然说服了这位在河北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书记。

胡开明在张家口工作过多年，1945年8月我军第一次解放张家口，他就在《晋察冀日报》社任副社长。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解放，他担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政协副主席。1952年，曾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半年后，调任河北省委工作。这次他要求重返张家口，将是三进塞外山城了。从胡开明的潜意识来说，他认为，面对即将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市委班子出了“问题”，自己原是察哈尔的干部，对那里是人地两熟，自己去张家口实地主持这一地区的工作，全面调查研究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说得土一点，他要去看一看“牛尾巴到底长在什么地方！”

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已经伴随着自然界的寒风席卷着塞外的张家口地区。胡开明一到就在市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只过了几天，他就顶着寒风，来到了闻名全省的粮食高产“元帅县”——张北县。

张北县正在反右。他一下车就见到了两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胡开明一进县委宿舍，一眼看到了县委第一书记刘文达。他高兴地喊道：“老刘！”没有料到，刘文达竟然扭头就跑，一直进了里院的一间房子。

胡开明生气了。哪有这样的下级，他“咚咚咚”追过去，一推门，里边插着，他伸出两个拳头，擂起门扇来。

门开了，刘文达垂着头站在门边。

胡开明气冲冲地问道：“我是狼？是老虎？叫你不应，喊你就跑，搞什么名堂？”

刘文达抬起头看了看胡开明，哭丧着脸说道：“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话刚说完，就嚎啕大哭起来。

胡开明余怒未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得见人哪？你说说，你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我刚调来，情况也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些右倾错误。”

胡开明从刘文达屋里出来，又去

找张文光，也是他熟悉的一个老部下。正在县里主持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诉他，“张文光组织右倾反党集团，已被隔离审查。”

“你组织了右倾反党集团？”胡开明开门见山问张文光。

“是的。”

“有什么事实？”

“原来的县委领导订粮食生产计划平均亩产400斤，我说在坝上地区根本做不到，同时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后来刘文达来当第一书记，我又降低了他提出的指标。”

“就这些吗？”

“我们三个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

“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平均超不过一百斤。”

他又来到海流图公社，副书记是

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村干部。

“为什么把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开明问他。

“人家说我胆子小，不敢放卫星。”

胡开明突然袭击，看了几个“高产”社队。

镜头之一：

黄盖潭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人们一口汤，一口土豆。而胡开明手里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潭公社平均亩产410斤，创历史最高产量。

镜头之二：

大囫囵村，刚刚秋收一个月，生产队、大队的库房只剩下一个粮底子。社员家中几乎无存粮。而按上报的“卫星”，这里的粮食早已成十倍地超出了库房储存的能力。

镜头之三：

狼窝沟村一户社员，孩子饿得直哭，母亲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孩子嘴里，却挤不出一滴奶水。

难道这就是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获得表彰的典型县？

张北县地处内蒙高原南缘，古长城以北，平均海拔1500多公尺，丘陵起伏，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温度高寒，无霜期只有90天左右，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1949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55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粮食亩产平均达到100斤左右。

然而，在“大跃进”的风潮中，张北县的主要领导在左邻右舍放“卫星”的影响下，提出了“实现亩产400斤，争当粮食元帅县”的狂热口号。当时，许多人认为，张北气候寒冷，条件恶劣，这个指标达不到。但县委却发动全县展开了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大反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只要看看墙壁上的标语，就能看出反右倾的“成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土地”。

“天冷冷不住决心，地冻冻不住恒心”。

“苦干硬干拼命干，严冬寒春变夏天”。

为了实现“元帅县”，张北县和其它县一样，做了很多“左”得可笑的

一九六〇年胡开明（左三）陪同陈云同志视察鹿家堡铁矿。



事情。狗打死了，猫杀掉了，抓蛤蟆、捞蝌蚪、逮草鱼、捉毛毛虫，为的是煮肉汤追肥；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施在试验田、丰产田里；农民的菜缸、水缸都被收去当尿缸；衣柜、衣箱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

1959年10月，中央发出了召开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代表会议的通知后，张北县委总结上报：全县23万人民，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770斤。其实，这一年的粮食亩产只有110斤。翌年，张北县就闹粮荒了。然而，骑在马背上的“元帅”却下不了马。

像这种一方面大跃进、放卫星，一方面闹粮荒的怪现象又何止一个张北县，一个张家口地区。毛主席视察徐水县时，曾为徐水县亩产1132斤粮食吃不完发愁，而实际上，徐水人民第二年春天就开始吃糠咽菜了。山东给毛主席看了亩产4万斤的水稻田，亩产5000斤籽棉的棉花地；河南给毛主席看了亩产25000斤的玉米，亩产30000斤的烟叶。江苏给刘少奇委员长看了亩产10000斤的水稻，都受到了赞赏。真有点“一级骗一级，大家都骗毛主席”。张北县要是比起来，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呢。

这就是那个从上到下都“发高烧”的年代。

胡开明满腔的愤怒和焦虑。情况比他想象的严重的多。全区70%的社队缺粮，寒冬已到，很多社员还没有一件像样的御寒棉衣。“死宝变活财”，“砸锅炼铁”，搬空了人家中的什物。浮夸风，高指标，使国家征购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二百多万人民生活没有着落。

“牛尾巴安到牛头上才算新闻。”这句葛启的“反动语言”，此刻却那么强烈地震撼着胡开明的心。

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他阻止不了，这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全党、全国性的大运动。但是，他又不甘心这么无所作为。几经反复思考，他毅然拿起电话，要通了市委书记解峰。

胡开明先是平和地叙述他在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他告诫自己，“刚刚来，要小心！要谨慎！”不过，他毕竟没能控制住自己。当他说到很多敢于讲牛尾巴长在牛屁股上的同志正在被当成“右倾”受到批判时，他激动了：

“老解啊，下边的反右倾再不能搞了！这样搞，谁还敢说真话，难道真要说牛尾巴长在牛头上才好吗？我要在张北开个全区的电话会议，宣布反右倾刹车。你能支持我一下吗？”

解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就是省委派来的整风反右的工作组长吗？这就是即将上任的市委第一书记吗？虽然六年前他在这里工作过，然而，此时此刻听到胡开明的意见，解峰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有这样的第一书记，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同意和支持胡开明的意见和作法。

电话会议开始了，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话。一大批干部被解救了。

一场“急风暴雨”的“反右”斗争，一下子就被胡开明化成了“小雨”。

我欣赏的就是 你能讲真话

1959年12月11日，中央正式批复，胡开明任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突然觉得自己身上压着一副从来没有这么沉重的担子。

从第二书记刘一鸣（胡来前，曾代理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兼专员解峰；工业书记王云、城市公社书记张何明到一些县委和公社书记，胡开明逐个促膝谈心。作为第一书记，他不仅需要了解真情，而且需要志同道合的同事和下属。

胡开明找到了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于力耕，这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可是在批葛反右的风浪中，他变得小心谨慎，生怕由批葛而“殃及池鱼”，因为葛启的那些“右倾”言论很多都是出自他的调查汇报。

人哪，怕有辫子呀！

于力耕打定主意，再也不能说那种大实话了。尤其是在第一书记面前，必须得拔拔高调。

胡开明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先说话了。

“我找你谈话，是想和你谈心里话、真心话。”说到这里，胡开明笑了。“老于，说实在话，对葛启我早就反不下去了，因为他说的这些话都对。我虽然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但我也受

開明不開明事實有証明
如來袖先見早富二十年
据實進諫者永遠受敬仰

開明同志留念

陳進誅書有感

一九八四年八月文達

中国科协王文达读胡开明给主席上书后题赠

批葛的影响。这就是我的心理话，你瞧，我向你全倒出来了。你呢？能给我说真心话吗？”

一席话说得于力耕热泪盈眶，他激动得连连点头。

“能！能！我向您说心里话、说真心话！”

于力耕像见到亲人一样，毫不顾忌地向第一书记掏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葛启他说的句句是实话。……‘五风’刮光了社员的家产，有的社员家中只剩下一铺一盖、一碗一筷了……”。

从下午说到傍晚，从晚饭后又谈到半夜，于力耕详细介绍了全市农村的真实情况。

胡开明上坝找到了张文光：“我想听听你的高见。”“我说的都是右倾言论。”

“那好啊，我跑90里上坝，就是

为了听你的右倾言论。”

张文光抬起头，看着胡开明真诚而又恳切的神情，下决心说：“开明同志，大跃进再也不能继续搞了。今年秋收前，张北全县 234112 人，就有 213965 人缺粮，占农业人口的 93%，缺粮数达 2889 万斤。明年的形势比今年严峻得多。可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同志头脑发昏，还在叫嚷‘形势大好’，还在那里反‘右倾保守’，这样下去，明年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啊！”

胡开明凝神沉思着，张文光又叹了一口气。他脑子里在激烈地斗争、打架，他既希望老领导能力挽狂澜，纠正“左”的错误，又担心老领导落得葛启一样的下场。想来想去，他说的话自相矛盾起来。

“我是犯了右倾错误的人，您上次来张北宣布全区反右倾刹车，使我少受了很多批判。但在目前，我的右倾帽子是摘不掉的，您也不必为我费心。我刚才说的尽是和大好形势唱反调的泄气话，谁处在您的位置上，也不会欣赏这些右倾言论的。”说着，他痛苦地低下了头。

“张文光，你这几句话说错了，我欣赏的就是你能讲真话！”胡开明激动了，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当他走到张文光身边，突然一把抓下他头上戴的帽子，仔细端详着这顶普通的棉帽，缓缓地但却十分庄重地说：“张文光同志，帽子能戴上去，就一定能摘下来，况且是顶不合适、不公正的帽子。你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我们地委，振奋精神，准备继续为党工作。”

胡开明像一台运转不停的机器，从坝下平川到坝上草原，从海陀山到小五台，他到处调查研究。有时，他先实地察看，与群众交谈，再听当地领导汇报；有时他先听汇报，再去实地和群众验证，看这些领导汇报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既是在考察干部，又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寻求正确的方针政策。

他感到自慰，因为他看到，尽管处在“整风反右”的形势下，但是，仍有不少干部敢于抵制和批判“左”的错误，向他敞开心扉。

他想起了张文光的谈话，决不能让讲真话的干部坐冷板凳。在常委会上，他郑重提出了给张文光、刘文达、

白玉等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定为犯了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及安排工作的问题。

他说：“对这些干部的情况，大家比我更了解，更熟悉。我个人认为，这些同志说过这样那样不合时宜的话，但是，给他们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是搞错了、搞过了。我们党历来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搞错了，就一定要纠正。这不仅是解脱几个负责干部的问题，还在于使广大干部都能说真话，说心里话，恢复党内民主作风。否则，敢说真话的人都戴上了帽子，那以后我们还怎么能听到真实的情况呢？我建议，该平反的平反，该工作的工作，不要再让这些同志背着包袱了。”

会场沉默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安排工作！中央没这个精神，省里也没这个指示，市委能这么干吗？大家都在掂量着这件事的份量。

这也难怪，多少年了，大家习惯于听上边的，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办，而对于自己的思维器官倒很少考虑怎么用。现在，中央和省里没有平反的指示，无论是上边来的红头文件，还是人民日报、河北日报，核桃大的标题都是“反右倾鼓干劲。再创新跃进。”给右倾分子平反，显然是要担风险。

一阵沉默，书记处书记张何明首先发言了。

“我也做了些调查，开明同志说的很对，我们不能再让说真话的同志受委屈了，我同意给他们平反，安排工作。”

在常委中，何明同志资历很老，又素来以“好脾气”著称。他对同志的热情关怀和真诚，他处理事情的公道、正派和廉洁，使他在干部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又是一个硬骨头，省委通过对葛启的处理决定，别人都举了手，唯独他不举手、不表态，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张何明同志支持第一书记的意见。胡开明不由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

书记处书记解峰说话了：

“我完全同意开明、何明同志的意见。但在方法上，我建议分成两步：第一步，首先分配工作；第二步，分期分批地甄别平反。这样可能更稳妥一些。”

书记处书记王云也表态了：

“解峰同志的意见很好，工作可以先安排，平反可以分批……”。

虽然有同志一再提醒，这会不会右了，但还是以多数通过了决议。

我现在主要是管吃饭

民以食为天。这一年的冬天，食不果腹的人们在严寒中挣扎着。

胡开明一天要接十几个来自各县的电话，而内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要粮食。饥饿，像一头恐怖的恶魔，威胁着每一个人。

造成大饥饿的原因很多，首先是高指标，虚报浮夸。1959年，全国粮食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才560斤。但是，中央在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1959年的经济计划，粮食要求达到8000—10000亿斤。（直到现在，我国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10000亿斤的指标。）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鼓动下，各级又层层加码。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谁也怕当彭德怀第二，结果，汇总到国务院的数字不仅达到了这个“天方夜谭”式的计划，而且还超过了它。这真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由高指标和虚报浮夸而来的，就是高征购。实际上，很多地方连种子粮和饲料粮都交了，更不要说基本口粮了，岂有不饥饿之理？中央又接连发出指示，强调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全国到处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一平二调，大吃二喝。在农民还饿肚子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粮食过早、过多地转化为工业原料。

从1959年到1961年，老天爷也不帮忙，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张家口是风灾、旱灾、雹灾、病虫害四灾齐全。遭灾人口占总人口数的54.11%。再富庶的社也经不起这连续的折腾呀。

天灾人祸，雪上加霜。

1960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认为：所谓困难无非是女人的头发夹子少了一点，肥皂少了一点，这是小插曲。并说，经过反右倾以后，现在的情况是国内形势极好。于是会议决定1960年

继续“跃进”。这一年的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的社论,再次掀起反右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的热潮。

直到12月的北京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才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头等重要的就是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到了这时,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和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已经使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0年的粮食产量没有公布,这一年的实际粮食产量大约是2870亿斤,比上一年少530亿斤。在600000000这样巨大的分母面前,这就是饥饿为什么连续三年在中国大地徘徊的原因。

全国大饥饿,张家口呢?胡开明来到蔚县西合营,这里的人饿到了什么程度呢?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籽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对于饥饿难忍大大超过了对毒药的恐惧,种籽被照样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先在土里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仅此而已。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大增加,个别村庄活着的甚至没有力气把死人从屋里抬出去。

196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宣化市委书记卢起打电话来报告,由于饥饿许多哮喘病人往往在黎明前死去。他要粮食,还要治哮喘病的大烟土。据说只要将大烟土和一点儿食物一起服下去,就能治疗或减轻哮喘。

大烟土,这个已经绝迹十多年的祸害,要把它从公安处的仓库放出来,就好比渔夫从宝瓶中放出魔鬼,虽然说是作为治疗哮喘病的特效药。然而,谁又能保证不会出现吸食大烟的丑恶现象呢?

这真是一个难题。

胡开明把解峰和公安处长孙凯找来,试探地问:

“如果由我来负责任,能给哮喘病多发区发放一点大烟土当做药吗?”

“我和开明同志负责!”解峰加了一句。

孙凯感动得连连点头:

“行,行,我马上回去安排发放。”

4年以后,这件事就被说成是“发放大烟毒害人民”。当时,正在上映《林则徐》,于是胡开明的名字与电影中那位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和主张弛禁鸦片的投降派穆彰阿、许乃济相提并论。

发放大烟土一项措施,缓解救活了宣化多少群众,是难以计算的。当时,用过大烟土活过来的人,每当谈起此事,都噙着眼泪说:“是大烟土救了我们的命啊!”

1960年,在风雪交加、饥饿交迫的时候,省委主管农业和生活的负责同志却作出日吃4两口粮的新规定。张家口这样的寒冬怎么过?随后,省委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朴实无华,简明易懂的口号。但是,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增产,人是不是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抵御饥饿?这恐怕至今仍是科学家有待研究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于是,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种种的“增量法”应运而生。

1960年11月9日,胡开明主持召开县(区)委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省委会议精神,集中讨论了生活问题,进一步强调了“低指标、瓜菜代”的政策。

12月4日是星期天,市委书记王云、市长刘谦和全市四万多名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城市居民,利用公休奔赴山川,采集各种野生杂物。在领导的亲自带动下,不到十天,仅张家口市区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采集代食品的活动。山坡上长的,平川里埋的,水底下游的,全部采集了回来,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而全市的代食品原料已达到2亿3千多万斤。其中的主要品种有玉米棒子芯、高粱穗、土豆藤、萝卜缨、榆树叶等,26400多台加工机械昼夜运转,粉碎这些原料。

代食品在缓解粮食紧张状况方面起了一些作用。然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田间夫人回忆,当年的窝窝头用火柴一点,即可燃烧。吃这样的代食品病号日渐增加,最常见的是肠梗阻,有的人死于低血糖休克。

严重的困难威胁着人民健康,也考验着每一个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真伪”。不过,这个4两却不是可以任意

逾越的,省委负责同志指出,吃4两者为马列主义,超过4两者为非马列主义。上级领导把真假马列主义的标准定在4两上。

胡开明直奔省委,亲自找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4两粮食怎么活下去?”

“全省都是吃4两,又不光是你张家口!”

“张家口是塞外高原,气候严寒,代食品也极少,不增加粮食,老百姓能过下去吗!”

看到胡开明激动的神情,省委主要领导似乎也感动了:“老胡呀,我也想增加指标,可是没有粮食呀。”

胡开明针锋相对:“不是没有,指标就在你们手里,关键是敢不敢负责!”

胡开明讲的是实话,省委确实掌握着一批机动粮。但是,却没有人敢于向下负责,把它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然而,与省里某些领导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张家口地区蔚县的一个公社,却出了一个秘密放粮的公社书记——他叫武万升。

在省委提出吃4两标准以后,蔚县县委书记赵建国与省委驻蔚县工作组共同研究,为了模范执行上级指示,做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再压低一两,规定日吃3两粮食。把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量。即使这3两粮食,也是由公共食堂统一管理。1961年1月,蔚县死亡人口猛增到1.0%。

武万升所在的东城公社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夜盲症。武万升带着公社干部深入各家各户了解生活情况,查看病情。每到一户,人们都拉着他的手,流着热泪说:“你什么时候再来呀?咱们再见面一面吧。”听到这样的话,好似一把刀子扎在武万升心头。他陷入迷惑不解之中。难道饿死人也符合马列主义吗?看着群众饿死不采取措施,连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乌纱帽可以不要,党籍也可以开除,但人不能不救!

武万升冒着对抗上级指示,冒着戴上“非马列主义”者帽子的危险,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做出了秘密放粮的决定:

“第一,从公社掌握的储备粮中给全社每个人分10斤粮食,增产队可以

分15斤，这些粮食不交食堂，由社员拿回自己家食用。预计全社要放粮40万斤。

第二，从入库粮食中拨出白面和玉米面5000斤与中药材合成制成消肿点心，分配给病人食用。

第三，国家干部带头，每人捐献一个月的工资和一身衣物，救济严重困难户和病人。”

在会上，武万升将自己临开会前刚领的88元工资全捐献了。

1960年冬，胡开明又一次电话找到省委主要领导，他详细汇报了张家口市广大农村的饥荒，提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弱牲口度荒，请省领导开绿灯。

胡开明的请求使省里那位主要领导又一次陷入为难之中。

谁料就在这时，毛泽东同志来天津视察，于是那位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毛主席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

毛主席几乎没有思索，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

一道指示传下来，杀了一批老弱牲畜，救活了多少人却很难统计。

胡开明仍在不断向省委汇报张家口的真实情况，每天早上，他第一件事就是向主管生活的副秘书长询问死人情况。并交代副秘书长，实实在在把饿死人的情况汇报上去。

终于有一天，办公室的同志怯生生的请示胡开明，“饿死人数字是不是可以不报或尽可能少报一点？”

“为什么？”

原来，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告，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人的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这真所谓“报喜则喜，报忧则忧”啊！

胡开明半晌没说话，直到办公室同志再次请求是否据实汇报时，他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漏掉，是怎么回事就怎么汇报，大家都说假话，报喜不报忧，中央怎么能知道下边的真实情况呢？我们宁肯要说真话得来的批评，也不要说假话捞来的表扬。”

1961年1月，宣化市非正常死亡已达1891人，省委终于通过了给张家口地区提高二两粮食定量，全省也都

改为每天6两。而张家口付出的代价，是胡开明和卢起等一些负责干部受到了批判。

口粮提高到6两以后，胡开明仍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到了解决280万人民的吃饭上，他大声疾呼要解散食堂；允许多开一些小片荒；尽量多种一些夏收作物，以解决明年的春荒问题。

既然群众不拥护，还办它干什么？

胡开明的眼睛盯住了食堂。公共食堂是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建立的。这一年的1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样兴奋地宣布：“公社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创办了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这就是使得几千年来束缚在锅灶旁边的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而笑逐颜开；很多公社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行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广大的男女农民开始领到自己的工资，而过去经常愁吃愁喝、愁柴米油盐酱醋菜的家庭，从此可以‘吃饭不要钱’，也就是说，得到了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

全国大办食堂，张家口也不例外。共建公共食堂16000多个，有85%的农业人口入伙……

1959年，在严重挫折面前，葛启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顺应民心，再次强调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办食堂，结果大部分公共食堂解散了。其他省市也出现了食堂解体的现象。庐山会议后，全党大反右倾，中央提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把巩固公共食堂提到维护三面红旗的高度。

1960年2月26日，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央批语是“发给各地参考，希望各地也认真抓紧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文件上又做了新的批示。要求各省“一律仿照执行”贵州经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同志批示以后，中央公布了各省市公共食堂情况：

截止1959年年底止，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

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口数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97.8%)湖南(97.6%)……七个省市。

70~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87.4%)……河北(74%)……七个省市。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68.2%)……六个省区。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47.7%)……内蒙(16%)等省区。

在整个公布了当时28个省市区的情况后，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一文件结尾加了一句话：

“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一目了然。”表扬的是谁？批评的是谁？确实是一目了然。难道仅仅是统计吗？透过这些数字，不是说明了各地领导人的素质、领导人的干劲、领导人的政绩、领导人的能力吗？这对各级领导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谁不想使中央得到一个好的印象，而偏要受批评呢？

胡开明倒也不是爱听批评。但是，相比之下，他更害怕那种违背民意、招致天怒人怨的表扬。

省委工作组在涿鹿县西二堡搞调查，总结出公共食堂的十大优越性，什么解放了妇女，节省了粮食等。还引证了社员群众对公共食堂的赞扬话，说的有鼻子有眼。

胡开明给涿鹿县委书记王洁波打了电话，他问：

“省委工作组在你们西二堡搞的材料你看过了吗？”

“看到了。”“你怎么看？”“我……”王洁波支支吾吾。

“不要求你现在下结论。请你马上组织几个敢说真话、实事求是的同志，不带任何偏见和框框到城关再搞一次调查，要分头和社员们谈话，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如实给我报来！”

王洁波接受了这个任务，一星期以后，一份详尽的报告送到胡开明的桌上。

报告上说：西二堡的公共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倒是存在着十个缺点。

胡开明还要亲眼看看公共食堂的情况。他驱车来到坝上，单等吃饭的

时候挨个看各个食堂的伙食。

顶着“白毛风”他来到康保县的一个村。食堂设在一座破庙里，百十个社员蹲在背风的角落里，就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和冷风，吃着糠菜饼子。

他来到狼窝沟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从公共食堂提出来半罐子糠菜糊糊，吃力地往坡那边爬去，秘书追上去问，孩子说：“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

“你家里能做饭吗？”

“不能做，粮食都在食堂里，锅给砸了炼钢铁了。”

听了秘书的回话，胡开明久久没有说话，直到目送那个提着瓦罐的孩子一步一步翻过山梁，消失在坡那边，他才眼睛红红的上了车。

几个月时间，他亲自调查了几十个公共食堂，从食堂的组织、食堂的管理，到食堂的帐目做了全面的了解。他亲自和数百名干部、社员做了交谈，掏出了群众的心里话。

无须再调查了，很明显，生活方式的改变一定要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基础。人为的、强制的、办公共食堂，不符合群众的意愿，只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严重遭灾，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坚持大食堂、大锅饭，将进一步加剧粮食紧张的状况，造成更大的灾难。可是，在巩固扩大公共食堂与解散压缩公共食堂之间，胡开明实在找不出一条可以使二者统一的新路。

在省委常委会上，他有选择地汇报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在不涉及全国、全省大办公共食堂的前提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请省领导考虑，是否可以停办公共食堂？

对于胡开明的发言，省委领导反应十分迅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因此，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办、解散。”省领导还提出办好食堂的十四字诀：

“共产党员进食堂，支部书记来掌勺”。

胡开明找了王洁波，鼓励王洁波在省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把涿鹿县西二堡公共食堂的十条缺点说出来，以引起领导的重视。

后来王洁波如实在会议上讲了。会议简报将王洁波的发言摘要登了出来，不过换了两个字，把十大“缺

点”换成了十大“罪状”，把王洁波个人发言改成了“张家口地区认为”。这样一来，张家口就有攻击人民公社之嫌了。看来请求省委马上下令解散食堂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市委第一书记，向上级如实汇报了情况，反映了意见，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胡开明没有入俗，而是抱着对群众生活负责的态度，采取了中央和省委不解散公共食堂，我自己来纠正。他什么后果都不顾，无非是摘掉乌纱帽，和葛启一块去锻炼改造。

胡开明选中了郊区的永丰堡村公共食堂，这是张家口的三大红旗之首，是全省挂上号的典型。它的兴衰对其他食堂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全村的人都集中在永丰堡学校的院子里，胡开明登台说话了：

“社员同志们，今天，我是专门来和你们研究公共食堂问题的。我先问问大家，公共食堂究竟好不好？”

全场沉默了一下，社员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都盯住了大队几个干部。支书郝永昌站起来说：

“好！公共食堂好！”

随着他的话音，大家也锣齐鼓不齐地支应着。

“好！公共食堂好！”

“那么，谁能说说公共食堂好在什么地方吗？”

“公共食堂节省柴火。”人群中，不知谁嚷了一句。

胡开明却反驳说：“依我看，不是省柴火，而是浪费柴火。这么冷的天，家里不烧炕怎么睡觉？要是在家里做饭，炕也就暖了。可是吃食堂回家暖炕又烧柴火，你们说，这到底是省了柴火还是费了柴火呢？”

“费柴火。”不少人回答市委书记的问话，更多的人却是连连点头。

“那么，公共食堂还有什么优点呢？”胡开明又问。

“大食堂省粮食。”又一个人回答。

“是不是省粮食，咱们也算算帐。”胡开明伸出手指头说，“咱们村210户人家，自家做饭的时候，谁家不是算着吃着省着吃，剩下点饭菜，下一顿热热还能吃，谁都不会扔掉，汤汤水水还要喂鸡、喂猪。我了解了，那时，哪一家也有十来只鸡，一两头猪。可现在，咱们村连叫鸣的鸡都没有了。你们说，这到底是省粮食还是费粮食

呀？”

“费粮食。”社员们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

“还有什么优点吗？”

“人工还是省了。”生活队长石宝珠不服气地说，“大食堂确实用工少了，可是，各家做饭时都是什么样的人工呢？”胡开明扭过脸，点着郝永昌说：“郝永昌，你在家做不做饭？”郝永昌连连摇头：“我才不管做饭呢！那全是娘儿们的事。”

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胡开明也笑了：“我先不批你这个大男子主义，不过，原来在家里做饭的，确实没几个老爷子、壮汉子，尽是老婆婆们和出不了工的媳妇们。这些人，即使不做饭也出不了工、下不了地。可另一方面，大食堂里活重，挑水、和面、上笼，那个活也不轻，所以，应得挑壮劳力来做饭。咱们村5个食堂，一个食堂里5个人，五五二十五，大家说，这人工到底是节省了还是浪费了？”

“浪费了。”这回社员们是扯着嗓子吼了。

……

胡开明抬高声音问：“社员同志们，你们说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呀？”

“不好。”大家齐声回答。

“不！公共食堂还是好。”看社员不解的神情，胡开明继续说，“可咱们现在不具备办食堂、吃食堂的条件。办不到的事硬要办，这就不好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呀！”

“是。”大家像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胡书记，咱们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您说咋办吧？”

胡开明面对大家，高声问到：

“现在大家说说，这公共食堂还办不办呀？”

“我们早就不想办了！”

“那么，就按大家说的解散了！”

随着他的话音，社员们兴高彩烈的欢呼着“解散了，食堂解散了！”有的人飞跑回家，向未能前来开会的家人报喜。

上书就要一目了然， 旗帜鲜明

胡开明就任第一书记以后，走遍了张家口的山山水水，尽管他使浑身解数，张家口的形势却没有得到根

本的好转。他掉过头来看历史，逐年考察建国以来的十年农业和实际成效。写下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笔记、心得。

1962年初，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两段话：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新的生产经营形式已经被农民创造出来了，这就是包产到组，其核心是建立生产责任制。”

请不要忘记，这是1962年，当时全党是在肯定“左”的错误的同时纠正“左”的错误。万全县县长陈鸣歧说：谁觉悟得越快，挨棒子也越快，反思得越深刻，挨整也越厉害。这话颇有哲理，也是60年代的实际情况。

这一年的6月，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后到保定胶片厂任职的葛启得到平反。

省委原打算把他安排到省公安厅去当副职，胡开明反对说：“这不合适，人家是地委第一书记，既然平了反，就应该官复原职。”

一道命令传达到张家口：葛启任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免去胡开明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职务。

葛启到职。召开常委会听取工作组汇报。汇报中反映蔚县常宁公社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

胡开明已经卸职，准备收拾行装回省。常宁推行“三包到组”是他提出的，但眼下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虽然只是分厘之差，胡开明却不能同意。所以，当葛启、何明等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认为“包产到户”作为生产经营方式的一种辅助，那是有好处的，但最好不要推广。

29年以后，当胡开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感慨地说：“葛启有魄力，在‘包产到户’的实践上，比我走得远！”

复职的第一书记刚回张家口，就大刀阔斧地工作，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害怕、胆怯、衰退、萎缩的影子。他还是过去的葛启，实事求是的葛启，敢说真话的葛启。在他领导下，张家口的工作会逐步破除“左”的束缚，经济建设会发展得更快。对此，胡开明感到欣慰。

一天，当他即将离开张家口的山山水水，离开280万人民群众，离开同甘共苦的地委班子时，胡开明心中不由自主产生一种留恋不舍的心情。这难道就是感情吗？

几天后，胡开明在省委机关见到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林铁高兴地说：“老胡啊！你前脚回来，后脚你的县委书记就写联名信，请求省委将你留在张家口，看来你这地委书记还当出感情了啊！”

胡开明何尝不眷恋着张家口？特别是那么好的一个群体。他深深地感到县委书记们代表280万张家口人民的殷切希望。但没有想到，尽管他做了工作，13位县委书记还是向省委写了挽留信。

胡开明在省委报到后，当他正在和林铁随意聊天时，华北局第三书记李立三推门进来。一进门就大声说：

“老林，告诉你，中央马上要开一个北戴河工作会议，华北局想赶在会议之前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搜集和提供材料。等到中央的会议开上了，咱们的会就和它同步了。最后再把中央会议的精神拿到咱们会上贯彻。你们河北北面去一个地区的代表，南面去一个地区的代表，加上省农工部的领导。你赶快把一南一北的人定下来才好。”他一口气站着说完了这些话，才和胡开明握手打招呼。

林铁书记问胡开明：“北面谁去？”胡开明微笑着没有说话。

“马力？”林铁书记说。

沉思片刻，林铁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不行……”

李立三和胡开明转过头来，欣赏着房间的两幅字画，好让林铁静静的思考。

“张家口的葛启、承德的王克东刚平反回去工作不久，还不了解情况。”林铁沉吟着说。

突然，他抬起头，对胡开明说：

“你去怎么样？”

“我去？”胡开明感到突然。

“我已调动了工作，怎么还能做北片地区的代表呢？”胡开明率直地回答。

“这不要紧，这又不是什么正式会议。”林铁接着说。同时，林铁又征求立三的意见。

“立三，你看可以吗？你知道，胡开明对农村政策相当有研究呢。”

李立三快人快语，“可以，这个座谈会就需要能提出意见、反映情况的人。”

李立三边说边将胡开明拉到了一边，谈起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开法，接着讲了一下当前形势，并随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中央发的调查提纲交给胡开明。

十分钟之间，决定了胡开明参加华北座谈会。而胡开明在会上的发言和上书，则几乎决定了胡开明后半生的命运。

胡开明回到张家口，他的日程表安排的满满的，开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干到下半夜。常常是他的爱人、专区副专员李克林睡醒一觉了，他还在那里埋头工作。

“你又要放炮了？”李克林终于问他了。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能为孩子想想吗？”

无情未必真豪杰。但他的党性、责任、良心和对事业、对人民群众的一片真情又不能不使他去“鼓与呼”。于是，他默默地摇了摇头。

让孩子自己去闯吧，不要让他们仰靠父母过日子，如果他们能从父辈身上学会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那才将是终身受益无穷的财富。胡开明这么沉思。

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形成了。这份建议凝聚了胡开明三年的心血，即使从确定题目开始也经过近半年的时间。林铁、李立三两位书记决定他参加华北座谈会之后，他下决心在这次会议上把建议报告拿出来。

胡开明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消息，在农村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上，各地情况不同，中央也是有意见分歧的。据说，毛泽东同志开始对安徽的“责任田”也讲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自留地多一些，不会饿死人！但时隔不长，到1961年底，又讲“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责任田办法变过来？”当时，刘少奇、陈云、彭真等同志是支持包产到户责任制，主张农业上要退够。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曾讲“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

‘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作为农村工作部长的邓子恢同志，主张实行包工，以生产队为主体向作业组包工，大活包到作业组，小活包到人，并支持包产到户的办法。对此，有人提出批评，说这是方向路线问题。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中央局、省委，对责任制都是反对、怀疑的人多，赞同的人少。胡开明决心把自己的调查报告拿出来，意在说服更多的同志，推动和促进生产责任制的实行，以进一步纠正党在农村工作上的“左”倾错误。

建国以来，毛主席的兴趣一直在农村工作上，他密切关注、探索农业发展，调整着农村的政策。胡开明有这样的直感，在恢复农业生产改变农村政策问题上要拍板非毛主席莫属。他接受参加华北农村座谈会任务后，即萌生着一个信念：一定要向主席直接建议。

胡开明到北戴河的第二天，给张家口地委打电话，叫于力耕去，他告诉于力耕，他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把那份报告“通天”，直接送毛主席，所以要叫他去最后斟酌修改一遍。

于力耕踏上张家口——北戴河的火车，一路上，他只觉时间是那么漫长。他竭力地思索着怎样才能说服老领导打消直接向毛主席“上书”的念头。

他赶到北戴河，见到胡开明，将自己途中苦思准备好的劝告词一古脑地说完。却未能动摇胡开明的决心。

随后，于力耕只得开始在内容和词句上做文章。请看他修改文章时与胡开明的两段对话。

于力耕：“‘包’太敏感，批了多少年了，建议把‘三包到组’改成‘三定到组’。”

胡开明：“包就是包，上书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

于力耕：“这里提不要歧视包产到户的社员，对他们要满腔热情不合适，还是删了好。”

胡开明：“删不得，这里不亮观点哪行啊？”

议来议去，删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结果是观点更鲜明了。

7月30日，胡开明在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的发言。会议秘书处作为大会简报印发并同时转报中央。

8月8日，胡开明再次写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毛主席：

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

布礼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

胡开明

1962年8月8日

这封信是通过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秘书转中央办公厅呈送主席的。同时分送省委几位主管领导同志。建议开宗明义，旗帜鲜明。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组织原则上来说，都是无可非议的。让我们摘录几段报告中的话：

“农村人民公社，经过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纠正了‘五风’错误，比较彻底地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主要表现是：（1）社员出勤不主动，每天还得队长挨门上户去叫；（2）社员集体劳动的时间短，出勤晚，收工早，一般每天不过六小时；（3）耕作粗放，耕地留茬子，种地不到头（边），锄地草搬家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一个生产队长告诉我说：‘现在社员有四怨情绪：一怨别组出勤晚，本组出勤早；二怨别组歇息大，本组歇息小；三怨别组收工早，本组收工迟；四怨别组工分高，本组工分低。’”

报告紧接着说：

“为什么还存在上述现象呢？除了既定的政策还没有落实以外，主要问题有三：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太不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合理，粮食与工业品交换不等价，与其它农副产品的

比价也很悬殊。所以群众说：‘以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以上三个问题都急需解决，但是由于目前工农业生产水平低，物资少，解决前两个问题是有限度的，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当前主要是解决后一个问题，即解决生产队内部的关系问题，发挥本身的潜力。”

在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了系统论证之后，报告详细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

他在报告中举例说：

“张家口郊区东窑子公社，有几个生产队在今年春季，自发地建立了常年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了‘三包’生产责任制。我去看了一下，效果很好。孤石生产队实行‘三包’到组后，队长既不用每天派活，也不挨门上户叫出勤了，连钟也不打了。每天天一亮社员就自动下地搞集体生产，中午休息时间很短，到了天黑还不肯回来。现在他们集体生产搞得很好，开小片荒的很少。外东窑生产大队‘三包’到组的一、二、三队，种的十二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6939斤，5月12日就上市了，平均每亩收279元多，斤价3分9厘3；未包到组的第四生产队的三亩老根菠菜，平均亩产757斤。目前生产组与生产组之间的竞赛劲头很大。”

报告列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并针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有根有据的批驳。

此件，经中央办公厅递呈毛主席。几天后，在中央召开着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8月16日

此信及胡开明同志《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被列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下发。

和彭德怀的信一样，毛主席的批示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的意见。

然而，胡开明明显感到，他上书不几天，座谈会的风向就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支持他的同志也转了180度的弯子，对生产责任制基本上是一片否定之声。

是继续反映情况还是赶快转向？胡开明怀着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选择了前者。

他手头还有两份材料，一份是他与跟随多年的秘书曲维镇共同研究写的《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在这份报告中，他针对农村在生产资料归公后，大家口粮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口粮按劳分配是不行的。提出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建议。

8月18日，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信，并附录这份报告继续送了上去。

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毛主席见到河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时讲：“看来口粮问题不要强调按劳分配了，否则会打击农村‘四属户’（军、烈、工、干）。”显然，主席是阅过胡开明的第二封信的。近年来，在中央档案馆卷宗里，我们查阅到当年胡开明写给主席的信，在信笺上清楚地加盖着“已送阅”戳章以佐证。

胡开明万万没有想到，8月16日毛主席将胡的“上书”批给会议各同志讨论的前七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讲话中已经批了他。

那是1962年8月9日。

毛主席说：

“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

毛主席显然动气了：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

毛主席点名讲到胡开明：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毛泽东同志批评“一片黑暗”和批评胡开明这两段话，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没有正式传达过，胡开明自己也毫不知情。“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拿出“最高指示”他就像受到了晴天霹雳般的震惊！

两年以后，他的战友与他一起被称为“胡、葛、解反党集团”。最后被定成“胡、葛、解、张（何明）王

（云）马（哲生）反党集团”。株连者不计其数。

文革期间的1969年，他被由省里押送到张家口地区在每一公社轮流接受批斗，当他吃到埋在白菜下面的猪肉、豆腐时，当半夜三更干部和乡亲们来看他、安慰他时，他更坚信，是非功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回答。

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了16年。

1978年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春风的吹拂下，16年没有正式工作的胡开明被中央一道命令调到安徽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他去了。在那里，他兼任省农委第二书记，配合和支持万里同志，在安徽率先实行了农村生产责任制。仅仅两年，素称要饭之多的凤阳人民永远结束了乞讨的历史，整个江淮大地，到处响起了欢庆的锣鼓和鞭炮声。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

……

1980年9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18年的历史反思，我们终于又回到历史的正路上。这是一段多么坎坷的路，这是一段多么令人痛心和沉思的回顾。

1982年10月，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到安徽视察工作，在听取省委常委汇报时说：“在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从历史情况来看，在1960年以后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同志是先知先觉者。当时就主张要改革1958年后农业长期推行的方法，少奇同志也好，小平同志也好，邓子恢同志也好，曾希圣同志也好，还有在座的胡开明同志也好，在座的其他同志就不清楚了。”

张家口地区有的老干部曾给胡开明送过这样一副对联：

敢说真话 击鼓破天惊！

历史作证 你是真开明！

寥寥18个字，不正是这位市委第一书记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写照吗？

（责任编辑：刘家驹）

锤头



内战时期红军用的党旗

红色的背景上镶嵌着金光闪闪的铁锤镰刀图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熟悉这面旗帜。它火红，炽烈，渗透着无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抛洒的肝胆和热血；它豪迈，潇洒，寄托着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奋斗的信念和理想……

在弹雨横飞的战场上，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经过血火考验的革命斗士，面对斧头镰刀旗默默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在热浪沸腾的“四化”建设中，在远征南极科学考察的巨轮上，壮怀报国之的优秀儿女，面对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知道这“锤头镰刀”党旗的由来吗？！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烟，一展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历史风采吧！

本文是本刊早在今年二月特约的“七一专稿”。由于不以作者和编者意志为转移的原因，这篇作品未能如期发表。但是本文由从未披露过的中共党旗的来历，写了中共光辉历程的一个侧面，文章很值得一读。为此，尽管已过七·一，本刊还是全文发表于此。

镰刀开新天

——记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由来

犁头，铁锤，镰刀，CCP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17年11月7日，在革命导师列宁的故乡，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划破了俄罗斯严寒的夜空。刹那间，枪炮齐鸣，“乌拉”之声震天撼地，起义部队潮水般占领了冬宫，宣布“一切权利归苏维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继之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从此升起了黎明的曙光。

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新高潮，香港、安源、开滦以及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连续爆发。与此同时，毛泽东、澎湃等共产党人深入湖南、广东的山区田陌、茅屋篱舍，大力发动农民运动。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率先打出了犁头太阳旗。

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会场上，悬挂着共产国际组织统用的徽记——“锤头镰刀”，表示国际布尔什维克党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57个支部成员之一。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旗帜，都相继出现过“锤头镰刀”和“五角星”的标记。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制定统一的党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我们看到式样不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标志：一面红布上方嵌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字母“CCP”，下方竖写着的是墨迹斑斑的入党誓词；另一面红地旗面的正中是一颗黄五角星，五角星的中间是交叉的镰刀斧头，五个内角写着“中”“国”“共”“产”“党”5个红字……瞻仰这革命文物，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有多少热血青年、革命志士曾面对它立下誓言，然后奋勇冲上杀敌的战场……

延安窑洞里的庄严决定

延安，民主革命的圣地。

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由长征后期的几万党员迅速发展为一百多万党员。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应该有自己的正式旗帜。

1943年4月28日，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制作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的决定：“中共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并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党旗，分发给各机关使用。

党中央没有对“斧头镰刀”作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其实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已经对它作了充分的解释和说明。谁都知道，斧头、镰刀是工人、农民的生产工具，也是斗争的武器。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普遍流传着一幅对联标语：“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在中国革命中，广大的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骨

建党初期的临时党旗



1945年在延安征集的部分党旗图案示意图



①镰刀、锤子②红星、镰刀、锤子③锤子、镰刀、三红线（象征三三制政权）④锤子、镰刀、指南针⑤镰刀、锤头、步枪⑥红星、镰刀、斧头⑦镰刀、斧头、弓箭（王明闻、华君武设计）⑧红星、锄头、斧子⑨锤头、镰刀、方向盘⑩旭日东升起⑪盾牌、锤子、镰刀⑫齿轮、锄头、步枪⑬犁头、齿轮⑭CCP、齿轮、嘉禾⑮红星、毛泽东⑯中国图形和镰刀、锤头⑰北斗七星和镰刀、锤子（艾青设计）⑱红星、红缨枪⑲锤子、镰刀、三颗星（三颗星象征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三阶段）

（林玉华、刘军纳重绘）



中共“七大”正式制出了党旗样式

千力量。他们一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就会焕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1945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会场布置得朴素庄严，主席台顶端镶嵌着十二个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正中是毛泽东、朱德同志的侧面画像，画像两旁悬挂着六面中国共产党党旗，金光闪闪的“斧头镰刀”和红缨旗杆映照得四壁生辉。

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正式悬挂自己的党旗。这次大会自始至终充满了隆重、热烈和民主的气氛。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一次新党员入党仪式上，一位鬓发斑白的新四军老战士抚摸着党旗，激动地回忆起战争年代的情景：“在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部队行军打仗，爬山涉水，指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党旗

“导员总是带着一把伞一样的东西，外面包一层雨布，里面就是一面党旗。到达宿营地以后，每召开连队党支部会，都要把党旗悬挂在墙上。在战士的心目中，党旗，那是十分神圣的，丝毫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它！”

是啊！“锤镰”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信念和理想的凝聚和升华。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义务维护它的圣洁和美丽。

230幅党旗图样和革命者的初衷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是还有一段历史的插曲，那就是，在浩如烟海的党史档案里，至今完好保存着230幅中国共产党党旗的设计图样。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大会筹委会收到了各地代表的许多来信，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党旗要体现出民族化的特色。为此，大会筹委会发出了征集党旗图样的通知。在前后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就收到了延安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联防军政治部等单位应征设计的二百多幅图样，并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展览。

设计图案各色各样：有的是斧头、镰刀、五角星结合为一个整体，表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的是铁锤、犁头、步枪、笔杆浑然组合，体现出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结成革命的联合阵线，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有的是启明星、指南针和两条金黄色相互谐调，贯穿旗面，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必将迎来胜利的曙光，普照中华大地；还有的是黄色图形和红色背景相配合，标志着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众多的党旗图样中，还有著名美学家王朝闻、画家华君武设计的“斧头镰刀羽箭”图案；还有著名诗人艾青设计的“北斗七星”图案……这一幅幅精心

设计的党旗图样，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党的革命性质、行动纲领和光明的前途，充溢着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战斗精神。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图样后来虽然没有被采用，但在党的历史宝库中，却增加了一笔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精神财富，它蕴含着设计者执着的革命初衷，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革命的旗帜，战斗的旗帜，团结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昔日，在革命战争的连天烽火中，它聚集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英勇冲锋；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它乘风破浪，引导着5千万中国共产党人和11亿中国人民，为着实现党的宏伟的战略目标，为着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70多年前就曾经预言过：“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责任编辑：洪炉)

200多年前，发生了一件连乾隆皇帝都称之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的贪污巨案，使他不得不陆续处决了百余名贪官。只是贪风并未因之遏止，这是因

百颗脏官头一桩奇贪案

——清乾隆年间王亶望特大贪污案探秘

郭成康



左上：清帝乾隆御象
右上：乾隆皇后御象



敬献给皇上的贡品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发生了一桩清朝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自封疆大吏到州牧县令被判处死刑的竟有一百多人，其中50几名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轰动朝野的甘肃全省官员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粮的大案。

贪污之风肆虐于穷乡

这场特大贪污案件的首犯，是乾隆皇帝曾十分倚信的封疆大吏王亶望。王亶望，山西临汾人，自举人捐纳知县，累任知县、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调任甘肃布政使，受命专门办理收捐监粮。

甘肃地瘠民贫，是全国最穷的省分，每年中央户部都要调拨巨额款项采买粮食，赈恤灾民，供应当地满汉驻军，以及接济新疆之需。为节省国库开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缺粮之急。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甘肃省内外商民赴甘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要求千里迢迢进京入国子监读书肄业，但他们已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直接参加

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因此，捐监一途是当时富裕商民子弟入仕的捷径。加之甘肃开捐定价较低，每名只需麦豆四五十石，外省商民更是趋之若鹜。不料行之数年，诸弊丛生。大抵是经手的地方官借机贪污、挪用捐监粮，甚至干脆折收银两，更便于中饱私囊。清政府只好下令中止甘肃收捐。停捐之后，户部仍旧每年拨银一百数十万两解至甘肃采买食粮，而甘省大小官员仍为缺粮叫苦不迭。所以当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锦奏请恢复捐临旧例时，经户部遵旨会议，以为可行，乾隆皇帝也就很快允准了。鉴于以往积弊多端，

清帝后妃官行乐图



乾隆皇帝特选调精明能干、善于理财的王亶望为新任甘肃布政使，专责办理该省收捐监粮事宜。

王亶望上任伊始，便向乾隆皇帝保证“随时随处，实心实力，务期颗粒均归实在”。而暗地里，却和总督勒尔锦狼狈为奸，下令全省收捐各州县捐监无需缴纳粮食，而一律折成银两收捐，全部上缴到王亶望和兰州知府蒋全迪那里。这样一来，白银虽滚滚而来，捐粮却颗粒不见，仓储空空如也，又将如何交待？王亶望自有妙计。他和蒋全迪二人每年夏、秋都在省城兰州秘密核计，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下令各州县按照他俩虚拟的数目，开销掉了虚乌有的“捐监粮”。各州县见王亶望如此胆大妄为，也无不群起效尤。原任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浮开赈银5万余两，纳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陈常，在三年任内共办监生执照4千余张，每名多收银10两，共贪污银4万有余。从乾隆三十九年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历任甘肃省各州县长官百余员，几乎无人不贪，入己赃数自数百上千两至9万两不等。当然，这些州县官还要用赃款去贿赂上司，如上面提到的知县何汝南前后“馈送”王亶望银1万8千余两，“馈送”蒋全迪5千余两，总督勒尔锦交他办买物件，又花去银6千余两。有个叫麦桓的广东人干得更荒唐离奇，他被分发到甘肃待补知县之缺，当时正

赶上各州县报办夏灾，为急于补上县官好借灾大捞油水，就托人向蒋全迪疏通。最后达成交易，麦桓送王亶望、蒋全迪各8千两银。无奈麦手中无钱，只好应允捏灾冒销得银后，如数奉送。这样，蒋全迪保举麦桓升补靖远知县，麦桓则风风火火赶到任所大办其“捐监赈灾”，以筹措银两还债。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著有实效，省去每年都拨白银一百数十万两的烦费，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擢升浙江巡抚，拥厚赏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如法炮制，又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两，除办公费4两外，再加2两所谓“心红纸张费”。总计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约在4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两计，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确实有一小部分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会少于白银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王亶望为首的贪污集团如此庞大，贪赃手段又如此明显，势难尽遮天下耳目。巡抚闵鹗元的弟弟闵鹤元



敬献给皇上的赠品玉如意

在甘肃做知县，自然是贪污集团的成员，而且陷得很深。闵鹗元略有风闻，曾去信告诫，令其收敛。封疆大吏中有亲族在甘肃做官的当然不只闵鹗元一人，而京中户部大老爷们不断收到王亶望之流的丰厚馈礼，也不会全无所知。但内外大臣都在窥测乾隆皇帝的意旨，竟无一人挺身举发。据事后乾隆皇帝所说，他对此事也“早有风闻”，“迟回未发者已二三年矣”。如果他说的是实话，王亶望贪污案在败露前二三年，已是包括皇帝在内朝野尽知的几乎公开的秘密了。皇帝尚且有意包容，也无怪闵鹗元之辈袒护兄弟了。不过，平心而论，当时局外人恐怕谁也不很深悉王亶望贪污集团骇人听闻的内幕。

乾隆四十六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申率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雨，乾隆皇帝疑云大起，感到前此甘肃省连年





报早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系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 50 万两（以数相当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 50 倍）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额家赏必与贪污省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在谕旨中他称阿桂和李侍尧为朝中和外省“最能办事之人”，要求他们“根求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果然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今年七月间，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 12 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 12 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它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的律文，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 66 员斩刑，待秋审处决。此时业以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骈首就戮”，特命凡贪污 2 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 1 万两以上、2 万两以下者，较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 万两以下者亦问斩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经过此番宽大办理，程栋等 22 名贪污 2 万两以上的官员于九月份被砍头，而兰州知府蒋全迪先已伏法。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

羁押这么多特殊身分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 74 人分批解往北京。这 74 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总计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有 56 犯，免死发遣者 46 犯，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 56 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 3 人，这在清朝建国 140 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法网恢恢偏漏吞舟之鱼

王亶望贪污案的真相刚刚暴露，乾隆皇帝便立刻觉察出，酿成这起空前巨案的元凶并不是王亶望，而是不久前故去的前大学士兼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

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乾隆三年（1738 年）这位年仅 24 岁的江南才子便蟾宫折桂，考中状元。此后的 40 年间，更以他非人所能及的敏捷之才，日益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和宠眷，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也随之扶摇直上，历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等要职，到乾隆三十九年，由于傅恒、尹继善、刘统勋等老臣相继谢世，乾隆皇帝着力培养的勋戚福隆安还年轻未经历练，于敏中遂以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仍管户部事务。清制，大学士须兼军机大臣方为真宰相，而于敏中当时虽无宰相、首辅之名，却是朝野尽知的京中第一权臣。这一年，甘肃恢复捐监旧例，而此后的四五年间正当于敏中弄权之日，也恰恰是王亶望贪污集团肆无忌惮，侵蚀国帑之时。如果说于敏中能廉直自持，甘肃贪污大案自然不能怀疑与他有什么瓜

葛，更不能追究他的什么罪责，然而，于敏中的品行却实在大成问题。

年轻的于敏中步入政府中枢部门的时候，当时官场注重清正廉洁，风气很好。那是乾隆皇帝当政的前二三十年，大概称得上乾隆朝乃至整个清王朝的黄金时代。主持权柄的军机大臣，都以与外省军政大员交结为戒。张廷玉虽接受督抚们的馈礼，不过一旦价值超过银百两辄坚拒不纳。讷亲为人苛刻，门庭阒然，可张网罗雀。傅恒平易近人，但封疆大吏无人往其私寓拜访。至于在军机处办事的军机章京们，偶尔得到一件价值 30 两白银的礼物，就会喜不自胜，以为生平未尝见过如此重饷。可惜这种风气到乾隆中期以后为之一变，而转变的枢纽人物，据说就是于敏中。

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十二月于敏中病故，丧事备极哀荣，但很快就大故迭起，使他四十年功名一落千丈。第一次打击来得非常之快，更可怕的是，危机是从他的家族内部爆发的。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于敏中的孙子于德裕到官府控告堂叔于时和将其祖父在京资产据为己有，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命大臣查办。查办的结果令人震惊，素有廉直之名的于敏中，其京中及原籍家产竟值 200 万两白银。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向本国发回情报称：“皇帝大怒曰：‘朕任敏中数十年，知其为廉直，安得有如此巨贲？’命籍没其家产”。这份情报不尽准确，因为当时是以判定于敏中之侄于时有罪，而籍没了他所侵吞的于敏中的财产。不过朝鲜使臣说乾隆皇帝震怒是完全可信的。一向十分自负的乾隆皇帝竟被貌似廉正的于敏中长期蒙蔽，怎能不怒火中烧？

古人常说“京官穷”，这有一定道理，因为他们俸禄少得可怜；然而现实又不尽然，京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手中有权，因而不乏生财有道，他们捞

外快主要是打外吏的主意。封疆大吏在地方上要兴办什么事（当然要有利可图，尽管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首先要疏通中央主管衙门，特别是皇上跟前说得进话儿的朝中权要。所以督抚等大员进京办事，都要带上一笔可观的银款，以及金珠玉玩之类的珍宝，用来馈赠分踞要津的京官，以取得他们的关照和通融。“京官专以咀嚼外吏为事”。乾隆皇帝当然了解京中大老接受督抚馈赠的“秘密”，但于敏中竟然借此聚敛起价值200万金的家私，这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所以借办于时的罪，把于敏中家产几乎抄了个净光。于敏中的声名暂时保全了，但已遭到致命一击。此时距离乾隆皇帝决心查办王亶望贪污集团，尚不到一年的光景。也可以说，于敏中的去世，以及接踵而来的他的贪脏纳贿初步败露，使王亶望们很快临近了末日。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最后一天，乾隆皇帝下令将王亶望等处决后，甘肃贪污巨案虽仍在层层根究，务使“水落石出”，那不过是针对王亶望以下的喽罗们而言。乾隆皇帝之所以以迅疾手段杀掉王亶望等，显然有意暗示人们：此案首恶已除，无须向上株连蔓引，追究中央有关人物的罪责。皇帝的心曲大小臣仆心领神会。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小吏之不廉，大吏导之也；而大吏之不法，又谁导之？”答案本来清清楚楚，因为明摆着已死和未死的吞舟大鱼还幸逃法网之外，但说出来犯忌讳。

乾隆皇帝也许体察到了舆论的动向，索性自己主动作出回答。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当杀掉了最后一批甘省贪污官犯后，一道洋洋千余言的谕旨向全国臣民颁布了。乾隆皇帝在上谕开头便说，当年甘肃奏请恢复捐监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言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该谕旨还指出：“其时王亶望为布政使，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以至放手大贪其污。皇帝把话说到这里地步，王亶望贪污集团真正罪魁祸首是何人，已不言而喻。但谕旨接着笔锋一转，说于敏中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于敏中业已身故，而且他的万贯家私也查抄殆尽，不追治其罪可以理解。关键在于，这道经过精心推

敲的谕旨，掩盖了于敏中（特别是尚在朝中，与于敏中一样屁股底下不干净的权要）为什么怂恿皇帝同意甘肃恢复捐监的奏请，为什么庇护王亶望胡作非为，究竟得到了哪些好处等等一些要害问题。应该说，乾隆皇帝此时并非不知底蕴。光阴荏苒，寒暑流易，到乾隆五十一年春间，皇帝把玩古董，为一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古磁而触动情思，由嘉靖皇帝的昏庸，想到权奸严嵩的专擅，由严嵩而忆及于敏中。为此乾隆皇帝再次颁发谕旨，指责于敏中借皇帝恩眷，招权纳贿，并联系甘省贪污大案，推断“于敏中拥有厚赏，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

这“贿求赂谢”四个字，言简意赅，一语道破了从地方到中央整个贪污网罗结在一起的奥秘。然而这位功业盖世的雄才大略的帝王已年逾古稀，在割除掉已经完全溃烂的甘肃毒瘤后，他已没有勇气“根求到底”，不想对政府中枢已经烂掉和正在迅速烂掉的部位再作一次彻底的手术了。而问题的严重性恰恰就在这里。当王亶望之流人头纷纷落地的时候，一颗“政坛新星”正冉冉上升，他就是以贪名昭著于世、于敏中与他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的人物——和坤。

皇帝是最大的财宝 敛聚者

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风行以馈赠为名的贿赂。州县向道府送礼，州县道府又要向总督、巡抚送礼，总督、巡抚则要向朝中权要送礼。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大呢羽缎、盆景摆设等等，皆为礼品。这些礼品也就成了封建国家官僚机器的一种特别的润滑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这部机器的主人——皇帝，也接受地方总督、巡抚、朝中大臣以及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的礼物，不过，给皇上送礼要冠以“贡献”或“进贡”的美称。而且贡品颇有讲究，最上乘者，应该是寓意吉祥，体面大方，新颖别致而不流于奇技淫巧，富丽堂皇又未落入俗套。

王亶望就是一个不惜巨万以博取主子欢心的办贡能手，尽管他的贡品由于奢华得近于庸俗，曾不止一次受到乾隆皇帝的申饬。当时臣工每次向

皇帝进献的成批贡物中，总是以“如意”居首，取其“吉祥如意”之义。一柄看得过去的玉如意需银4000两，王亶望觉得还不足以表孝敬之心，于是又在玉如意上镶嵌大大小小真珠为饰。四分重的珠子大约值四五千两白银，重五分者则需六七千金，如搞一颗象龙眼果那样重3钱的珠子，至少要掏白银2万两。当时王亶望所任的浙江巡抚是令人艳羡的肥缺，每年本职养廉银1万两，又因兼管盐政，每年另增9800两津贴，总数超过兼辖三省的两江总督（其养廉银每年1万8千两！王亶望办一次贡，几十件贡品中为首的一件镶珠如意，就倾全年薪水也买不起，更不去说过节要贡，过年要贡，皇上“万寿”（生日）要贡，皇太后“圣寿”（生日）也要贡了。因此只好向下伸手，美其名曰“帮贡”。帮来的银子当然不会都去置办贡品，借此大捞一把也是常有的事。王亶望贪脏败露后，有个叫郑激的御史上奏说他“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公行。”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贡献与官场黑暗腐败之间的关系。从王亶望作布政使到任巡抚，究竟贡出了几多银两，恐怕难于精确统计，但花销数十上百万两去办贡品以邀皇上恩宠，总还是有的。

乾隆皇帝在查办王亶望贪污案的整个过程中，曾三次降旨对进贡作出某种限制。最后一次是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禁贡金器。这一禁令的发端说起来很有意思，可谓王亶望贪污案的案中之案。奉旨负责查抄王亶望杭州任所赏财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将抄出的金锭、金条等近五千两用白银抵换，并抽走玉寿山、玉瓶等珍玩。事发，又追究出陈辉祖为进贡而勒索属员黄金等罪款，法司拟应斩，乾隆皇帝赐令其自尽，就陈辉祖案颁发的禁贡金器的谕旨中，乾隆皇帝承认各督抚之所以竞相进贡金器、金如意，是因为自己“赏收”（应为“索要”）之故。然后又轻描淡写地说：“此系朕失检点之处。”这是乾隆皇帝当权63年（包括太上皇3年）中，所作的有数几次像样检讨中的一次。

如果说王亶望贪污案暴露出来的权臣揽权纳贿的黑幕，是大小臣工议论的禁区，那么，贡献一事则是更大

●徐天铎

台湾诗人越海谈诗

台湾诗人张默游览普陀宗乘之庙小憩。



也许因为有缘，在春光明媚的五月，我与台湾诗人张默、管管和碧果再次相会，一同去了承德。徜徉于如画似锦的山水之间，我们兴趣盎然地谈文学、话诗歌、叙家常……几日的朝夕相处，我对他们，特别是对张默先生，有了更多一点的了解。

爱诗走上不归路

下榻承德宾馆的当日晚上，我向张默提出了他是如何踏上诗歌之路的问题。

浴后穿着件衬衫的张默，坐在沙发里，一副轻松愉快的神态。他1931年出生，算起来今年整60岁了，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他谈

吐稳健、思路清晰，一丝不苟地将往事娓娓向我道来。

他本名张德中，出生于安徽无为县孙家湾的农户。那是一处山青水秀、充满诗意的地方。他清楚记得：旧居有一个柳丝轻拂的池塘；夏季的空气里充满了稻花香；在田埂上跟着大人看红通通的落日；在插秧田里细数过自己歪歪斜斜的脚印……。13岁进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时，他读到了冰心的《春水》、《繁星》等小诗集。这是他初次接触到的诗歌，以至两年后就读南京紫金山麓的成美学校时，口袋里依旧装着它们，并不时在校园的绿荫中展开来轻轻吟诵、品味。冰心优美的诗章，像一泓清泉滋润了他的年轻心田，萌发了日后做诗人的理想。这期间，他又接触到徐志摩、刘大白、康

白情等人的作品，对进一步了解新诗，展开诗人理想的双翼是个推动。不久，他的处女作《暮看山峰》发表在校刊上。这是一首描写南京紫金山的十四行诗。它的发表，对张默坚定走上诗歌道路是次永难忘却的、强有力的激励。

1949年春，18岁的张默随国民党人到了台湾，后在海军服役。一个大陆来的青年，突然到了四面环海的高岛上，面对海浪潮起潮落、涛声时紧时缓的壮观景象，不由得对海洋产生出一种由衷的赞美和浪漫的想象，他开始发表“海洋诗”，抒发自己的情怀。1954年与洛夫等人相识，创办《创世纪》诗刊后，他的海洋诗加入了东方风格与中国意境的思考，并提倡“新民族诗型”。

禁区。乾隆皇帝并非不了解诸臣进贡日益华奢，与督抚贪污纳贿，以及全国吏治迅速败坏的关系，也明白振刷积重难返的颓风，只能从自己开刀，毅然决然下诏罪己，停止贡献。但这比揭开中央贪污的盖子更是难上加难。限制进贡的皇皇上谕，不过是官样文章。

纳贡只是乾隆皇帝聚敛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抄家、巧立名目罚征有过误的官员等，也都是他招财进宝之道。王亶望贪污案被革职、拿问、治罪的甘肃原任、现任大小一百多名官员，统统被抄家。籍没的家产中，金珠玉玩之类最贵重的一份，照例解交皇帝私人金库——内务府广储司。其余房地产、呢羽绸缎、衣饰器皿等，即于当地估卖，留充地方开支。这次全国性的抄家活动持续了两年之久，甘省所有贪官数年所积珍宝，一朝悉数归入乾隆皇帝的私囊。对官员的借事罚银，也几近巧取豪夺。上面曾提到的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鹗元贪污赈银1万9千

两，乾隆皇帝命闵元10倍罚出，即罚银19万两。不久又发现闵鹗元亏空库银5万多两，也着落闵鹗元赔补，闵鹗元对其弟知情不举，奉旨查问时又吞吞吐吐，命其“自行议罪”，闵鹗元只好“仰恩皇上”再准他罚银4万两。这位倒霉的闵鹗元每年万把两养廉银，用来偿付这些莫名其妙的罚项已属杯水车薪，不久连这笔养廉银也被皇帝“永行停支”了。廉洁不能养，据说原来以养廉洁自重的闵鹗元，后来也“苞苴日进，动逾千万”了。而他变法儿筹措来的近30万两罚银，大都被指定缴到内务府。乾隆初，内务府入不敷出，遇有急事，只好靠户部银库（国家中央银库）接济。迨至乾隆中期，在大造圆明园等皇家林苑，以及满足皇室种种挥霍的同时，内务部却奇迹般地实现了扭亏为盈，其属下广储司、圆明园、造办处三座银库岁岁盈积，时时拨借户部银库，这一微妙变化，很能说明乾隆

聚敛贪欲的滋长，同时也透露出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最早消息。

清朝乾隆年间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是长期以来人们颇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王亶望贪污案而论，甘肃全省无一好官，足证贪风之炽；一件贪污案处理下来，竟杀掉大小官员50多人，也不能说惩贪不严。然而，雷厉风行的惩贪行动为什么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却仿佛火上浇油，使贪风愈盛？晚清时薛福以为，不能责备那时“人性独贪”，而应去寻找迫使官员们“不得不贪”的原因。透视王亶望贪污大案，可惜会了解一点从地方牧令到封疆大吏，直至京中权要“不得不贪”的奥秘。可能乾隆皇帝没有，也不打算从中吸取什么教训，以挽救清王朝的日趋衰朽。从这个意义上讲，二百年前曾震惊朝野的贪污大案留给后人的认识价值，似乎应该超过这起案件本身的涵义。

（责任编辑：尚弓）

《创世纪》11期之后，张默的诗观发生了大变。他的创作走入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路子，逐步从浪漫的情怀、直抒式转换成表现技巧和意象的融合，并成为他的诗歌主调和基色。

1979年至1983年，是张默创作的高潮期。通过有关渠道辗转得知在大陆的母亲健在的音讯后，他的心灵像霹雳一般被震撼了，他的乡愁突然间扩大了许多倍。感情的纠结变得犀利而强烈，他以日积月累所锤炼出来的诗艺，凄切而冷肃地面对自己家庭不团圆、民族被分裂的悲剧，写出了一连串具有艺术高度的乡愁诗。

听到这里，我想起了1988年金秋第一次与“创世纪”诗人们相会的情景。在北京图书馆多功能大厅举行了“海峡两岸诗歌朗诵会”上，张默激动地诵读：

“从梧桐细雨的深处，
她巍巍颤颤地走着
我以极度且近乎窒息的狂喜
希冀抚触她每一寸干涩的的肌肤
三十八载未曾落泪的眼睛
一下子汇集成滔滔不绝的洪水
今夜，我习惯飘泊的灵魂已经回家”

诵毕，张默再也抑制不住眼眶里的泪水……场内人群中发出一片唏嘘之声。

不难体会，一个飘泊30多年的游子思念故乡，呼唤母亲的心情，也不难领会诗人呼吁结束两岸对峙，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心声。

张默供奉的神是诗，诗是张默生命光与热的辐射。40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写作，著有诗集《紫的边陲》、《上升的风景》、《无调之歌》、《张默自选集》、《陋室赋》、《爱诗》、《光阴·梯子》；诗评集《现代诗的投影》、《飞翔的象征》、《无尘的镜子》；编有《（台湾）六十年代诗选》、《感月吟风多少事》、《剪成碧玉叶层层》、《中华（台湾）现代文学大系·诗卷》等10余种。与他创建诗社的精神并进，被诗社同仁称作“诗坛的火车头”。

永远在自然中来去

话题转到张默作品的风格、特点

上。

40年来，张默的诗作总量在800首左右，平均每年20首。50年代，采用白描手法，抒情浪漫；60年代，是意象时期，比较晦涩；70年代末，诗风澄明，稳健深沉；80年代中期，变得冷凝而玄学，着意追求一种“抒无我之情”的境界。张默说，这些诗无论感物、咏景、叙事、怀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都是在极其真挚澄净的气氛中产生。对于诗，他所希冀的就是要有真挚感。

在语言风格上，张默汲取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作品音节韵律重，节奏跳跃大。像音乐的赋格一样采取两路进行。一路接近散文的自由形式，另一路属于文的格律形式，前者俚俗，后者儒雅，一虚一实，一阴一阳，作者就是以这两种力量的相斥、相争、交汇、融合，来控制他作品的张力。

张默还喜用复叠。复叠，本是中外诗歌中一种古老的技巧，但经过他的特殊的现代处理，变得生动而具有新意，成为他独特的语风。

张默告诉我，他年轻时，一天写过十几首，现在一个月，几个月才写二三首。创作是严肃的工作，不能模仿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每首诗作都要表现得恰到好处，要表现出别人没有出现的声音和经验，因而，每次都是新的尝试。

张默的创作题材十分广泛，并无特别的偏好。他说，他的诗里没有故作惊人笔的庞大感，没有特别标榜的永恒与历史感，也没有首首均属活蹦乱跳的新鲜感……只是忠实地虔诚地浮雕出40年来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事物，给予它们以纯然的、朴素的、甚至是宁静的真面目。他喜欢他的诗永远在自然中来去。

“那么，您作诗的信条是什么呢？”我问。张默含笑应答：

“一点一滴，从小我出发，
不偏不倚，让诗心年轻。”

寄希望大陆诗坛

在游览外八庙庄严雄伟的寺庙时，我告诉张默，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会正在讨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问题。请他就此谈谈看法。

张默说，台湾的新诗是1952年发端的，当时《自立晚报》每周在副刊上安排了一个新诗专栏。新诗走向现代主义，是1956年纪弦创立现代派之后。由于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台湾的现代诗发展也走过弯路，打过笔仗。70年代，乡土派文学的兴起，对现代诗是次冲击，现代主义过分强调意象，因而语言结构太紧，给人晦涩感。那次冲击后，经过思考，现代诗开始向传统回转，主张中国现代诗人要归向中国传统文学的列祖列宗。诚然，诗不能远离现实生活，不能过于偏重技巧，必须另辟蹊径，树立澄明诗风。进入80年代，随着台湾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年轻一代文人迅速崛起，又引入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时期的诗作与前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出现了新的倾向。

张默对比两岸诗歌的发展状况说，大陆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巨大的，无论题材内容、语言风格、还是表现技巧，都值得台湾同仁借鉴学习。通过两岸诗界的交流，他对大陆年轻一代诗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相信在坚定的创作热情和远大抱负下，他们的创作技巧会不断趋于成熟，一定能用笔写出他们的探求，描绘出他们的心声。

关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走向，张默做了四点预测。一是，21世纪的诗将更趋向精炼，一语中的。二是，叙事诗可能会兴盛。叙事诗创作题材广，艺术表现形式宽泛，适于表现大题材。三是，剧诗的发展不容忽视。四是，散文诗。

未了，张默真诚地说，中国现代诗应该走上更活泼、更健康、更开朗、更壮阔的发展道路，这需要海峡两岸有才华的诗人，一同浇灌和经营这片园地。我更寄希望于大陆的诗人。

注：“创世纪”诗社是台湾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文化社团之一。

加拿大著名华人舞蹈家梁淑华女士，早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解放军文工团员，复员后出境，先后定居在香港、加拿大，创建了以中国民族舞蹈为主的梁淑华民族舞蹈团和舞蹈学校，多次在北美国际舞蹈比赛中获奖，并几次率团回国演出。最近又应中国舞蹈家协会邀请回国，一到就为我国受灾同胞捐款1500加元。然而她并非富户，本文将见到她的——

异邦日子怎么过？

● (加拿大) 梁淑华



梁淑华与丈夫钟剑文、小女儿钟婉西摄于家中

衣

加拿大对衣着较随便，穿好穿坏，穿新穿旧，古老、新潮全由各人财力及喜爱而定。只要整洁美观，搭配得当，一样可以出入大小场合。

记得20年前在香港影视界工作时，衣着穿戴是每个艺人的门面，每适冬季喜庆或聚会，几乎每位女艺人都身披毛皮出场，否则就显得过于寒酸。当年为了自己也能拥有一件狐皮披肩，省吃省用购下了第一件皮衣，虽不是极品也能应付。这对一个离开国内不久的“大陆妹”已是十分不易的了。

如今，虽已拥有四五件皮衣但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太多的喜悦，只不过是严寒时最保暖的一件大衣而已，而女儿又再三地“教育”我，为了美观而屠杀几十只可爱的小动物是十分可耻的，穿时心中未免有些别扭。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衣着除了要求料子好，样子大方外，色彩总在黑、灰、咖啡几色内打转转。打开衣柜没几件色彩鲜艳的。大红大绿过于新潮的服饰不合自己的口味，再则人到中年体形渐渐走样，费好大的劲也减不去腰腹脂肪，唯有靠裁剪得体，式样大方，色彩深沉的衣着来遮盖。加上自己整天上课教舞，行动匆匆，除了长裤就是裙裤，套装西服渐渐地全

打入“冷宫”。月前与国内艺术界朋友聚会，听说国内人都在追求名牌，一件衣服，一双鞋几百上千地买还认为花得值得。换了我真会心疼得要死。

对于穿着我其实并不过份吝啬，只是越来越实惠而已。市面上很多流行的时装只适合外国人高大的身材，穿了自己体型的服饰反而显得十分“土气”，还不如我自己独特的风格。

现时的年青人对名牌的追求着实吓人，小小年纪已是名牌不穿，一双鞋，一条裤都要一二百元以上，为此我和小女儿经常产生矛盾，明明样子并不好看，只因为是非名牌，她非要买不可，样子好的非名牌衣物她死也不肯穿。几次我大动肝火，把那些全新的衣物送给别人，并发誓永不再给她选购任何衣物，要穿喜欢的名牌自己省下零用钱去买。每当我告诉她自己少年时在部队生活时的艰苦情况，她会翻着白眼对我说“这里不是中国”，大女儿也笑自己又搞中国式的“忆苦思甜”，我真为此气结。

食

温哥华有世界第一流的中国菜，很多香港人都认为现时香港的“食”已逐渐不如温哥华，特别是海鲜。

20年前温哥华唐人街远不及现在的热闹，中国饭店才有几间，全是广东菜，此外就是一些“杂碎”式的中餐馆。那时的点心式样少而粗糙无味；一个叉烧包足足有小饭碗大，皮厚成寸，内容只是肥叉烧几块。饭馆内的菜是一般的甜酸咕嚕肉，炒杂菜，蒸咸鱼饼等家常菜。现在温哥华的中国饭馆越开越多，越开质量越好，加上泰国、日本、朝鲜菜等。温哥华的人真有口福。

我对“食”从不挑剔但能分辨优劣，儿时与祖母同住，祖父在世时是上海广东帮中首富之一，祖母吃惯山珍海味，除是“美食家”外也是烹调能手，自幼看她亲自动手或调教佣人，

自己耳濡目染竟能无师自通烧出不少好菜。

烧菜实在是门艺术，我的厨艺一如我的舞蹈创作，不喜学他人的成品，自己七摸八弄地烧上几道，非得心情好和有时间才能烧出好菜。匆匆忙忙的烧菜煮饭，加上饭后的一大堆锅碗碗筷就能把你烦死，还不如煮方便面吃麦当劳来得省和省力。有时我真想念往日在部队歌舞团的生活，开饭时每人自携碗筷，十人成组围着一张大桌，虽然只有一大脸盆的肉菜，却使人胃口大开，从不用自己为三餐操心。

现在的职业妇女实在很辛苦，一天八小时工作下来回家还得照顾孩子丈夫，如不幸嫁给个挑剔的丈夫，那日子更是难过了。我的一个女友就是这样，每天都要按时赶回家为丈夫烧饭熬汤，一顿不能少，还得翻花样，否则丈夫不悦之色全涂在脸上。我有幸嫁了个土生华人，虽爱“食”但还未学会“大丈夫主义”，看我为自己的事业拼命苦干，一天忙完回家已脸无人色，他不忍心在饮食上有任何要求。方便面、冻饺、麦当劳及炸鸡是他一星期五天的主食，只要我一周烧几样好菜，就能使他心满意足。我自己的三餐更随便，咖啡加面包，一听罐头汤就解决问题。要我把宝贵的时间全花在侍候丈夫女儿的饮食上，那是办不到的。好在他们早已被我“训练”得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我常常“请”他俩出外美美地吃上一顿，以补自己对他俩之照顾不周。

住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淮海中路靠近锦江饭店。

移居到温哥华仅一年左右就搬入现在的房子，由房客变成屋主，一住20年。这幢房子座落在温哥华西区，已有五十多年历史。虽属旧屋，外貌一般，但结实高雅，四周的环境又安静，我很喜欢它。十多年来由我公公

亲自设计，我们自己动手油漆裱墙纸逐步改造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后院内的小桥水池，果树小坡把小鸟、松鼠、浣熊及邻居的猫全引了来。坐在书房内书桌前，透过整幅墙大的窗户望去，真令人心旷神怡。每天清晨醒来能听到满院的鸟声，阳光透过落地的玻璃门及天窗照入满满洒洒地铺满了全室，令人心中充满了喜悦。在四面是窗的后厅内，除了简单舒适的家俱外，沿窗全摆满了我喜爱的柑桔、柠檬、茉莉、桂花和君子兰等花木。它们长得挺拔碧绿，开花时满屋飘香。平时只要我不教课，没事要办，我总爱待在家里独自一人边听音乐边构思或看资料、编舞和写文章。中间以给花木修枝淋水作调剂休息，确是乐在其中。

与西区富人相比，我的家并不富丽豪华，但是大小适中，舒适雅致。每一件家具摆设和字画都是我费心尽力去寻找选择的。屋内没有一件碰不得的珍奇古董，更没有一间仅让人参观而不招待客人起坐的客厅。客人来往也不必进门脱鞋，所以家中气氛欢乐和谐，也是朋友们常来聚会的地方。

我们曾去过一些富友家中聚会，一进门即递送上公众拖鞋一双，本来个子不高的我一下子就矮了三寸，再看看自己满像样的晚礼服配双双拖鞋看来真是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在主人的带领下参观了全屋上下各室，还热情地为我们打开了客厅的大门，

只见室内装饰均属一流，寸多厚的天津地毯，古董字画摆了满室，但客人的活动范围却限于起居室及厨房内。我丈夫向来最讨厌进门就见一大堆各色的鞋子，更别说让他的鞋子也加入这杂乱的“鞋列”中。故此，他从不反对在我家举行“派对”，每次客人走后他都心甘情愿地洗擦所有的杯盆碗碟。

行

20年前在香港时自己拥有一架全新的英国奥士汀小房车。后来为了移民到加拿大，就三钱不值二钱地卖了出去。婚后过的是穷大学生妻子的生活，架着陈旧粗笨的美国大房车出入于西门费雷沙大学。自己个子小，驾车时要用一个大坐垫垫着才能看清车前的道路。

毕业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买了一辆全新的美国小房车，虽不是名牌却一用十年很少有毛病。到该换车的时候，他特别为我挑了架车身结实，座位舒适，式样美观的法国“标致”牌房车。他认为“标致”牌房车质量好，在南美洲是最受欢迎的汽车。怎知刚购入不久几乎每隔三二月要修理一次；不是线路有毛病，就是车灯打不着火。最吓人的是开着走着不知何故机头一下就过热。载着满车的孩子从演出归来的途中，夹在如蚁般行走的大街车龙间，突见过热红灯亮起，好似马上要起火爆炸，而在动不得停不

下的情况下，那种恐惧的心情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付了最后一次近3000元的修理费后，只得乖乖地换了辆我不喜欢的日丰田房车。本来汽车只不过是交通工具，是否名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要着火便走、熄火就停，我就够满意的了；特别是在下雪天，胆小的我一见漫天盖地的白雪，只希望自己拥有辆四轮吉普车。可是偏有不少人买车非名牌不可。

有个并不富有的只是打工阶级的朋友，为了养着一辆“奔驰”汽车，拼命省吃省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害得孩子老婆全无享受。我丈夫也是位看不开的先生。上一辆车是英“莲花”牌跑车，买时是全新的，还是全省最后一辆，为此他宝贝得没命。我进出车时他非亲自为我开门关门，不是为有绅士风度，而是怕我进出时把门压得太沉、推得太重而已。和他出外更受罪，为了寻找安全的停车地方他会七弯八拐地转，结果往往距要去的地点三五条街道之遥，把我气得七窍生烟。久而久之就干脆拒绝坐他的“自私车”。年前他换了辆“宝马”，虽已改变了以往紧张的表现，但我还是喜欢驾驶我自己的车；急驶快停，不用顾虑，车身碰了擦了也不过于心疼。我常劝说丈夫，有钱也不需要贵车。我还在说服他卖去“宝马”换辆丰田七人座车，以便我们舞蹈团出外活动。



民俗先驱——元胎先生

●陈建功

六十五年前

虔诚的朝山人流中五个虔诚的青年才俊

六十五年后

岁月的新旧交替间一位仅存的开路先驱

妙峰山在京西北80里处，旧属宛平县境。山上莲花金顶建有“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者，传东岳大帝之女也，宋真宗时被封为“天仙玉皇碧霞元君”。道教典籍则称碧霞元君乃应九炁以生，受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碧霞元君香会，明时以涿州、通州、蓝靛厂三处为中心，至清，则有金顶妙峰山之盛。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朝顶进香者，迤邐而来。近者来自京兆直隶，远者来自保定、张家口，更远者来自吉林长春。结伴而来的香客大多分属民间自发组织的“修路老会”、“路灯老会”、“茶棚老会”等上百个团体，早已在朝山前广照会启，周密组织。朝山既始，会众们整修道路，架设路灯，搭建茶棚。初七初八，渐入高潮。是时，妙峰山三条登顶进香之路，人流熙攘，幡幢迎风。为进香者施献茶饭者有之，向庙宇神明捐呈钱财器物者有之。修补铜锡瓷器以助人，送医赠药以济危，村歌社舞以娱神。有趣的是还有一“缝鞋老会”——专以义务缝补香客们走开了绽的鞋帮为能事……人人都是萍水相逢，交臂而过，人人又都肃然凛然，对每一位上山者都颀道“虔诚”，对每一位下山者都连颂“带福还家”。时不时还能见到那些举止更为惊人的香客：或一步一拜，三步一叩以示虔诚；或颈缚铅丝，悬之重石，以求神有；还有人登顶后一跃而入沟涧，愉悦地了其宿愿……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民俗事象，至少已在此上演了百年，不过，1925年4月30日（农历四月初八）以前，似乎未曾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惟自是日始，任教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顾颉刚、容希白



元胎先生近照
东密摄影

（庚），哲学系学生庄尚严、容肇祖（元胎）和《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五人，受北大民俗调查会之嘱，以虔诚的随俗态度混迹于虔诚的朝山会众中间，抄会启、录碑碣，访问香客，求教耆老，以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调查，为中国民俗学运动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难怪当年何思敬先生在读过《京报》副刊上连载的《妙峰山进香专号》以后，喟然而叹：“在这中华大陆上生活的有多少民族。他们的，尤其我们自己民间的宗教生活，固然历史也多少记了一点，但有些简直没有历史的记录。我们自己都不理解，也无可理解，并且也不想理解：对于这些东西引起知识欲是不值得的，且失体面的。有这情形，以致至今没有人来理会民间的宗教生活。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六十五年前参加妙峰山调查的五位学者，只有一位元胎先生依然健在，不过大约已有93高龄了。何君在电话里报告说：老人家岂止“健在”，还硬朗得很！听一位与先生同在社会科学哲学所的朋友讲，几天前，社科院大楼的电梯出了故障，老先生二话没说爬上了十层楼。这消息给我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欣喜了，当时也不知怎地就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来：当下便意气扬扬地给总主持人戴君挂电话，让她备车。我说我要动员老先生再上一次妙峰山。白发皓首来复去，何其壮哉。戴君的疯魔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不

待我说完，她便抚掌称快，说岂止要备车，还应该找摄像师、摄影家，甚至又何妨拉上几位当今才俊，编一期当代的“妙峰山专号”……我想，如果元胎先生在那次登临十楼的壮举以后，没有因感冒而留医10日，我们的雄心勃勃的设计也未必一定会遭到谢绝——因为当何君和我委婉地将这打算告诉他时，他的双眸分明闪出光来。然而他沉吟了一下，告诉我们他刚刚出院。随即老先生又和我们合计了一下往返一次妙峰山所需的时间，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算了。我已经93岁了，不敢轻举妄动了。”

何君和我相视而笑。

元胎先生毕竟老了。尽管他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谈了两个钟头——此间他的夫人没断提醒他停一停，至少也要听听我们想了解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几乎没能插上嘴。尽管他还不时地起身，去为我们寻找旧时的资料，而且兴致勃勃，步态稳健，我们还是应该想到，仅仅为了一点新闻效果，让这位鹤骨鸡肤，头顶仅剩几缕银丝飘拂的老人去登妙峰山，未免太残酷了。93岁的容肇祖不敢“轻举妄动”，丝毫不影响他28岁时的辉煌。

元胎先生1897年12月1日出生于广东东莞县，书香世家。先生出生之日，即其祖父仙逝之时，因名念祖，后改肇祖。肇祖11岁丧父，其母率兄妹六人依靠伯父与舅家生活。幸其父作恭先生留下藏书颇多，使遗后得以泛览自学。而其舅父邓尔雅先生亦饱学之士，早年留学日本，思想活跃，擅诗词美术，篆隶书法，对金文、甲骨文均有研究，还有小说作品见称于世。不难理解元胎先生的胞兄容庚、胞妹容媛，后来何以在金文学、青铜器研究方面作有突出的建树了。元胎先生在舅父的诱导指教下，当然亦得精深的国学修养和开阔的视野思路，不过他学术上的偏重，似与兄、妹有所不同。元胎先生著述颇丰，文学、史学、哲学无所不窥，尤以研究戴震、顾炎武、李卓吾、廖燕等叛逆学者，发掘进步文人潜德幽光为己任。有趣的是，容氏兄妹三人都对民俗学有相当的兴趣。希白、元胎同为早年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活跃分子，后又同为妙峰山调查的参加者，容媛随后亦参与民俗学运动，和元胎先

生一道，作过东莞关帝庙调查。容氏兄妹中，后来与民俗学运动关系最密者，当然还是元胎先生。1926年先生执教席于厦门大学，与顾颉刚等人筹划成立了厦门大学的风俗调查会。1927年到了中山大学，不久又在顾颉刚先生的推荐下，任首届中大民俗学会主席。1936年元胎先生回到北大，仍是北大风谣学会的中坚。直到1978年秋，元胎先生还与顾颉刚、白寿彝、钟敬文、杨成志等六位教授签名上书，呼吁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先生至今还担任着该学会的副理事长。

英人汤姆斯所创“民俗学(Folklore)”一词，于1913年由日本传入中国。我国经子史集中，自然早已有不少民俗事象的记载。东汉班固、应劭，清末黄遵宪以及清末民初的张亮采，更有不少风俗研究之辟见。然民俗学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似应归宗于1918年2月1日北大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在蔡子民先生的支持下发起的“征集全国近世歌谣”活动。同年五月，《北京大学日刊》自第一四一号起逐日发表征集的歌谣，颇为激动了一批思想活跃的学人。周作人、顾颉刚、魏建功、李守常、常维钧、罗家伦、关延龄、郭绍虞等，都先后参与征集探讨之举。两年后便有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又二年，北大《歌谣周刊》创刊。到了1923年，1924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会”、“方言调查会”先后成立。中国的民俗学运动就这样走上了学术舞台。

1922年秋，容庚先生以著有《金文编》成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此前已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英文专业的元胎先生，为新文化浪潮所震动、吸引，辞去中学教席，随其兄北上，考入北大哲学系就读。容氏兄弟在家乡时，因邓尔雅之影响，对俚语、风俗早有很浓兴趣，进入“兼容并包”的北大，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得到在国学门任助教的顾颉刚先生的启发，成为民俗学运动的健将势所必然。1924年1月30日，在周作人主持的歌谣研究会常会上，容氏兄弟入会。元胎先生在发言中已对搜集歌谣的同时，建议说：“对于国中类似的初民的风俗，更要切实的调查。”

今日，民俗调查对于民俗学者来说，已是天经地义之举。然1925年4

月30日，顾颉刚、容希白、容肇祖、庄尚严、孙伏园五位，脱去洋装，混迹于朝山进香的人流之中，同道“虔诚”，同祝“带福还家”，同焚表，同跪拜，事后还写成洋洋洒洒20万言，堂而皇之见诸报章，是需要勇气和见地的。不然顾颉刚就不会在《进香专号》引言中针对“提倡迷信”、“吃饱饭，没事干，闲扯淡”之类的指责非难而“预先拟出一个答辩”了。不过，如今重新翻检《进香专号》和1928年汇编成的《妙峰山》一书，给人感觉最强烈的，倒是五位学人初入民间，眼界大开的狂喜，有如阿里巴巴走进宝窟般的震惊。更使人折服的是，他们站在各自所处的学术角度，面对俯拾皆是民俗材料，对朝顶进香事象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观察研究；充分显示了我国民俗学先行者们方法上的成熟。顾颉刚的《妙峰山的香会》一文，对香会之源流，明代的碧霞元君香会以至清代的妙峰山香会作了详尽的考证，对妙峰山香会的会启、会规、组织形式、办事日期、办事项目及至所能搜集到的团体名单，都有周详的描述，还附有搜集的“惜字老会会启”，绘“妙峰山娘娘庙殿宇略图”。真正显示了集史学家、民俗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才华。长于考证的容庚先生，则作《碧霞元君庙考》，分别考证了“碧霞元君之起源”、“碧霞元君庙之起源”、“碧霞元君庙宇之盛”。元胎先生当时十分关注心理学的研究，因作《妙峰山进香者心理》一文，对进香者的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文中叹曰：“宗教信仰，有形式的，打破尚易。没形式的，打破实难。”这使人想起先生在他的民俗学专著《迷信与传说》自序里说的：“我们拼命高呼打倒某种迷信的时候，往往自己却背上了一种其他的迷信。”60年前即有此鞭辟入里之见，不能不令人叹服。庄尚严先生则是将三日考察行踪，写成日记，公诸于世。内中翔实地记叙了每一日里程的路线、气候、景物、见闻，为后人研究五学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材料。《朝山记琐》则出自办副刊的孙伏园的手笔，用调侃、幽默的文学笔法，更多地抒写了朝山的主观感受，有着与学究们迥然不同的浪漫气息。文章之末，孙伏园写道：“我们于香客的缺少知识觉得不满意，对于乡间物质生活的低陋也觉得不满意。如果妙峰山的天仙

娘娘真有灵，我所求于她的只有一事，就是要人人都有丰富的物质生活，也都有丰富的知识生活与道德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决不会迷信天仙娘娘是能降给我们祸福的了——但我们依旧保存妙峰山进香的风俗。”——这大概就是只有文学家才有的浪漫了。……从笔者读过的几篇有关“妙峰山调查”的文字看，论者大多从其开创的功绩，随俗的态度等方面估价这一事件对民俗学运动的深远影响，这无疑都是对的。不过我以为，顾颉刚们对同一民俗事象的考察，如此自觉地采取了这种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的探寻与察考，似应引起更多的重视。或许，正因为《妙峰山进香专号》以这样一种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民俗调查才充分显示了它的学术品位，显示了它独特的魅力。这种使那些非难和指责不攻自破，带动了学术界的“民俗调查热”，把我国的民俗学运动，大大推进了一步。

晚生之辈读书的一得之见，本来是很想向元胎先生请教的。可是，两个小时，只有元胎先生滔滔不绝的份儿，插话尚无缝可钻，更不用说根本没机会详陈陋见了。我也只好改变战术，待元胎先生喘气的功夫乘虚而入，询问一些妙峰山调查时的花絮，以期引起先生更具体的回忆。我从不少资料里获得的琐闻，居然大多得到先生的印证。心中不免感叹：元胎老矣，不敢妄动，然百岁老人，能做到这样的，又有几人？不过，只有一件事元胎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我说：“容先生，我看庄尚严的《妙峰山进香日记》，说您和希白先生当年走得最快，他和孙伏园每每跟不上啊。”元胎先生说：“不对不对，我可不行！我的身体最差，我哥哥知道。走得最快的是顾颉刚，一会儿跑到这儿抄会启，一会儿跑到那儿录碑文，我们兄弟两个总觉得瞠乎其后者！”

事后我对何君说：“老先生也难免有糊涂的时候——庄尚严当年的文章明明记着这事的呀！”

何君笑着说：“《世说》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我想他们当年都是这种感觉的。自己一心把想抄的都抄下来，把想记的都问个透，自然都是看着别人快的。如获至宝的感受，倒也可见一斑了。”

我想他的分析是对的。



本期封面人物：

中央电视台青年节目特邀主持人 竞赛第一名——许戈辉写真

卢弘

今年5月3日，我正客居外地，看电视时忽见其中有个熟人。看着看着忍不住指着那个荧屏中人对人说：“这丫头，我瞧着她长大的！”

“这丫头”就是中央电视台青年节目特邀主持人竞赛首奖金杯获得者许戈辉。她，小名大辉或大灰，我的孩子叫她“大灰狼”——比猫更可爱的“狼”。她是学外语的，外事活动中洋朋友常叫她“灰灰”。几年前她用大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后，不少读者致函称她为“哥哥”、“叔叔”和“先生”。这位“先生”4岁时，有次来我家，见邻居是位瘦小个女同志，张口就赐以雅号：小脸蛋儿。使被听和听者都哭笑不得。我每次见她总要引她露一手，唱歌跳舞不在话下，画个小人自有神韵，尤其是学广播里（那时她家还没电视机）陈永贵副总理做报告，一口老西腔，使她这稚嫩小妞和那位高级老汉合二而一了。……

后来她上学了，上的是外语学院附属小学，接着升至附中。1984年她中选参加中美学生夏令营，由此开始了“外交生涯”。有回他们集体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个美国学生指着展厅中的毛泽东塑像问她：“毛发动文化

大革命，害了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恨他，还供着他的像呢？”灰灰答道：“你们的里根，不是也有过错误，怎么还当了美国总统呢？人不能一有错误就什么都不好，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错了，但是他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这个功劳很大，人民仍然尊敬他。”这是政治对话。夏令营去内蒙古草原时，晚会上每人要出个与草原有关的节目。她演了个“小品”：独自站立中心，一手曲臂高举，不断扭动全身，时而要倒伏，时而又挺立。人们不解其意，她说这叫“风中小草”。众皆大悟，拍膝叫绝。此行她写了一部日记，选抄几段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

此前她已在《中学生》、《少年文艺》等报刊上，几次发表作品并获奖。凭着这点资本与自信，北京成立中学生通讯社，她得知要招考记者，连忙赶去。那里正进行最后的考核答辩，通过辩论“代沟”问题，检验应试者的思辨才能。正当几位同龄人慷慨激昂地抨击长辈们不理解他们时，半道插进来坐一角倾听的她，忽然站起来说：“不能只讲长辈不理解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又理解长辈多少呢？”她说了自己的体会后道：“也许我们长大了，才能





真理解自己的长辈们。”主考人闻听此言不同凡响，忙翻着报名单问她是几号，她笑道：“我没号。”于是，这个后闯进来的“号外”，未经报名初试，便一举成为“中通社”副社长且连任几届，直至高考升学才“退休”。其间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小有影响的通讯、散文和调查报告等等。

正上初中时，一年“五·四”青年节，人大大会堂里举行青年演讲比赛，她爸为她找了张票好去受教育。她在台下听了一阵，当几位参赛者讲过，她忽然径直跑到台上，也要发表演说。主持者问她姓名后见查无此人，但被其庄重热切之情打动，破例让她讲讲试试，还为她把麦克风降下了一大截。不料她一鸣惊人，才说了几句话就掌声雷动。她说自己昨天刚刚加入了共青团，并且马上被选为团支书，成为“中国青年行列中值得骄傲的一员”。结束语则是王蒙小说《青春万岁》中的如火如荼诗句，燎得人大大会堂中人人兴奋。最后颁奖时，这个自己闯上台的“号外”演讲者，被临时颁发了一个“特别奖”。

大灰真象“狼”样的不安生。一年暑假中，有对来华旅游的德国小夫妻，由于住不起宾馆请不起导游，自己用英语到处问路找地方，正巧被她碰上，主动为他们义务服务，陪他们逛遍了北京。那对夫妇临走时要重谢她，她却笑拒道：“不，我要谢谢你们，给我机会练了几天英语口语。”1987年夏，她见一处贴着招聘英语教师的广告，又闯了进去，人家以为她是来报名学习的，她说：“不，我是来当老师的。”见对方满脸惊疑之色，又正色

道：“我已经学了十年英语，不信当场考试。”一试之下，应答如流又妙语联珠，她如愿以偿，成为四十多位从头到年龄都远超过她的学生的娃娃老师。一期下来，她的学生们都恳请许老师继续执教，甚至登门去求她。当时她才是个高二学生，曾为此写作并发表了《初为人师》一文。

此后每个假期她都闲不着，不断“自谋职业”，同时学会了英文打字、微机、电脑、计算机等等，都能使用操作，还接受了不少约稿、译稿和编书任务，抽空听完了交响乐知识讲座，又曾闯进一个只收博士生、硕士生的高级研究机构干了一个假期，还闯到旅游局当业余导游，陪外宾去西安等地逛了一大圈。1990年在我国举行的多国参加的“首届国际民间艺术节”，她又当上了英语报幕人……。她一个假期换一个职业，不只领教了许多专业不同、性质各异的单位，还按劳取酬地积下了一笔“私房银子”，并曾孝敬我以“味道好极了”的雀巢咖啡。只是她对我为人写书立传的行业并不恭维，曾吼之为“御用文人”，不过又庄严宣告：“为你作传，非我莫属”。可惜她学习任务重，外事活动多，她的宏愿不仅尚未兑现，我连见她都难了。这不，她一下子又闯进深入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中去了。

目下，她还是北外英语系四年级英法双语班学生。今春中央电视台举行青年节目特邀主持人竞赛时，学校推荐了她。她一面照常学习，一面通过了初试、试镜头等关卡。复赛那天，她直到听完最后一节课，才匆匆赶往电视台，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更别说描眉涂唇做发型了，毫未修饰和风

尘朴朴地，又一次闯进一批经过精心装修打扮和反复设计排练、早在酝酿情绪并已进入角色的妙龄佳丽和潇洒俊男群中，他们许多是艺术院校师生、获奖歌星、公关小姐、时装模特儿和活跃的记者以及名诗人等等。她“旁若无人”地通过了复赛，结束后又埋头于自己的作业中。有人跑来告诉她已获复赛第一名，她茫然问道：“是倒数的吧？”使人对她如此不以为然十分不以为然。

下余的事，全国亿万人都从电视中亲眼目睹过了。她与被誉为“青年偶像”的汪国真编为一组，比赛中她的机智应答、出语不凡和纯真仪态，使列位倩女才子包括与她同组的名诗人，都显逊色。最不易的是关于足球、筷子和辞海的临场发挥，她说得那么自然、贴切又富有哲理，如果不眼见她那副小样儿，真会以出自一位知识渊博、经历丰富的老将之口。如此这般，本次竞赛的首奖金杯，顺理成章地落入她的手中，家人友人无不为之得意，连我都觉得沾光生辉了。不过麻烦也就来了，从此她就安静不了了，一批批报刊记者、摄影家、影视界和崇拜者、追求者等等，都盯上、围上、缠上她这个初露头角的热点人物……。幸而她自己反而“凉”了下来，对周围一切皆都淡然置之，见人还是那副小样儿甚至傻样儿，只是有时微眯起眼睛遐想着什么，似乎在打算着，下一次又该闯向哪儿去。

（本文及封面许戈辉照片均为洪福摄影）

象尊



博物馆

邢军纪 曹岩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各地不惜巨资兴建了大批博物馆，收藏了极为丰富的珍贵历史文物，形象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炎黄文化的灿烂成果。只是好事多磨甚至多灾多难，各博物馆不仅内部积难重重，又加外部劫难累累，珍品被盗，国宝流失，每个爱国念祖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为之心疼震惊。本文作者以沉重的笔调揭示的大量事实，望能引起全社会以至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

掠夺是博物馆诞生的动因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之子亚历山大，用自己的剑和投枪当作欧亚黑色大地传播文明的犁铧，一边播下希腊文化的种子，一边又用自己的战车拉回难以胜数的战利品。他把这些东西送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让他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天才的橱窗和书架上放着血染的礼品，文明于是就飞翔在他的讲台上。后来，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缪斯庙，亚里士多德书架上的那些东西大都放置在这里，这就是最原始的博物馆。在缪斯神庙里，还收集着托勒密王朝世代巧取豪夺的万国珍品。万王之王的君主托勒密，把他的梦境移植到现实世界中，这就是他的缪斯。博物馆至尊的位置从它的诞生就规定好了。在古罗马时代，和平宫殿里则收藏着战争的对应物——美丽的艺术品。博物馆不仅收藏炽烈的太阳，也收藏柔和的月亮。大面积的光明和大

面积的黑暗同时并存，这就是博物馆的特色。

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天府掌祖庙之守藏”，王府秘藏金玉玩好之风，形成中国博物馆独特的风格。《隋志》记载隋炀帝“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玩文’殿后。”收藏珍品是人类特殊癖好，而皇族尤甚。北宋皇室收藏文物多达万件。而法国、德国、意大利、德国等中世纪教堂都开辟有珍品室。那些虔诚的传教士，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神圣的教义，却须臾不忘收集珍品。著名的威尼斯圣·马克教堂、德国的哈雷、瑞士的圣莫里斯修道院，都以收藏文物而闻名。

博物馆的青春是随着大工业的蓬勃一同发育的。不管是大不列颠博物馆抑或是法国的卢浮宫，或者是德意志科学博物馆和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似乎都能在它们成长的轮上看到那种汁液浸泡过的痕迹。博物馆实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个忠实而又勤勉的记录员。

美国人海伦·凯勒说：“我想看看人类进步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看看历代兴衰和沧桑之变。这么多东西怎么能压缩在一天之内看完呢？当

何尊



里的忧思与警报

然这只能通过参观博物馆。”海伦·凯勒是个自幼双目失明的人，但她最终成了一名著名的学者。她在那篇著名的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说，如果有某种奇迹使他见到光明，她将要一整天时间去博物馆！

对博物馆魂牵萦绕的不仅仅是象海伦·凯勒这样的人，还有一些心怀叵测的盗贼……

失而复得的国宝

1988年6月4日。夜。11时

从宜昌开往秭归的轮船到岸了。码头上灯火阑珊，石板路上三三两两行人。这个一半江水一半山的城市，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

踏着跳板，从轮船上窜下来两道黑影，两个不速之客很快融进深重的夜暗。

屈原纪念馆里，永世屹立着一个不屈的灵魂。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吟诵着不朽的名篇《离骚》，想象着一个冰清玉洁的形象。

此刻，屈原没“睡”，看护屈原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却鼾声如雷。两个值

班员用自己不息的鼾声迎来了两个盗贼。

这两个盗贼一个叫栗金飞，一个叫李建新。

李建新翻墙入内，手持管钳，直奔展馆大楼。栗金飞留在外边接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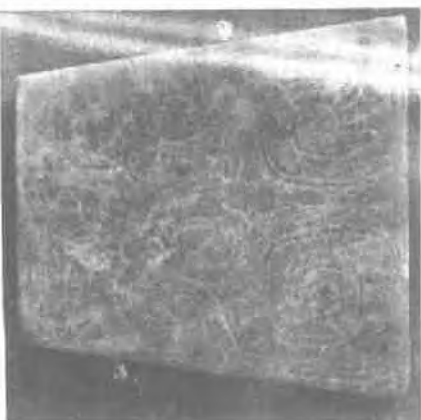
由于作案心切，李建新把钳子“当啷”一声掉在了水泥地上，这声响回荡在展馆的大厅里，这偌大的响声却没惊扰馆内工作人员的酣梦。李建新看并无事体，便放下心来，撬开了展室的大锁。一楼文物不多，大都是文字图表生平介绍之类的东西，李建新直奔二楼文物大厅。

二楼的“铁将军”要比一楼的结实多了，李建新用尽了力气，想尽了办法，也奈何它不得。李建新转身跳进院内，按着栗金飞的指点，找到了放在值班室窗下的梯子。他直接攀上二楼，划开玻璃，从窗户跳进了二楼展室。直奔那件“西瓜敦”。这是他俩觊觎已久的东西。他们虽然不懂文物，但从它的“待遇”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在这个展室里，它的位置最突出，而且被一个漂亮的玻璃展柜装着。李建新摸到了展柜的锁，拿出大号螺丝刀，狠劲撬起来，但螺丝刀撬弯了也没撬

折翼



玉佩饰



开，他想划玻璃，但玻璃奇厚，怎么也划不开。李建新看看窗外的天色已近黎明，立时恶从胆边生，他顺手抄起古剑柜里的一把剑，撬开了展柜。这把剑就是有名的“越王剑”，没想到“越王剑”竟被派作这样的用场。这个战国铜敦终于放进了他的旅行袋内。李建新环视展室，觉得意犹未尽接着，又把几柄编钟塞到了袋里……

就这样，世界震惊的1988年6月4日，秭归屈原纪念馆大窃案发生了……

1989年5月26日。北京。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彭常新副主任画外音：

湖北秭归屈原纪念馆的战国铜敦，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即将拍卖的消息是198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披露的。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华人的注意，认为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11月14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6届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方法的公约》。根据这项公约精神，美国国会于1982年12月通过了一个《文化财产保护公约实施法》，实施法明确规定，非法盗窃得来的文物任何个人和博物馆都不得购买，拍卖行亦如此。

当我国国家文物局通过国际刑警国家中心局和美国国际刑警国家中心局取得联系后，美方立刻通知了索斯比拍卖公司，制止了这次拍卖活动。

1989年4月的一天，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客机，平稳地降落在美国西部城市西亚图。

比张德勤一行更早到达美国的是中国的天子艺术展览中展出的百多件文物。它们是一群富有灵性的文化特使。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把它们视为中国数千年文明的使者。它们的到来，使一向具有优越感的美国人体味到了什么叫真正的优越。

中国天子艺术展在西亚图市展出了5个月。每天接纳观众的人数都在6千或7千人，这个数目，在美国，尤其是一个中小城市，是相当可观的。市民们把参观当作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见，仿佛那些文物不是被动的东西，而

是充满生命的主动，向美国人民倾诉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中美人民在这里进行着会谈、交流。中国文物把许多暗示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通过自己的形体和造型告诉美国人民。美国人是聪慧的。他们自然会体悟到中国文物深刻的妙处，因此，中国天子艺术展对西亚图市民来说几乎是人人参加的必修课。

美国人终于发现了远古的阳光。当西亚图还笼罩在愚昧的暗夜时，在东方，中国已经发出农业革命璀璨的光芒，长达1000年、2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它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面对中国文物不得不扼腕叹息，自愧不如。他们被中国古老的文化折服了。

西亚图的展览还没结束，哥伦布市就前来接洽，欢迎中国文物前去展览。

张德勤局长来到哥伦布市时，欢迎晚会非常隆重。有人为晚会起了个具有双重意味的名字：哥伦布在一起。如今，美国人又一次发现了中国。

前来参加晚会的有俄亥俄州州长、夫人，哥伦布市市长、夫人，州参政两院的议员、大法官、政界、文化界要人共400多人。虽说晚会的名称是和“哥伦布在一起”，但谁都知道，隆重的原委主要是因为拥有灿烂东方文化的中国人，而不是哥伦布，或者说不仅仅是哥伦布。

州长致欢迎词之后，张德勤局长代表天子艺术展览委员会发言。

他谈到天子展的成功，谈到热爱文物的美国人。谈到了中美文物界紧握的双手。但更多的是充满浓情地向美国人介绍他的祖国……

当张德勤用英语喊出“中美两国友谊万古长青”这句口号时，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张德勤局长几乎是在美国朋友的簇拥下走下讲台的。这是美酒和笑语的丛林，掌声像阳光一样温暖着他的心。这时，不久前在湖北秭归丢失的战国铜敦又闪现在他的脑海。他端起酒杯，向我驻美领事走过去……

1988年9月3日夜。

河南省博物馆。

夜半，一条黑影从博物馆前的雪松下闪出，狼一般扑向馆内……

“砰”一声，大门上的玻璃被打得

粉碎。

罪犯实际不是偷盗，而是抢劫。

击破玻璃的声音在夜半时分传得很远，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使这个城市醒过来。

博物馆设有现代的监测设备。警报系统却很起作用，自罪犯进入博物馆的一瞬间，警铃便骤然响起来。

听到铃声，值班人员跃身而起。但是，他们搜遍了博物馆最僻静的角落，却连人影也没见到。有人怀疑警报系统是否坏了，找来电工检查，证明警报系统完好。这时，他们才突然想到大门前厅同样会走进不速之客……但是已经晚了，陈列室一片狼藉。河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西周铜方壶被盗走……

让人尴尬的是，3天前，即8月31日夜，河南省博物馆曾经失盗过一次，罪犯装了满满一袋文物正要出馆之际被发现了。3天后，河南省博物馆仍在惊悸之时，又被罪犯捅了一刀……

（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孙传贤馆长画外音：

我们博物馆过去文物安全问题包袱不大。但是自1983年以来，出现了危机。那一年，我们的文物被盗了五、六次，1988年8月31日被罪犯偷了一次，没得手，9月3日这伙人又来了，偷走了西周龙纹铜方壶……据公安部门透露，湖北秭归战国铜敦被盗窃案就是他们这伙人干的，他们是个盗窃文物团伙，有13个人。他们偷了西周铜方壶后便连夜坐车到了开封，然后又又在山东菏泽潜伏了18天。之后，他们又专门买了一辆机动三轮车运回到了湖北监利县老窝，最后，据说以5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香港的文物贩子……

正像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孙传贤说的那样，盗窃西周铜方壶的罪犯正是盗窃战国铜敦的李建新一伙。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这伙丧心病狂的文物窃贼，跑遍了长江黄河流域，跑遍了西安、郑州、开封、洛阳、宜昌、沙市等10多个城市，先后偷了四五家博物馆，几乎囊括了半壁河山……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副主任彭常新

画外音：

当美国索斯比公司拍卖行接到中方通知后，十分恼火。当然，它们不希望被拍卖的文物笼罩上邪恶的阴影。于是，它们在11月29日中午立即通报我驻美使馆，决定中止战国铜敦拍卖活动，并且答应说，如果中方能够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该铜敦是中国被盗文物，索斯比的委托拍卖人愿意无偿地以捐赠形式归还中国。

拍卖行的行规规定：对提供货源的人要十分保密。但若按公约交还铜敦，索斯比还要交纳一定的费用，为了使其公司的利益不受到损害，索斯比又愿意配合主权国家，要求美国警方查获此人……

美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使馆、公安部、外交部都在同一时刻运转起来——一个超国界行动开始了……

1989年3月28日，我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国家文物局，美国司法部律师日前告知他们，索斯比拍卖行已把铜敦转交给纽约海关……

为了使国宝早日归还中国，4月2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张德勤局长以主持天子展的名义直飞美国，挂帅亲征……

张德勤局长牢记着自己的使命。

出国前，关于战国铜敦的事，国家文物局已经召开了数次会议。这一次来美国，他的使命是务必把战国铜敦归还中国的各种障碍打通，使其顺利回国。

他想起了那个精灵。

这是个圆圆的球状似的东西。它像足球，又像西瓜，因此，有人也叫它“西瓜敦”。它是1974年10月30日在秭归县屈家坪战国墓出土的文物。铜敦高23公分，重2.5公斤，通身蟠龙乳汀花纹，云云涌涌，玲珑剔透，虽历2400多年，仍光洁如故，清亮如许。

张德勤早已触摸过它多少回了，虽然在梦里，在心里，但他对铜敦并不陌生。他看过它的照片，那照片是铜敦在秭归出土时入库的四幅照片，铜敦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他都记得真切，尤其是索斯比拍卖介绍上提供的彩色照片，他看得更加动情。那铜敦像个活物似的看着他，每个花纹既像

眼睛又似嘴巴，它在呼唤着，呻吟着，谴责着。张德勤感到一股又苦又涩的东西直往心里翻。

在美国国家博物馆里，张德勤不忍卒看中国文物。那是一个个被玻璃展柜展示的已死的精魂。它像祭品般唱着黑色的挽歌。每件被展示的中国文物后面，都有一段难以言述的隐痛和屈辱的往事。往事不堪回首，可是今事也不堪言表。有几件中国文物。竟是80年代的收藏品！

张德勤局长不由得想起为了堵塞盗窃文物“黑洞”的那些日日夜夜……

1988年12月1日。

湖北省公安厅经过数月侦查，终于把战国铜敦大案的侦破营盘搬到了湖北省监利县。

监利县紧傍长江，水秀山青，荷红柳翠，是个美丽的所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盗窃文物的犯罪团伙就在这里潜伏着。

此案已经几起几落，先后由秭归、荆州、沙市、宜昌、四川云阳等公安局经手侦破，当接力棒传至监利县公安局时，有两项重大的成果也传到了侦破人员手里：罪犯作案用的管子钳和作案时留下的手印。

拨开层层迷雾，侦破人员的视点集中到了爱民路段上。

这似乎是最后一网了。就像捕鱼那样，所有的都是铺垫。那网赶来赶去，总是把鱼赶到一隅，然后再一网收了去。而现在，便是那网收鱼现的时刻。

收网的时候，鱼大概都会有预感。

李建新这些天总觉得什么都不对劲。仿佛这个世界全被塑料薄膜罩住了似的，看什么都像假的。老婆是假的，钱是假的，房子里东西是假的，连自己似乎都是假的。这些天，他又干起了用机动三轮车拉脚的买卖，每天好几趟，他坐在车上，听着突突的马达声，看着乘客的身影，伸手接过递来的钱，一张张数数再装进自己的腰包，这些过程他都觉得像在水里进行似的，既模模糊糊，又稍纵即逝。

只有梦中才最真实。他一遍遍重复着作案时的梦，他怎样像壁虎般贴在屈原纪念馆二楼，怎样从河南省博物馆抢走那件铜壶，又如何坐着机动三轮车往家赶，总是梦到后面有人追他……

第二天，李建新吃中午饭时看见一个人影一闪进了院子。仔细一看，他认出是城区派出所副所长。他觉得有事了。正像梦中那样，不过这次不是追他，而是要用他的三轮车。

“建新哪，麻烦你一趟，用你的三轮车跑趟金州，给咱所拉几罐煤气。”

“行呵，还劳驾您跑一趟，让人说一声我就给你们送到……”

平时他李建新最恨最怕的就是这些警察，可今天不知是咋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他吃完饭，嘴一抹，就驾车去金州，车上装着几瓶煤气。副所长对他很客气，李建新也觉得相互之间很融洽，看来这趟煤气没白拉。

车到金州，副所长指引着车三拐两拐，来到了村民警队部。李建新跳下车，想帮副所长搬煤气罐，刚要开口，便见副所长向他亮出一张东西，他仔细一看就傻了。那是一张逮捕证。他还没醒过神来，唿啦一声从斜刺里窜出一群公安人员，非常麻利地把他的手铐了起来。

李建新终于像条狗似地爬在地上，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行，供出了主犯栗金飞。

不久，栗金飞在监利县被捕。至此，战国铜敦被盜案终于真相大白。

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彭常新副主任画外音：

铜敦案犯一伙销脏的黑道有两个，一是通过岳阳人王元清的关系，他认识广州一个叫陈金明的人，陈金明又认识香港一个叫阿金的人，通过这条线，他们把张飞庙的编钟卖给了阿金，得了6万元，接着，又把战国铜敦卖给他。这次，阿金欺他们不懂文物，仅以3.6万元便把这国宝买了去。而阿金他们再倒一次手，到了美国，就会卖到几十万美元。栗金飞一伙隐隐觉得自己吃亏，便聪明起来，又找了广州一个叫李忠明的人。李忠明似乎比阿金更胆大心野，认识不久，栗金飞便卖给他6件文物，以4万元成了交。西周铜方壶得手后，栗金飞兵分两路，一方面约李忠明北上监利看货，另一方面让王元清带照片去找陈金明，看这两个黑道谁出的钱多便给谁。阿金看过照片后当即愿出80万元成交，让栗速带货去穗，谁知把货带去

后，阿金怀疑此物是偷来的，来路不正，若是被发现，那可是掉脑袋的事，无论如何也不敢买了。阿金一退货，粟金飞当即又找到李忠明，李忠明找来两个港客，最后以53万成交（50万港币，3万人民币）。粟金飞给了李忠明2万港币，1万人民币。回到监利，又给杨同新2.5万元，李建新1.2万元。战国铜敦被卖后，李建新仅得了1200元。粟金飞把李建新这个文物大盗狠坑了一下。

香港方面的黑线还没弄清楚，不知那个委托人是谁，是否幕后另有一个人……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汤兴伯给张德勤打来的电话。

那个离开祖国已数月之久的铜敦就在纽约。而汤兴伯理所当然地成了它的守护者。为了国宝早日回归。多少个夜晚，他们守候在电话机旁，急切地交流着有关铜敦的消息。

“老张呵，我刚从索斯比公司C先生那里回来，通过他的关系，我准备去纽约海关和他们面谈一次……”
“那好，那好，还需要我们配合什么，请您指示。”

这是中国文物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利用外交手段干预的一次事件。它不仅关系着中国的荣誉，也是一次与国际文物走私集团的较量。它的成败，将会深刻影响到中国文物的命运。张德勤一直把它看作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虽然它不声不响，却惊心动魄。

经过多方努力，纽约海关答应将战国铜敦归还中国。半个月后，纽约海关进行了简洁而又严肃的战国铜敦交接仪式。汤兴伯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文化领事王家栋和纽约海关侦保部的拉法先生，分别代表两国在文物交接处理单上签了字。陶正刚代表国家文物局对铜敦进行了鉴定。鉴定后，确认此铜敦就是去年6月在湖北秭归屈原纪念馆被盗走的国宝。

当汤兴伯领事从拉法先生手中接过铜敦时，大家热烈鼓掌表示祝贺。这次国际间的成功合作，将有力地遏止日益猖狂的国际文物走私活动！

5月28日，陶正刚带着国宝从美国哥伦比亚市乘飞机经芝加哥、旧金山、

东京回国，于29日晚到达北京。辗转海外的中华瑰宝——战国铜敦终于又回到祖国的怀抱。

国宝虽然失而复得，但却给人留下诸多反思……

失而难以复得的国宝

“1987年3月8日，我部在审查‘12·30’特大走私案的有关成员黄庆祥时，黄揭发：陕西省金属结构厂退休工人管理科干部肖建国有一武士俑头要出售，并在1986年7—8月份曾到肖建国的办公室亲眼见过，不像是复制品。办案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外领导做了汇报。领导批示立案侦察，定为“三·八”倒卖走私文物案……”

——摘自《关于侦办××走私秦武士俑头特大案的报告》

3月22日中午。

西安新城广场东南侧青少年宫门口。黄庆祥立在少年宫门口，焦急地等来了肖建国。

“怎么样，买主找到了吗？”

“找到了。”黄庆祥也四处看看，然后回答。

“可靠吗？”

“可靠。”

“什么地方人？”肖建国一脸狐疑。

“老广。跑过好多趟生意喽。你看便知……”

“你我当然相信啦，只是买主的底细要弄清楚，不然咱们就全完了。”

肖建国又问：“那人现在在哪？”

“在宾馆。”

“你打电话约他出来，我要见他。”
半小时后，“买主”张越来到了晨钟酒家。

3人要了酒菜，边吃边侃。肖建国起初并不相信张越，交谈了一阵，见他对文物精通，不一会便解除了他的疑惑。

张越把手一伸，一副无限信任的样子握住了肖建国的手：

“实话给你说吧，你要的‘老广’是我表弟。那才是真财神。他让我先摸摸底，别的咱不敢说，我起码能当

表弟半个家。今天你老哥说一声，咱出个价，我相信你是个真行家，不会信口胡咧。你说吧……”

肖建国的脸由白变红，由浅红到深红，由于这急速的潮涨潮落，他从鼻孔里使劲喷出两股浊重的酒气，伸出了3个手指头。

张越看了看黄庆祥，又看看肖建国，把眼睛定在肖的眼睛上：“老哥，是不是要多了？”

肖建国笑笑：“多甚，你们到外边弄得更多。”

张越往后一仰身子，趁机看看四周，又把身子大幅度摆回来，说：“去年的价是8000……”

肖建国忙争辩道：“操他妈的，那是坑人的价，谁不知咱这东西是无价之宝呀。”

张越把手摇了一下：“咱们说句公道话，给你翻一番怎么样？”

黄庆祥忙圆场说：“老肖，我看咱们凑个整数，2万块，好不好？”

过了一会，肖建国往地下吐了一口痰，用脚蹭蹭，说：“2万就2万。”

张越：“好，那我得看货！”

当天下午6时，张越与肖建国在陕西省金属结构厂见了面，张看到了武士俑头。交货地点由肖建国定在西安市长乐坡交通检查站，时间为3月27日上午11时正。

3月27日上午11时。西安市长乐坡交通检查站。肖建国把摩托车停在马路靠南的电线杆旁，躲在一处阴影里观察动静。没有可疑的人。他往后看看，一个小伙子向他摆摆手，意思是平安无事。小伙子是他的保镖。

一辆出租车嚓地从他身边开过，吱一声刹住。从车上下来了非常神气的张越和另一个港派打扮的人。

事先规定，双方见了面后不说话，径直往东走，进了沪河公园后再商议。

现在他们并肩而行。肖建国走得很快，张越领着港派打扮的人匆匆跟进。

很港派的人偷偷打开随身携带的黑包，放在肖的面前晃着。肖这才停住脚，手伸进包摸了摸，确认是钱后，小声明说：“东西在摩托车上放着。”

等进了公园后，肖建国身后的保镖似乎发现了什么，忙叫住肖建国。二人耳语一阵后，肖才转身对张越二人说：“有人盯梢，咱们改变一下交货地

点，下午1点在我单位交货。”说完，肖建国扭头就走，几乎用跑步的速度走出了公园。

但是，还没等走到摩托车前，他便站住了。两个干警向他亮出了手铐……

对于肖建国的盗窃行为和走私行为最为愤怒、最为恼火的大概要数秦俑馆和秦俑考古队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两个单位在客观上帮了肖建国的大忙。

秦俑馆和秦俑考古队是俩个机构。但两家又很难分清。因为秦俑馆是一个遗址型博物馆，倘若待全部发掘完再展出，那要等几十年。若这样的话，许多人会等不到这一天。为了满足中外游客的需要，陕西省文物局就决定边发掘边展览。这个决定虽然不符合考古学的规范，但却符合广大群众的心愿，不能不说是一项英明之举。问题是两家虽在一处却并不一体，博物馆中既有本馆工作人员又有考古人员，这样就又一次出现了“隙缝。”

大厅里没有闲人，只有工作人员。这时，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你找谁？工作人员问。我找考古队的×××。来人一副很坦然的样子。工作人员看看他觉得这人好像在哪见过，模样好熟。再看看他，很潇洒可爱的样子，于是工作人员（我们把工作人员假定为女同志）便想多盘问他几句，逗逗他。她装着很警惕的样子问：找他干什么？来人就答干什么干什么，而且是对答如流。或者他会拿出工作证或介绍信：我们是联系单位，有急事要找他。他装着很急切很着急很可怜兮兮的样子说，求你啦，帮我找找。工作人员眼睛一瞟：我们也不是一个单位的，谁认识他。来人就打拱作揖道：那就放我进去吧。工作人员突然笑了，美目含情地一摆头：进去吧。于是来人便连声谢谢地走进了秦俑馆的发掘现场。

发掘现场并不是每天都人丁兴旺。有人病假，有人缺勤，有人公出，有人开会。于是，要找的人偏偏不在。来人要是事前把这一切都掌握清楚了呢，他知道这一天考古队的人大都不在，只有几个临时工上班，偏偏这几个临时工又有事，只有一两个在场。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发掘现场很大，并

且用三合板隔着，趁着堆积物的遮蔽，来人俯下身几秒钟的功夫，就可以把俑头装进早已准备好的袋子里，然后扬长而去。

以上所写的大概就是肖建国之类盗窃秦俑的一幕。为什么说肖建国之类呢，因为用这种方法进入秦俑馆的不仅仅是肖建国，而凡是能进去的人似乎都有可能盗窃秦俑头。因为到底有多少个秦俑，秦俑馆和考古队都说不清楚。

经过多次反复，后经文物部门多次鉴定其所偷盗的秦俑头，确属真品，肖建国终于被判处无期徒刑。

罪犯已经在押，而国宝则一去不复返，法律与盗贼的较量，究竟谁胜谁负？

死守乎，守死乎

文博战线最近之所以被人们关注，并不是它本身文化价值被发现的缘由，而是它的经济价值被发现所招来的后果。中央曾号召文物干部“要与文物共存亡”，国家文物局也要求博物馆人员要“死守”博物馆，大有人在阵地在的气概。尽管如此，全国各地博物馆仍然频频报警，屡有盗窃事件发生。请看1986年第一季度国家文物局公布的被盗情况：

1月8日，四川凉山彝族奴隶制博物馆被盗，罪犯盗走金镶马龙头，银马鞍各一套，金手镯一件及其它文物等31件；

1月12日，浙江省嘉兴市文物局在海宁县博物馆举办的《文物普查成果展览》被盗，丢失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玉器、铜器、瓷器等文物23件；

1月19日，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文物展览室被罪犯盗走日本友人赠送的礼物3件；

2月13日，沈阳故宫钱币展览室被盗各种古钱币105枚，罪犯被当场抓获；

2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西山摩崖造像一佛雕头部被盗；

2月14日、15日，河南尉氏县文化馆被盗走新莽时期“大泉五十”铜钱范；

2月17日，江苏省泰州市博物馆被盗走文物古钱币13枚，铜镜4件，

陶鼎1件，现代画1件，共计19件；

2月24日，山东省博物馆被盗走石涛山水轴、郑板桥兰石屏等古代绘画九幅，其中1级品1件；

3月4日，山东省烟台市博物馆展览室被盗走民主革命时期德国造手枪、望远镜2件；

3月7日晚，甘肃省平凉地区博物馆被盗。盗走唐代鎏金铜佛（2级品）25件，约1市斤；

3月11日，河南省登封县文物保管所陈列室被盗，罪犯撬开护墙后，盗走武则天金简（复制品）、商代铜爵等文物3件；

3月16日，陕西省扶风县博物馆被盗，罪犯被当场抓获；

3月17日，河南省方城县文管所文物库房发现被盗，丢失银锭、铜铤、铜箍、铜鼎、铜镜、瓷等文物12件；

3月20日，沈阳故宫武警抓获一名携带作案工具、潜伏在馆内企图盗窃室内鎏金铜佛的盗窃分子；

3月31日，湖北省崇阳县博物馆被盗。盗走文物30余件，其中有梳妆盒、玉印盒、青花执壶、玉耳环、以及汉、新莽、宋、明、清等时期古钱币等。

在短短的3个月期间，就发生了16起博物馆被盗事件。在这16起案件中，地、县级博物馆占发案率的93%。地、县级博物馆应该是文博战线最前沿的滩头阵地，需要和文物共存亡的首先是它们。但大量事实证明，这些前沿阵地一个个失守了，在盗窃文物风潮中，它们相继一个个陷落了……

地县级博物馆（或文管所）的现状实在令人担忧。河南嵩县有3000多件文物，都堆放在文物仓库里，全县有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80处，但文物干部才1人。文物仓库的安全设施只有一把大铁锁，一条狗，还有文物干部一双警惕的眼睛。但一个人形单影只，常年死盯苦守，不敢离开半步。但谁家中都要有些事要办吧，他一离开，3000件文物便无人看守。所以，他一天到晚总是提心吊胆，总觉得不知哪一天便会大祸从天降。宜阳县有文物4906件，卢氏县有文物5000多件，也都只有1个文物干部。据统计，河南全省110个县中，文物干部仅1人而且经费不足1,000元的有39个县。

这些县的文物干部连发工资都困难，工作更无法开展。有的县文物库房陈列室的锁坏了，连换一把新锁的钱也没有；卢氏县的文物仓库将一个铜铃放在门上充当报警器；有的夜里值班，无钱买蜡；有的连买本稿纸的钱也没有。有的县由于没有文物仓库，只得把文物存放在厕所里。全省17个地市，9年无文物库房，110个县市，84个无文物库房或库房简陋。青海省省级博物馆才只有一条狗，其它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备。这只狗的饲养费也常有困难，致使这条负有安全使命的狗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经费严重不足，使文博单位濒临绝境。一个失去给养的阵地，它能维持多久？

河南宜阳1个群众向文物干部送交了1个陶狗。文物干部决定给这个群众以奖励。但他向这个群众实施奖励时才发现，他连奖励这个群众现金1元的数额也拿不出来了。同样是相同的陶狗，走私犯在灵宝县出的价钱是5,000元。博物馆是国家的，一个泱泱大国，却无力和走私犯竞争，这岂不是极大的讽刺？

地县级博物馆贫穷如此，省市级博物馆也是捉襟见肘。陕西省博物馆办公室秘书马骥同志说：现在文物征集越来越难。我们陕西省给的奖金还是比较高的，但仍然无法跟走私犯相比。比如1988年安康有1农民挖到1个铜簋，西周的，上面有92个铭文。有1个搞走私的以非常便宜的价钱从农民手上买到，走私犯拿不准，拿到西北大学请在文物、历史研究方面很有造诣的李学勤的研究生鉴定，这个研究生将铭文拓下给李学勤看，李说这铭文非常重要，记载了西周时对族的一次征战。并建议我们馆收藏。走私犯就拿着照片到我们馆，要价10000多元。而他从农民手里买时才200元。但我们过去没有这么贵收过文物。我们说10000元以下可以商量，我们1年征集费才30000元，1件文物就占去我们全年的1/3，实在收不起。最后终于没谈成，走私犯说低于10000元不卖。那个走私犯后来将铜簋卖给另一四川走私犯，在成交时被抓获。我们没有钱和走私犯竞争，只得靠他触犯法律时收缴。实际上这笔账还是国家吃亏。公安部门动用那么多人力、物

力、动用车辆、有时辗转数千里，不是一两万元就能下得来的，如果把这笔钱用来征集文物，不就少1个案件了吗？

由于经费短缺，现在征集文物基本上是守株待兔，很少下去。有些工作虽然开展了，但达不到应有的程度。如我们石刻馆的库房，你们看到会很痛心的。有些美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说：东西多了在你们这就不值钱了！有些很精美的石刻就放在露天或房檐下，上次赴日展览时，日本人来馆内接受文物时，看到我们这样对待文物，很觉得惋惜和痛心。

（笔者曾经到陕西省博物馆的“后院”看了看。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竟堆放了几十尊精美的汉唐佛像。它们有的横躺在那里，有的叠压在一起，有的站立着，有的歪斜着，它们歪七竖八，有头和无头的佛全都灰垢满身。它们所谓的藏身之处实际上连一般城市的自行车棚也不如。景况更惨的是有许多石雕由于容纳不下的缘故，都被“挤”了出来，挨着附近一所房屋的后墙排列着，由于风雨剥蚀，这些佛面部全都蒙上黑黑的泥沙，有的脸部和头部被房檐的滴漏冲得铁锈那样的颜色。）

我们馆的房子是古建群，最早的是明代建筑，大量是清代的，要增建房子又受到限制，加上经费问题，许多文物都无家可归。我们有一个壁画楼，原是专门存壁画的，但壁画占的面积大，库房又小，使许多宝贵的壁画都挤压在一起，加上没有空调设备，通风不好，使壁画损坏很大。唐代壁画只有陕西最完整，面积最大，艺术成就最高。倘若这些壁画坏在我们手里，真是犯罪。陕西出土的青铜器皿也最多，有青铜之乡之称。周原遗址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存放到馆内后，由于没有很好的保护措施，许多青铜器得了“白粉病”——一种有害的锈，使青铜器慢慢粉蚀，变成粉末状。这种状况多么危险！上级号召要死守，但一无经费，二无活力，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守死、等死……

河南省博物馆建于1927年7月，是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时一手创建的。那时的馆址还在开封。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中，河南省博物馆既有过花好月圆的艳阳天，又有过凄风苦

雨的寒冷日，但不管哪个时期，都没有今天这般心力交瘁。

早在1921年，地处黄河中部的这片土地就被一个叫安特生的外国人用地质勘察的小锤子给敲醒了。著名的震惊世界的仰韶文化在锤声中脱颖而出。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考古界近代考古的一个序幕。1923年，新郑县一家农民在李家菜园打井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这批青铜器几乎又培养了一代考古学家。在这批青铜器中，有著名的王子婴次炉，莲鹤方壶等一级国宝。当时驻郑的一个师长用自己的马鞭收回了这批文物。但他实在是一个少有的有识之士，他并没有攫为私有，而是在此基础上收集了许多他山之石——洛阳的唐三彩，南阳的画像砖之类文物，并成立了文物保护委员会，办了一个博物馆，后来，冯玉祥又提携扩大，使博物馆藏品仅次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想当年战乱中创建这样的博物馆，足见先人大义、眼光远大。从1928年到1937年，15次发掘殷墟，都是从这里走出的。那时博物馆和考古发掘都是一体，既考古，又发掘，又收藏。河南的文物考古事业就是从这发端，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这里也培养了不少象夏乃、邓作斌这样的考古学家。1937年，关拜一馆长第一次去英国办中国文物博览会，河南带了8件珍品，曾轰动英伦三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博物馆奉命转移，当时受蒋介石密令，秘密向武昌押运，然后乘船运至重庆。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运载文物的最后1架飞机没来得及起飞，后又将这批文物送到了北京故宫，莲鹤方壶就在其间。

解放后，河南省博物馆从开封迁来郑州。以后，受日月光华、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它藏品约11万件，展馆约8千多平方米。但是，就是这样一历史很久，资格很老的博物馆，现在已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1989年，河南省博物馆全年经费总额为37万元。全馆人员的工资为21万多元，水电费为6万元，锅炉房费用3万元，汽车用油费2万元，刊物用费2.5万元，文物保险合同费2.5万元，这些加起来就已经超过37万元。

出差怎么办？征集怎么办？研究怎么办？

河南省博物馆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惶惑中。下边的人问部领导，部领导又问馆领导，馆领导又去问谁？只有兀自对着清风发愁，对着冷月长叹。

逼命的不仅仅是这些。出差费没有可以不出，征集不来文物可以不要，研究进行不下去可以中止，既然上边有指示：能干就干，不能干就算，保住饭碗也就可以……问题是不仅仅是这些烦恼，还有各种各样的税收，还有街道办事处治安费，还有永无休止纠缠的是，今天让你去人帮助打扫卫生，明天又让你去人维持治安，你不去会惹恼它，它给你没完。街道上的人刚走，残疾人又来了，他们手拿鸡毛掸子问你要不要，你说不要他不走，你要得少他还不走，反正是他贴上了。残疾人走了，学校又找上门来，博物馆的孩子大都在一个学校上学，学校就派人来要钱，你不给，它就敢不收你的学生。河南省博物馆地处郑州市中心，因此四面八方都来揩它的油。馆里安电话，电信局来了人，从楼下安到楼上，长不过七八米，他向你索100多元钱，据说这还是面子事，因为事先已经请吃过。电业局管着电，自来水公司管水源，交通局管你的车，这些单位博物馆都害怕，在郑州市中心矗立着的博物馆，虽然十分宏伟的样子，但论经济实力，只能在别的单位面前低眉顺眼装孙子。

博物馆更深刻的忧患是后继无人。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像博物馆这般清冷的单位有真才实学的人大都不愿来。为了照顾子女安排了一些人，但大都没有子承父志的决心，只有得过且过的思想。从河南省博物馆人员结构来看，真正挑大梁的都是40岁以上的人，而20岁左右的年青人，即使有大学文凭，也大都神思恍惚，心不在焉。而40岁至50岁左右的文物工作者由于多年超负荷运转，已经到了身心交瘁的地步。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拿了将近20年的低工资（每月53元钱），真可谓含辛茹苦。馆长孙传贤本人自60年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到1979年仍是53元工资。现在，提为副研究员后工资才122元，相当于走红歌星唱半首歌的价钱。据说，这还是全馆工作人员工资的“最高峰”。馆里的老同志大都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孙馆长本人就有失眠症、高

血压、贫血、眼底血管硬化等病。年轻人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更多的选择面。他们看到这些像出土文物般的老同志，展望未来，便觉在古董堆里了一生，太不合算，便早早却步，纷纷改换门庭。因此，博物馆多有佝偻弯曲的脊梁，少有挺拔白杨般的身影……

文物来源逐渐枯竭，使博物馆展品陈旧，难以吸引观众。博物馆没有发掘权，而考古队虽有发掘权，但一没仓库，二没编号，又难以保管好文物。花钱征集文物，这似乎是非常久远的事情了，手中无钱便无底气，对一个连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单位，真有败军之将何以言勇的喟叹。

河南省博物馆似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采访之后，我们沿着博物馆旁边的马路向东走去。离博物馆大约100米之外，遥遥相对的是郑州市紫荆山百货大楼，那里人山人海，如蜂如蝶。和这景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河南省博物馆，虽然馆前赫然写着××展览，却门前冷落车马稀。

难道这就是80年代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吗？

是因为缺少物质才忽略了文化？还是文化富有了才注意物质？

看到眼前这番景象，笔者不由想起中国天子艺术展在美国展出时的盛况。我们更想起眼睛红红的孙传贤馆长，他说：

“我们常对外自诩是文明古国，说我们的历史如何悠久。何以夸口，还不是因为我们文物吗？可是，现在的文博单位景况如此悲凉，国人却无人问津，难道非要让我们垮台吗？”

河南省博物馆是中国文博界的缩影。

河南省博物馆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博界的悲哀。

博物馆前门可罗雀，反映了当前国人的价值取向，但它也深深刺伤了文博干部的心。老的文博干部似乎已无法选择，而年青的文博干部则总想跳槽，许多人不安心本职工作。由于不热爱文博工作，就出现纪律涣散，不负责任的现象。

1986年11月10日，在光天化日之下，陕西省博物馆却被盗走了秦代错金银乐府的铜编钟。有意思的是竟

然无人发现编钟被盗。两天之后一位保管部的同志才发现编钟不翼而飞。案发当天，该馆一名职工没有任何缘由却没有上班，而上午值班的临时工又提前下班，下午当班的看管人员偏偏又迟到，这就产生了巨大的间隙，使盗窃份子乘虚而入。更为让人惊心的是，馆内的保卫人员竟引狼入室，把一些不法分子邀到馆内赌博，好端端的文物展室变成了烟雾缭绕，铜臭熏天的赌场。就在案发前3天，两个经济民警还在馆内赌了整整一夜。

鹤壁市博物馆新来了3位退伍战士。馆领导似乎很会知人善任，大概考虑到他们很会站岗放哨，很会忠于领导的缘故，仅上班1个月，便把看馆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一无明确的职责要求和分工，二无严格的规章制度，那3位退伍战士很象弼马温来到了蟠桃园，久而久之，便放任自流，把博物馆便来了个对外开放。直到文物被盗多时，他们仍悠哉游哉，竟不知馆中文物何时被盗。

四川绵阳地区平武县报恩寺文物展览室在同级展馆中属于一流水平。该展室白天有专人看守，晚上又有专人值班，除门窗安有铁锁外，还专门安装了雷达报警设备，可谓戒备森严。谁知该馆还是被人偷了，并且一次盗走文物22件。值班员谢林晚上睡觉时怕惊破好梦无觅处，便关掉了报警器，这样，该馆的一切防范设备都失去了作用，使盗窃犯敬国平堂而皇之穿堂入室，从容盗走了汉代铜俑，宋代银盘、明代镀金观音等文物……

博物馆是人类美德的集大成者，从哪一方面看，它都应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奇葩，而决不是人类文明的阴影。

中国的水博界虽然内忧外患，但总有一天，它会把自己胜利的旗帜象珍藏先人的圣迹那样存放在祖国历史博物馆中——最显眼的位置。

（责任编辑：张馨）

世界各地炎黄子孙 赈济大陆灾胞活动概览



羊年入夏，我国华东、中南等地连降暴雨，出现百年罕见水灾，7月11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闻风而动，从欧洲到北美，从东亚到澳新，各地炎黄子孙纷纷募捐赈灾，感人至深。

港澳台

北京发出救援呼吁的第二天，香港报纸纷纷响应，号召港人踊跃捐款。《明报》社论说：“香港有钱人很多，中产阶级财力雄厚，一场赛马赌注动辄亿元。中国有难，香港人必须尽心尽力投入救灾，义不容辞，香港人对外国灾客尚且热心救助，何况和我们血肉相连的本国同胞。”香港电台除作系统性专题广播外，还利用海外华人电台网，与美国旧金山、纽约、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澳洲悉尼等10个海外华语电台进行联播，推动全球华人募捐活动。香港无线电视台和亚洲电视台都主办了大型义演活动。

7月17日，香港无线电视台主办“华东赈灾慈善之夜”义演，全港艺星况相献技。自晚上8时25分至翌晨4时40分，同时派多路小分队在街头、屋邨募捐，一夜之间，共筹善款近

6000万港元，打破了无线电视台历年筹款最高纪录。

7月20日，香港亚洲电视台举办“爱心献华东”义演，长达4个小时，筹得款项2750万港元，亦破亚视历年筹款最高纪录。

已别荧屏半年的歌星邓丽君，前晚刚从日本抵港，一见电视上宣传义演活动，便主动与亚视联络，出席义演高歌。

香港歌星阿伦担任这场义演的压轴台柱，他听说有人愿捐50万元要求他唱歌一首，便与成龙合唱一曲《我做得好》。观众要求他再唱一支，阿伦则说，若有人赞助100万元，他一定再展歌喉，一语既毕，台下即有反应，爱美高集团再捐300万元，阿伦欣然承诺，高歌一曲《朋友》。

香港另一歌手关德兴在义演时唱了一首华东水灾的粤曲，竟至声泪俱下，最后跑在地上，代表灾民向各位嘉宾叩头致谢，以至头破血流。

香港影星陈秋霞移居吉隆坡，已经息影多年，当她得知香港演艺界准备在7月27日举办“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会演”后，便在吉隆坡的一个私人聚会中发起募捐，吉隆坡国家银行副总裁，当地马华公会主席都破例唱歌募捐，当场募得50万港元，陈秋霞亲往香港将这笔善款送交大汇演筹委会。

香港企业家李嘉诚先生听到北京呼吁的第二天，即宣布，他属下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香港电灯和嘉宏国际等四个有限公司共捐5000万港元。李嘉诚先生生活俭朴，却一向热心内地公益活动，在他的引导下，香港社会团体和商贸机构纷纷捐出巨款，至7月28日，各界赈灾捐款已达6亿港元。霍英东先生两次捐资，一次20万元，一次500万港币，包玉刚家族基金会认捐50万港元。

新华社澳门分社赈灾办公室开展工作的第一天，电话响个不停，各界人士纷纷询问有关捐赠事项，短短一个星期就募得善款3000万港元，而澳门人口仅有50万。

7月12日是澳门赈灾的第一天，澳工联总会设立捐款箱，一位退休工人捐献1万现金，不留姓名转身就走。路环岛一造船工人原本计划旅游，为了救灾，毅然将5000元旅费全数捐出。一位靠救济金生活的退休女工把刚领的500元救济金放进了捐款箱。一位侨居美国洛杉矶的澳门女青年，获悉街坊募捐，特地打电话告诉在澳门的父亲，认捐1000美元。

在7月19日赈灾晚会上，一魏性家庭的兄弟姐妹6人走上舞台，把他们从小至今节省下来的零花钱、压岁钱和节日喜庆的“利是”钱共3万元一并捐给大陆灾区儿童。

大陆遭灾，宝岛同胞忧心如焚。早在6月28日，台湾红十字会就向大陆红十字会汇款20万美元，7月12日台湾当局决定捐献100万美元和1万吨大米。7月17日，台湾工业总会召开十大民生物资产业公会，募捐100个集装箱物资支援大陆灾区。

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洪涝灾害，亦表示关切之情。7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国民党中央捐款200万元。李登辉、郝柏村、宋楚瑜、梁肃戎等台湾首脑人物以个人名义各捐10万元。“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为了“抛砖引玉”，认捐20万美元。“立法委员”们纷纷解囊。宋美龄通过她领导的妇联会认捐74万美元的大米和药品。

台湾演艺界不甘落后，电影基金会捐100万元，中视200万元，台视以“为善长乐”名义捐100万元，该电视台员工每人捐出一日所得。一些演艺团体不断举办义演，演出所得全部济助大陆灾区。

零星捐款场面感人至深。一些老兵生活并不富裕，却顶着烈日，握着一把钞票来到红十字会。一位女士捐出一只手镯，不留姓名地址匆匆离去。桃园县崑山乡小学六年级学生童千芬决定义卖保存了4年的长发，集得10万元，悉数捐给大陆。另一位名叫刘大平的小学四年级学生，将积蓄多年的零花钱7000元全部捐给灾区。

北美

太平洋波涛万顷，彼岸侨胞骨肉情深。美国华人电台电视台大量播出大陆抗洪救灾新闻，号召炎黄子孙踊跃募捐。7月12日，洛杉矶华人在欢迎中国总领事王学贤履新宴会上，自发展开捐款活动，海南同乡会、苏浙同乡会，广东同乡会当场认捐近4万美元。7月15日，总领馆设立捐款箱，80高龄的范老先生领着一家4口，投下2000美元。正在加州打工的台湾张姓青年，从未来过大陆，他向老板请了半天假，把辛苦赚来的300美元交至总领馆。凌老太太早已退休，靠养老金过活，也捐出节衣缩食省下的500美元。

连日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接到大量来信来电，慰问大陆灾情，前

来捐款的侨胞一天比一天多。应金玉堂居士率先捐出1万美元。廖锦春老太太年过7旬，孑然一身，也捐了1000美元。

旧金山中华总商会、美国华裔总会、潮州会馆等30多个华人社团于7月17日举行联席会议，成立“旧金山湾区中国赈灾筹委会”，旧金山华裔副市长何国杰出席了会议，美加广播电台台长林雁玲说，中华同胞，海内外一体，血浓于水，应该不分信仰，一方有难，各方支持。筹委会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广泛开展赈灾活动，并通过义卖、义演、义唱等办法筹款。美国华侨总商会前会长王正本率先给江苏、安徽、湖北灾民寄去了30万元人民币。

休斯顿的华协、山东同乡会、崇正会、四邑同乡会等数十个华人社团，7月16日联合成立“德州中国救灾委员会”，提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以同胞为重”的救灾方针，深入街头、教会和大公司募捐。

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等的华人也都积极开展各种救灾募捐活动。任之恭、吴京生等14位知名教授联名发出呼吁书，征集救灾款项。

多伦多是加拿大华人聚居地，40多位华人社区代表成立了“多伦多华人社区筹款赈灾委员会”，大力进行筹款活动。多伦多“多元文化”电视台举办了1小时的“血浓于水中国赈灾电视专辑”节目，筹款6万多加元。许多华人小商贩在街头义卖。美加华语广播电台主办“7.18之夜”，为大陆灾胞筹得7.8万加元。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一千多家分行均将设立捐款箱募捐。

欧亚澳

旅法华侨华人踊跃捐款，到7月20日，已捐得100万法郎。旅法最大华商陈克威、陈克光兄弟经营的陈氏兄弟有限公司捐款30万法郎。

7月13日，旅比华侨联合总会向全体会员发出紧急通告：基于血浓于水的同胞之爱，我们旅居比利时的华侨应该有闲出钱，有力出力，帮助灾民重建家园。18日，一对70多岁的华侨夫妇冒雨来到中国驻比使馆，每人捐了2万比郎，立即拿出100美元，说

道：“我身上带的钱不多，但我是中国人，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一位台湾女同胞主动来到华联会，捐出10万比郎。

一位旅居德国的华侨本人捐了2000马克，他岳父也捐了款，他岳母说，老伴捐的算老伴的，我自己也要捐一份。

祖国水灾牵动着旅日侨胞的心。大昌贸易社长黄水豪捐赠100万日元。镰仓老华侨蔡颂梅致信中国大使馆说：“因家除字画等文物外，并无贮金，故选出所藏齐白石虫草画一幅，供作灾区的寸助。台胞贾金村，因手术在家休养，18日拖着病体赶到使馆捐出10万日元，他声泪俱下地说：“我也是中国人！”

7月18日中午，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召集董事会紧急会议，商讨捐款救灾，会议决定以泰国中华总商会名义捐泰币1000万铢，各位董事会成员也私人作了捐赠。同日各侨团和个人踊跃认捐，共捐大米1万余包。陈世贤先生捐出1万美金。

3名马来西亚籍华人举行私人晚宴，共募集6.7万美元，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马华人联合会主席林良实，他的前任李三春和中央银行副行长林仕渊在宴会上引亢高歌，以募善款。

新加坡华人协会和大华银行的联合银行娱乐俱乐部发起募捐运动，新加坡中国医保商协认捐2.3万美元。

菲律宾华人总商会、《华侨商报》、《世界新闻》已筹集54.4万美元支援大陆灾区。

澳大利亚《新报》7月16日在头版醒目位置发表社论，呼吁旅澳华侨向正面临特大洪水灾害的祖国同胞伸出援助之手。新南威尔士州23个华人社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支援中国救灾委员会，短短两天就筹集7万澳元。救委会以“无限的爱心，实际的力量，支援中国救灾工作”，为捐善款，救委会主办了一次盛大救灾慈善晚会。

海外华人华裔千百万人在这次大陆救灾活动中，感人事迹不胜枚举。炎黄子孙，遍及环宇，无论海角天涯，总是血浓于水，祖国繁荣，侨胞欣慰，祖国有难，八方支援，万水千山，总是乡情！

少林高手 少校教官

——记北京少林门掌门刘盛英

●何东



少校武术教练刘盛英

蓟县商老师，德祥又传他一套宫内世传的“那家拿法”。商老师是少林俗家弟子，清末的著名拳师；李靖继承商老师的少林衣钵，一辈子不敢忘本。

自古以来，江湖习武之人不外乎三种出路：卖艺摆摊、看家护院、拉杆造反。德祥和李靖亦是大同小异。

德祥时年40余岁，尽管沦落，仍放不下皇族的清高，不肯求职谋生，只好靠变卖祖宗留下的细软度日。不久，因内人和直系军阀一个团长的姘妇发生口角，打起了扯不完的官司，最后败诉，输掉了鼓楼西大街的宅房。德祥一怒之下，出手痛打那团长一顿，引来宪兵追捕，家境从此一败涂地。

尽管家境窘迫，德祥仍不失中国人的气节。“九·一八”后，满洲国在日本人刺刀庇护下建立，并派人敦请德祥前去掌管长春宫。德祥闻讯后不屑地说：“虽说我的拳头硬不过东洋人的枪炮，可也不会去捧它的臭脚。”谢绝邀请，依旧在陋巷瓢食中惶惶度日。

李靖时年30余岁，出宫后无处投奔，遂回老家河北省三河县段家岭。他无房无地，晚宿破庙靠摆摊卖艺维持生计。一天，一位姓胡的游方道人路过段家岭，和李靖为争夺破庙里的居住权发生争执，口头达不成协议，只好拳脚上见输赢。

两人一拉架式，彼此心中有数，是少林与武当两种功夫的对垒。几个回合后，李靖使出“神拿”招法扭脱老道一臂，又踢出弹腿把老道抵在庙墙上，如果发力，即可顶死老道。老道心知不敌，闭目等死。

练武之人惺惺相惜，李靖收回弹腿，两人言和，遂相拜为莫逆之交。老道惊讶李靖功夫精湛，便介绍他到三河县镖行当了镖师，又教他一门名叫“水蛤蟆”的绝艺：用骰子在上牙齧硬



训练中的刘盛英少校(中)

挤出一洞，待赌钱时凭舌头的感觉将骰子吐出，所需点数可随心所欲，与人交手时亦可当暗器打人门面。李靖经过几个月的苦练，还真学成了这门技艺，在一次豪赌时，竟赢了2000斗玉米，在段家岭盖起了五间住房。

这年，山上跑来了豹子，隔几天便拖走几条牲畜，农户们惊惊战战，猎户们如临大敌。一天清晨，李靖按老习惯到山坡上习武，碰巧遇见这孽畜。他没带枪棍，只有随手捏着的两枚铜胆（当兵器用时号称流星），情急之中用暗器的手法甩出铜胆，当场打瞎豹子的眼睛。豹子负痛窜走，摔死在山崖上。这件事立即轰动全县，经众口铄金的传颂，李靖身藏不露的武功始为乡邻们崇敬，经几位德高望重的乡绅举荐，李靖在段家岭办起武馆，开门授徒，按照他的师承，膜拜达摩，自号“少林门”。

几年后，这个创建于段家岭的少林门，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风风雨雨，传授的同门师兄弟中，涌现出使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

武馆迁移 节振国投师习武 施展神拿 师兄弟武装抗日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迅速沦陷，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曾与李靖同师学艺的希甫师弟，投降日寇，任唐山皇协军旅长，他派人请来李靖，让李靖出山到伪军任职。

李靖拒绝了“邀请”，希甫无奈，欲杀李靖，又碍于师门的面子，便勒令李靖不许再回三河段家岭，只能在唐山赵各庄煤矿开馆授徒，以便控制在他的势力范围内。

冀北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非常活跃，负责人有吴德、钱信忠等，军区司令员是李运昌。

北京民间武术界有六个主要门派，独树一帜的叫“少林门”。多少年来，它的名声时起时落，规模时兴时衰，但追随者却滋滋不息。因为它不仅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少林武功，涌现出名振中华的抗日英雄，保留下堪称中华武术精粹的“少林七十二把神拿”，还由于掌门人刘盛英嗜武如命的孜孜追求。

北京少林门的渊源很奇特：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1924年冯玉祥率兵逼宫又驱除了满清余党，这时，故宫里两名“大内高手”因此仓皇出逃，流落民间，竟引出这一武术门派的萌发。

沦落江湖 仍不失中国人气节 继续师承 少林门初创段家岭

流落江湖的两位“大内高手”，一位叫德祥，一位叫李靖。

德祥世系皇族，属正黄旗，官拜二品带刀侍卫，掌管故宫神武门，朝廷赐姓“刘”，全名刘德祥，即现任北京少林门掌门刘盛英的爷爷。

李靖，字瑞臣，人称“河北大枪”，是德祥手下的督护卫，武功师承河北

赵各庄少林门武馆开办之后,引来了许多热心习武的煤矿工人,节振国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节振国小时也曾练过几趟拳脚,当时是煤矿负责百余马车运煤的小工头。其为人仗义,乐善好施,颇得工人的敬重,听说煤矿开办起武馆,便匆匆赶去。

武馆里,新入门的弟子们正在比划招式,节振国迈进门槛叉腰斜立,一言不发,眼睛瞪向李靖,意即挑衅,行话叫“找场子”。

老江湖眼睛一瞟,便已领会其中的来意。“这位兄弟……”李靖拉着询问的尾音,上前搭讪。“来拜馆!”节振国压低嗓门,截口接着道,“一是带艺投师,二是先怙怙你。你赢了,我就拜你为师;你要输了,这里的掌门你就干脆让出来!”

打出的武功,吹出的文章。李靖在武林中厮混多年,这类场面自是习以为常,便爽声答应。众人忙不迭地围成一圈,看两人如何动作。

节振国抱拳为揖,略示礼数后起式长拳,左捣右勾,拳出声发,招式浑厚。李靖起式少林拳的“开门揖客”,表示以武会友不伤和气,待节振国拳到后看准来势,顺手勾住左拳,右掌随右脚顺势揉进,手起一把“狮子滚绣球”。此着属“七十二把神拿”第二十七式,要领为“脚管腿,手管头,扭身变脸把人捆”。招式使出,节振国重心顿失,身体不由自主地车轴般跌滚出去。

由于招法精妙,节振国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尚弄不懂究竟是如何摔出去的。他不服气地吐口唾沫,连声道:“这次不算,再来,再来!”

第二次出手,李靖先发制人,使出神拿中“就地搬桩”的招法,矮身挫步,双手平捋,待拿实后突然发力,看准节振国将倾覆之际,又猛然收招,然后侧身退步,笑吟吟地叉手站立,口中连说:“得罪,得罪。”众人喝采声中,节振国的为人也不含糊,当场推金山倒玉柱地磕了三个头,正式拜师学艺。

赵各庄煤矿工人的习武活动,引起了我党的重视。当时唐山区委书记周文彬,也曾拜入武馆,吸引工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不久,经吴德和钱信忠介绍,节振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个武林门派诸师兄弟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李运昌司令员任命节振

国为工人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这支队伍最大规模时有300余人。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节振国领导的工人游击队,骨干力量系同门习武的师兄弟;日本军惊叹节振国飞檐走壁拳脚无敌的武技,源出李靖少林功夫的传授。

李靖后来曾回忆,游击队摸鬼子岗哨时的招法,使用率最高的是神拿中的“就地搬桩”——几个人假装打架,分散鬼子的注意力,待跌跌撞撞靠近时突然出招,招出克敌。还有一次,节振国被鬼子一个小队的兵力围困在家院里,他抄起菜刀,使出师父传授的“腕子刀”趟路,连劈鬼子数人,安然脱险……

节振国从1938年开始在少林门练武,前后历时5年。在这期间,他用本门武艺痛打过日本浪人和韩国浪人,为中国工人扬眉吐气;他从1940年始,组织过大小30多次战斗,使侵华日军闻风丧胆,直到1942年10月牺牲,是名垂史册的抗日爱国英雄。

节振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声势日益壮大,日本军发出的通缉令中特别规定一条:“遇到使少林门武功招数之人,格杀勿论。”李靖不能再在唐山存身,避难跑回北京,在朝外东大桥开大车店谋生。在这段隐名埋姓的日子里,他开始潜心修改“少林七十二把神拿”的招法,把繁杂琐碎华而不实的动作剔除,增加简练易学适用临战的反关节技巧,讲究以巧制力、以快克敌、以招致胜。这套凝聚多少代武林前辈心血的“神拿”,更加趋向尽善尽美。

至此,一代武学宗师李靖,把他创建的门派和对中华武术的造诣带到北京。少林门在北京的授徒习武活动由此发祥。

拜师入门 刘盛英苦练拳脚 初露锋芒 新掌门驻足武林

刘盛英习武少林门,已是这20年以后的事了。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56年。李靖这时的授武活动,主要在北京朝外绣水河一带。说起来也是巧遇,曾给德祥家看坟地的老家人卜爷,也时时在这里拿腿溜弯儿。这一日,他看见有人撂场子练武,便凑上前看景儿。人圈正

中,一位手握钢胆的长须老者便是李靖。卜爷瞧着眼熟,上去搭话问:“这位莫不是李督卫?”

李靖认出卜爷,两人执手相望,都已鬓发如霜。李靖急忙探问德祥家况,方知德祥早已作古,尚有后人留在京城。他向正在练武的徒弟们交待几句,便拉着卜爷去看望德祥的后人。

按德祥的辈份,刘盛英的父亲荣治称李靖为四哥。1936年春,德祥在一次喝酒时猝然身亡,荣治年仅19岁,此后一直靠蹬三轮维生,也就是北京人俗称的“板爷”。这时,全家发展到9口人,祖辈传下的金银玉器早已变卖殆尽,只剩下慈禧御印的字画还在变着法儿的折腾。看着昔日曾是皇族成员的这一家没落如斯,李靖慨然向荣治允诺,收刘盛英等哥仨儿为徒,学成技艺,待机报效国家,或许尚有出头之日。

李靖在北京共收徒30余人,较有成就的有永定门的王洪斌,长短大枪出神入化;六里屯的赵德安,拳脚套路得自真传……唯有刘家哥仨儿当时年龄最小,其中刘和英8岁,刘盛英6岁,刘平英5岁。

收徒仪式按老规矩举行,先向师父磕头,再向师哥请安,摆上几桌酒席,老辈的武师都应邀助兴,图的是脸熟了日后有个照应。一场典礼热热闹闹。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位1950年出生,年仅6岁的刘盛英,能够集这一门武功之大成,并出任掌门。

刘盛英学的第一个拳路是“少林短打”,由于耳误,此后几年中都以为少林拳叫少年拳,是专给小孩子练的。李靖给这哥仨儿的分配是:和英学枪棍,盛英学拳脚,平英学刀剑。第二年盛英上了小学,正好把这套短打练熟。

打拳不遛腿,到老冒失鬼;练拳不活腰,终究艺不高。练武人的辛苦,不在于练式而在于练功。盛英每天放学后,要到师父家练到天黑,每天早起,还要做百余趟抽筋。他腰筋硬,师爷便指点师哥们帮忙,架在树旁用蹬脚的动作硬往外掰。那时,年幼的盛英睡觉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看天气,遇到刮风下雨偷着乐儿,因为可以不到师父家受训了。

李靖没文化,但教授时手不离拳谱,尽管不识几个上边的字,也要拿在

手中不时地瞄几眼。这里的内情，是文革时师父被赶回三河老家后，盛英才明白的。北京少林门的文字材料极少；武术套路都由师父谙熟在脑子里，训练时手里捏个本本，实际上是为了斯文，也说明中国武林人对于文化的崇敬。

盛英初次在武林界崭露头角是在13岁。李靖传授的武功博采众家之长，盛英已学完飞龙拳、飞虎拳、大洪拳、六合拳、二十四把独绝手、六十四截腿、七十二连桩和少林七十二把神拿的前三十六把等等。

这一年，盛英和师兄弟们在东单公园训练，恰逢北京武师周当武也在那里遛弯儿。周武师是鹰爪功的传人，与李靖亦是多年相知，时年50岁。他看到盛英练武肯下力气，心里喜爱，便打趣地说，比划一下如何。盛英年幼气盛，不知别人的深浅，又不会世故地圆场，爽口应承下来。两人一搭手，盛英使出“神拿”招法中的“犀牛望月”式。此式讲究借力打力，招式后出。盛英招式出手，冷不防将周武师抢倒在地。周武师面上挂不住，爬起来再试。按说盛英这时应该见好就收或让个一招半式，可他天生不服气的倔犟性格，没注意周武师已隐含真怒，又施展以巧制力的“抱虎推山”式，将其翻在尘埃。

原会友镖局的刘凤宣老镖师也在驻脚观战，劝止了二人再试，问起盛英的师承，感慨道：“名师高徒，自古皆然。”又向周武师开玩笑说：“周兄，练武人讲究能者为师，我看你就拜这位小兄弟为师算了，就学刚才那两招。”

事后，盛英向师父讲述此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靖闻讯后满脸舒展，毫不掩饰得意之态，但也毫不留情地教训了盛英，命他给周武师陪罪。

此后3年里，盛英曾和40多位闻讯赶来的练武者过手较技，以其不足16岁的年纪，力挫过北京大成门的传人王铁成、三皇炮锤门的传人成东生……在民间武术界竟挣得了一席之地。

1966年文革初始，李靖即被作为“牛鬼蛇神”管制，可能由于红卫兵小将对其武功的忌惮，所幸没受到“武斗”的关照。他被赶回三河县老家后，直到1976年逝世，享年90岁。

这时的盛英已经习武10年，私下里又向哥哥和英学了枪棍，向弟弟平

英学了刀剑，还向其他师哥广泛求教，十八般武艺九长九短一应学完，但师父赖以成名并研究多年的“少林七十二把神拿”只学了三十六把。对此，李靖向他解释说：“你师哥节振国也学了三十六把，能成为抗日英雄，在武林大出风头。你年纪比他小，学的一样多，知足吧！今后如何使用，就看你的造化了。”

中华武术的成就，源于它兼收并蓄的胸怀，但历代武师以武为生，传授招法时往往又很保守。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便是练武者的后起之秀不屈不挠地追求。譬如：“七十二把神拿”从蓟县商老师以至再往前推，始终一脉单传，传至李靖，拳谱上又增补第七十三式：“神拿式法不轻传。”

盛英对武术的痴迷。是他最终集本门武术之大成的原动力。

李靖重回段家岭，当时追随师父继续习武的师兄弟里，盛英是最勤奋之人。他每逢星期天早6时骑自行车出发，中午赶到段家岭，午饭后请师父指点，直到傍晚，第二天上午继续练，至中午骑车赶回北京。此后的10年里，无论冬寒夏暑，他始终保持这种练武方式，既是探望师父的病榻，也要讲述自己对招法的心得。李靖喜爱他的诚实和韧劲，终于决定把全部技艺倾囊相授。最后几年里，李靖似乎感到来日无多，反催盛英强闻博记。盛英这时方领会到武林人“教枪不教把，教拿不教手，教手不教点”的含义，因为李靖最后谆谆教诲的，都是神拿招式中从未听说的精微之处。

李靖在病重弥留之际，经常念叨：“本门武功有大成者，唯盛英一人。”确实，盛英以锲而不舍的追求，为中华武术保留下一块瑰宝，也成为本门弟子中学艺最全、最精的佼佼者。从此，这位年轻的小师弟，逐渐受到诸位师兄弟的推崇，成为北京少林门的新掌门。

高手荟萃 轻摘取决赛桂冠 各方聘请 当教练殚心竭力

中国武术队1979年东渡访问日本，在与日本武术家切磋技艺时受挫。“国粹危机”，一时成为武术界的焦切话题。经过几年准备，1983年武术散打比赛拉开帷幕，北京是全国武术名

家荟萃之地，这场比赛实际代表了全国的武术水平。

盛英在师兄们的举荐下参加了这次比赛。他在北京东城区武术馆报名，预赛中取得全区第一名的成绩。决赛开始后，虽然所遇对手均是中国武术名家，但他仍然轻取比赛第一名的桂冠。他所代表的东城区武术馆，也由此获得全国武术比赛的指挥权。

习武17年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并摘取到金牌，意味着盛英的武术成就得到官方的承认。但盛英却以为最大的收获不是荣誉，而是形象有了改观，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这位多少年如一日地在街巷深处或公园一隅聚众练武的不务正业的闲散人，就连他供职的北京某制铜厂，也立即把他从食堂炊事员提升为采购员。

无论怎么说，以这次比赛为契机，各种邀请函纷沓而至。此后的几年里，他先后在北京散打队、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守备师、宣武体育场等处任武术教练，就连一些中央首长如刘伯承、廖汉生等的警卫员也来上门学艺，教授的徒弟数以千计。

1983年，泰国一位有名望的拳师来华考察，盛英应北京体院的邀请前往作陪。这位拳师在比赛中曾有过用胳膊绞断日本拳王小腿的战绩。平日的抗击打训练，是让别人用铅球往自己身上摔。泰国拳师来华的目的，自然是试探中国武术的深浅。据盛英付度：体院因为拿不出相应的选手与之抗衡，又难以敷衍，所以请民间武术家过场，胜负都好交待。

体院训练馆里，看完泰国拳师的击打表演，盛英不由得暗自哑舌。泰国台拳道的特长是膝、肘功夫，各有40余式，相当于中国武术中的靠和挂，其招法谈不上精妙，但职业性的超强度训练，使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中国武林决难有取胜之道。

中国武术讲究渊源，门派观念极深，因而也格外地保守。历史上许多武术名家创造出恢宏的武术体系，但一经流传，便落入保守或固步自封的糟臼；失传的不说，走样或似是而非的招式比比皆是，许多以为密不外传的绝招，摆出来其实只是普通的招法，但关起门来仍在津津乐道，否则，便斥为不尊祖法，这真是武术的悲哀。再加上多年来人们把武术视为左道旁门，不重

视武术人才,或把武术当作体育训练,泯灭了武术的特点,更加速了中国武术退化的趋势。譬如近年来的武术散手赛,虽说规则的制定以中国武术为本,但实质是拳击加脚踢的混合物,散打或许尚有残余,武术已踪迹全无了。

盛英感叹,许多人欢呼1991年的国际武术散手邀请赛上中国队连下6块金牌,殊不知这里具有取消跆拳道膝肘和空手道角摔的特长、外国选手尚不适应的偶然性。如果按人家的规则,不必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恐怕连澳门香港的选手都通不过。

最使盛英痛心的有两件事:第一,师父李靖的儿子和孙子跑到北京,向他请教“神拿”和其他武术招法,武术世家失落如斯,更惶论其它;第二,北京八卦掌传人马传胥,在某公安局任教5年,因局领导更换,遂决定调他到远郊县,并附带条件:如不服从,即请另谋高就,武术仰领导鼻息之好恶,何谈发扬光大?

盛英从体院归来暗下决心,研究破解泰国的办法。几年后,他通过在香港的徒弟张向宏,请来名叫差猜的泰国拳师,切磋中用弹腿获胜。差猜佩服中国的武功,毫不保留地演练出全套膝肘法,盛英则详细地讲解了二十四把独绝手,两人交为朋友。第二年,差猜专程赶到北京,请盛英等少林门一行5人,到北戴河旅游。

1989年,年近40岁的盛英竟穿上军装,聘用为解放军战斗行列中的一员,授少校军衔,任某集团军武术教练。

盛英首批授徒12人,都是从军侦察营精选出有训练基础的战士。4个月以后,这12人作为教员,把训练向部队推开。

在这期间,他殚心竭虑,分析了部队沿用数十年的“擒拿”、“捕俘”教案后提议,原教案招法死板,许多动作不切实用,难以克敌制胜,于是,他承受了编制新教案的任务。为适应部队训练和对敌实战的特点,他从“少林七十二把神拿”中精选招式,再设计套路重新组合,使我军作战中的对敌格斗同中国武术相贯通,也使中国武术的这份精粹再立新功。

军首长对此评价说:“这套教案是部队训练改革的成果,并把实战训练提高到新阶段。”

1990年,盛英迎来了检验他训练成果的机会。北京军区召开有7个集团军参加的散打观摩赛上,他亲自传授的12名徒弟中,有6名上场参赛。结果,这6人囊括了比赛的前6名。盛英兹被宣布为某集团军终身武术教官。

学而致用 众弟子积极进取 输赢之间 神拿式壮我国威

少林门授徒,有“三不教”的原则,即“光棍大汉不教,不仁不义不教,贼偷盗匪不教。”师父李靖授徒时并未解释过其中的含义,只是用阅世多年的眼光去判断。因此,原则虽然具体,运用却很抽象。盛英继承掌门衣钵,解释其含义为:光棍大汉指智商能力,不仁不义指道德品格,贼偷盗匪指谋生职业,凡符合者,均可自愿拜师习武,练体强身。

盛英为人谦怀,不善言辞和交际,武术成就也主要表现在授徒传艺方面。但是,他一身所学百余套刀枪拳棍的招法和对其领会的精髓,得其道者的最高境界不过掌握四五成。盛英对此遗憾却又无奈。外国人崇敬中国的武术,把它拿过去改良,冠以名称后职业化,我国改革后亦提倡专业化,但专业的武术家谁看见呢?

盛英传授武功数以千人,多数为现役军人和人民警察,少数为各行各业的职工。所幸的是他们学而致用,为巩固国防、维护治安、壮中华国威积极进取,也为少林武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生命力。

毕继刚,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治安联防员,从上小学至今向盛英习武不辍,其间也曾到某集团军协助盛英传艺。1990年10月,正值亚运会在京召开之际,联防队一行5人执行巡逻任务时接到举报:前方停车场有窃贼偷卸汽油。巡逻队赶到现场,堵住3个窃贼。窃贼操起携带的铁棍抵抗,冲在前面的联防队员被打昏在地。毕继刚紧接着冲上去,那窃贼依样用铁棍劈头打来,他使出“推窗望月”式卸下铁棍,紧接着“风卷残云”式出手,把窃贼捺在脚下。虽然剩下的两个挥棍跑掉,但不久便被拎入法网。毕继刚的武功在管片内颇有震撼力,这次又受

到嘉奖。

张向宏,与中国武术名人李连杰是同班同学。李连杰在中国武术队练武并创出成绩,张向宏当时也报名,但因家庭成份高而未被录取。他羡慕之极来求盛英,这年是1970年,盛英收下了这个年方10岁的徒弟。张向宏随盛英练武4年后,随父母迁居到香港,几年后为谋生到电影厂当跑龙套的杂役,初次演匪兵时,对打中不由自主地使出“神拿”招法,竟把香港有名气的武打演员打伤。导演奇怪,细问下才知此人武功不俗。这年正赶上日本拳王到香港设擂台,连挫数名高手,使得香港武林无人敢问津。主持擂台的老板急了,出重金悬赏:只要敢上,无论输赢。剧组同仁劝张向宏去试。擂台上,他头一把使出“戳心破肚”式,把日本拳王扭翻,观众掌声雷动;拳王再上,气势汹汹,他一时犹豫,不敢贴身,使出弹腿“朝天一柱香”,让拳王抄住竟被砸断腿骨。

这次擂台,观众感谢他先声得分的战绩,送他“小北京”的绰号。养伤期间他跑回北京,向师父盛英请教。盛英询问比赛过程,认为是出脚角度不当所致。张向宏遂留在北京,继续向盛英习武。以后,他每年回北京一次,请教武功,至1985年,他报名参加香港武术搏击大赛,力克群雄,获沉重级冠军。

香港报纸杂志上刊出的大幅照片寄到北京,上面赫然是张向宏的捧杯雄姿。盛英手捧照片乐得合不上嘴:有徒如斯,师复何求?!

裴知民,出身武林世家。1971至1981年随盛英习武,后因大学学业紧张而辍业,现任合资企业北京石景山卫生材料厂副总经理,系国家经贸部干部。1986年,裴知民曾因在北京站只身抓获两名强抢钱包的歹徒受到通报表扬,被评为部级先进和租赁公司优秀党员。

1987年初,裴知民到日本东京的东棉株式会社洽谈贸易,工作宴会上,中方代表团领导介绍他是少林功夫的传人。日方谈判对手,有位叫原田信雄的空手道七段,闻声讥笑问:“中国还有少林功夫吗?”言罢满脸轻蔑。

裴知民解释说:“少林是中国武术重要的一支,传到日本,根在中国。”

原田信雄不服,坚持认为空手道

才是真正的少林功夫，而中国的少林功夫已不值一提。提出过手比试，从输赢上下结论。

地铁站的广场上，能遥望见远处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中方代表们经磋商，认为这是日本某些商人蔑视中国的心理作祟，力主裴知民教训这个空手道七段。两人在站旁拉开架式，原田抢先出手抓小袖（肩膀），准备用跤技摔倒知民。知民招发后使出“金鸡抖翎”，弓步强劲，盘住原田两臂，并告诉说：“原田君输了。”原田不懂，问其缘故，知民讲解说：“因为我已施出克制的招法。”说着两膀加力，看其将要倒地，收势搀住。

原田一身所学不得施展，自然不服，抖擞精神再试。这次他改抓中心带（腰带），知民顺势递右腕过去，待其抓实，使出“压盘手法”，挫步变位，一托一带，将原田扭跪在地。原田被反关节锁住，空有力气不能运用，跪在地上痛得咬牙。知民一手继续盘住其肘，一手做势去托，嘴里还在客气：“对不起，请起。”原田哪里挣得起身。双方观看者尚在为两人的文明比试赞叹，只有原田心中有数，苦在心里却说不出口。

知民以绝对优势取胜，日本谈判方态度立即和蔼，他赢来的是武功，还是人格、国威？只有日本人自己最清楚。后来原田到北京做生意时，还专程拜访，向知民请益。知民向盛英讲述此

事，盛英豪爽地表示：“教他三招，让他回日本琢磨去。”

武术中单手为擒，双手为拿。“神拿”招法讲求以自己的阴面拿对手的阳面，或以自己的阳面拿对手的阴面，阴阳两面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变幻无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深得古代辩证法之精髓。少林武功造就出一代代武师，这些武师以少林为本，又不断把所学臻于完善。因此，“少林七十二把神拿”归类少林，实际上包含了历代武师研究的新的心得，是历史形成的集体创造。刘盛英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他决不落入保守的羁绊。

1987年，盛英受邀会同南少林掌门彭信忠、峨眉派掌门首徒董洪绪、形意门名人申永娜，武术教授秦赞浩、公安部武术教练姚太宝等，联名申报成立“中国武术馆”，上书中国武术协会云：“我国武术技艺精湛，自古震惊世界，在挽救国威、捍御外侮的历史长河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创导建立中国武术馆，旨在破除门户观念与偏见，团结武林各派，光大中华武术，争取让中国武术早日进入奥运会摘取金牌，为祖国人民争光，为国际交往服务。”虽然申报由于诸种原因未能批复，但其意之壮，其心之切，由此可见一斑。

中华武术渊源数千年，流传形式是拜师、授徒、传艺的单调循环，皂染者泛泛无数，得道者寥寥可数。盛英身

怀绝艺，在弘扬中华武术上寄托了他的全部追求。为维持门派和武技的生存，他做过生意，搞过建筑，游说过大财东出钱资助。最近，他曾在广东珠海市困守两月余，为的是等待某企业家一个应许未兑现的诺言，等待层层批准的行政手续，等待新武馆的酝酿和诞生。

盛英多年来守业不悔，两袖清风。笔者去采访他，招待的便宴是他向师弟孔繁云借钱筹办，规模是在家中的长橙上围坐，几盘熟肉拌凉菜，几位弟子殷勤劝酒，凑过来几张被“二锅头”烧得通红的纯朴面孔……几口老酒喝下去，噎在嗓眼，辣在心头。

近几年，香港曾多次来人，请他去传授“神拿”招法，他拒绝了；泰国四大财团中最大的林家集团，曾派侍卫队长到北京拜访，探讨到泰国办武馆传艺的意向，他拒绝了，拒绝得干脆利落。有弟子不解，问他：与其在国内困守，何不到国外风光？

盛英答：让他到我这儿学武，可以；让我到他那儿卖祖宗，不行！我虽然文化不高，原则问题可不含糊。

武术的气节，亦是民族的气节，愿每个炎黄子孙，都能遵而守之。

“中华有武功，武功得师传；师传到我辈，我辈要发扬。”几句陋诗，表明盛英仍在奋斗。

（责任编辑：晓渡）

欢迎订阅《炎黄春秋》杂志

《炎黄春秋》由本社自办发行。1991年为双月刊，逢单月1日出版，每册订价为2.80元，另收邮费0.28元。银行汇款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地安门分理处，帐号：032—144230—76。邮局汇款地址：北京海淀区北洼路5号（师院附中院内）《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电话：8414411—2903。邮编：100037。联系人张君。无论银行或邮局汇款，都请函告您的详细通信地址、单位、姓名、邮编。

有关原《炎黄子孙》、《中华英烈》的财务事宜，均与本社无关。

中华文坛不老松

中华文坛不老松

① 巴金

② 冰心

③ 艾蕪

④ 夏衍

⑤ 魏金枝(右)
在常书鸿



大河明珠

——建设中的黄河游览区 王绘 摄影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和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黄河游览区，位于郑州西北三十公里处。
它北临黄河，南依岳山。



象苑



杨怀辛